



## 中评周刊 | 第 85.86 合刊目录

### 专题 | 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有民才有国

1. 张曙光、张弛：经济增长回落 内外环境趋紧 | 2018 年第 3 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P. 3
2. 吴敬琏：在改革大道上且行且思 P. 19
3. 刘鹤：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采访 P. 22
4. 林重庚：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 P. 27

### 专题 | 中美日-新时代三边关系，知兴替者胜

1. 张五常：从邓小平的智慧来说说中美贸易之争 P. 41
2. 田国强：大国战略之定力、改革与全球化 P. 45
3. 荣剑：中国外交格局中的“东亚突破” P. 58
4. 神田丰隆：中苏分裂与 1960 年代日本对华政策 P. 66
5. 沈明高、赵洪岩等：中美贸易战会让中国走上日本的老路吗？ P. 79
6. 王明远：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华援助和投资 P. 91

### 观点文章

1. 张林：增信民企债意在防范流动性陷阱 P. 99
2. 张浚生：对中日关系的回顾、展望与期待 |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40 周年 P. 101
3. 塞缪尔·莫恩：抵制“法律人治国” P. 107

### 随笔散记

1. 许章润：“哪有先生不说话？！” P. 111
2. 盛洪：我与科斯 P. 113
3. 梁河东：继朱铁志后还会有高知分子自杀 P. 124
4. 佩戴徽章之人：西西弗斯的神话 | 对江绪林自杀事件的一些感触 P. 127

## 读书

1. 吴敬琏: 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中实用主义色彩是一把双刃剑 P. 135
2. 贺卫方: 《格列佛游记》里的党争 P. 113
3. 王宏恩: 历史仍未终结 | 阅读福山 2018 新书《身分政治 Identity》 P. 142

## 预告

1. 茅于軾教授九十岁寿辰学术庆祝活动众筹 P. 147
2.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149

订阅 | 往期下载 P. 151

## 张曙光、张弛：经济增长回落 内外环境趋紧 | 2018 年第 3 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弛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



本文作者张曙光教授

**内容提要：**第 3 季度，GDP 增长 6.5%，工业增加值增长 6.4%，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9.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4%，均比上半年有所回落，构成经济运行总体进一步趋缓之势。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真实制度而非名义制度问题。随着中美贸易升级、蔓延和扩大，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如果平等保护产权、增加投资者信心和稳定公众预期的实际制度不能真正确立和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的作用会受到限制，经济短期还会继续下行，长期发展也会遇到很大困难。

### 一. 总量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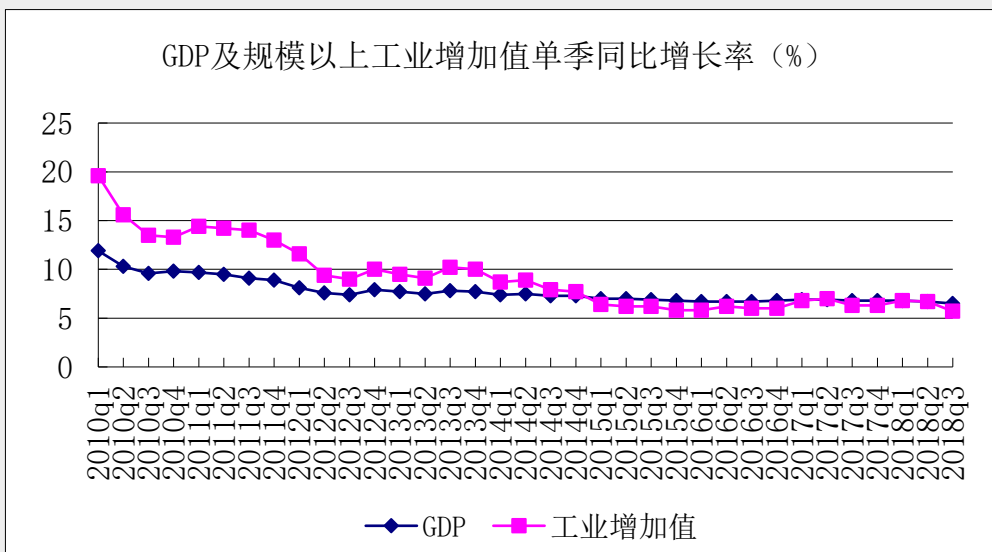
#### 1. 经济增速回调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65089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8%，二季度增长 6.7%，三季度增长 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42173 亿元，同比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262953 亿元，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 345773 亿元，增长 7.7%。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4%，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3 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0%，集体企业下降 1.4%，股份制企业增长 6.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5.7%。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制造业增长 6.7%，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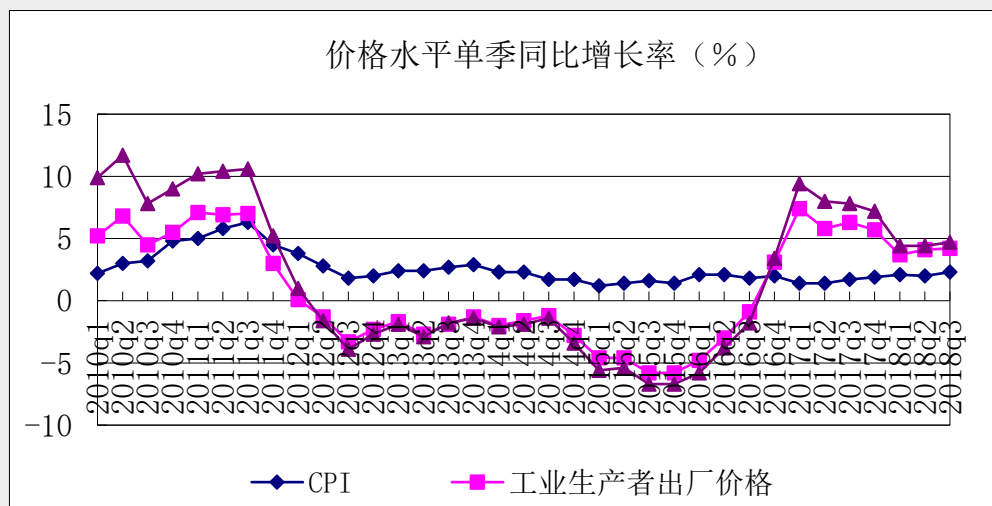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3%。

前三季度，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8%，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2 个百分点。



## 2. 居民消费和生产者价格继续稳定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1%，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1.6%，衣着上涨 1.2%，居住上涨 2.4%，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 1.6%，交通和通信上涨 1.7%，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2.2%，医疗保健上涨 5.0%，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 1.1%。



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4.0%，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4.5%。

## 3. 劳动力市场就业率提升

9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比上月和上年同月均下降 0.1 个百分点；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7%，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

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 18135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166 万人，增长 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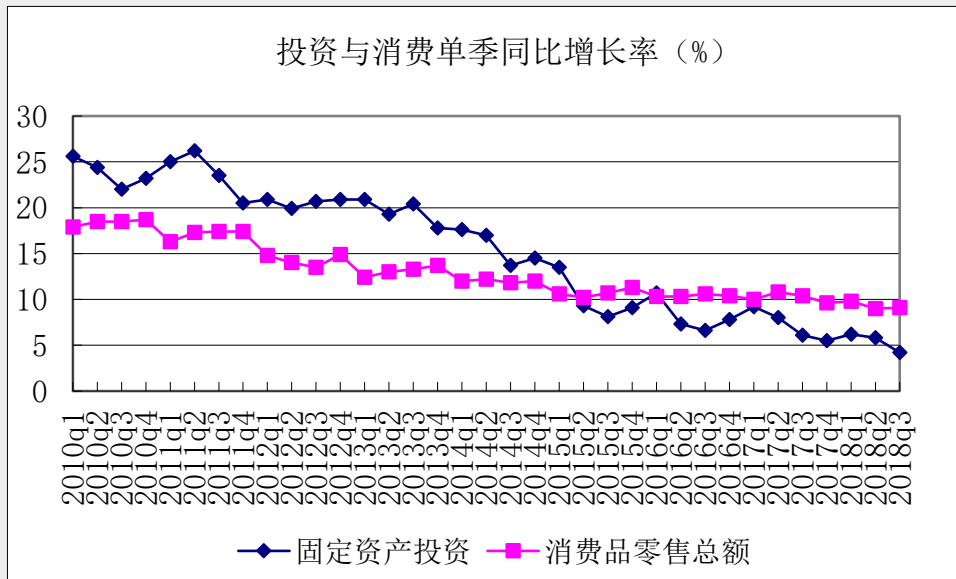
#### 4. 汇率持续贬值

9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3.09 万亿美元。9 月末，人民币汇率为 1 美元兑 6.8792 元人民币，比 6 月末贬值 4%。

### 二. 因素与结构

#### 1. 投资增长回落，居民消费增速趋缓

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83442 亿元，同比增长 5.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0.6 个百分点，比 1-8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 301664 亿元，同比增长 8.7%，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0.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 2.7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1.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5.2%，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8.7%，比上年同期加快 1.9 个百分点，增速连续 6 个月加快；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5.3%，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3%。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8665 亿元，同比增长 9.9%。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19313 万平方米，增长 2.9%。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104132 亿元，增长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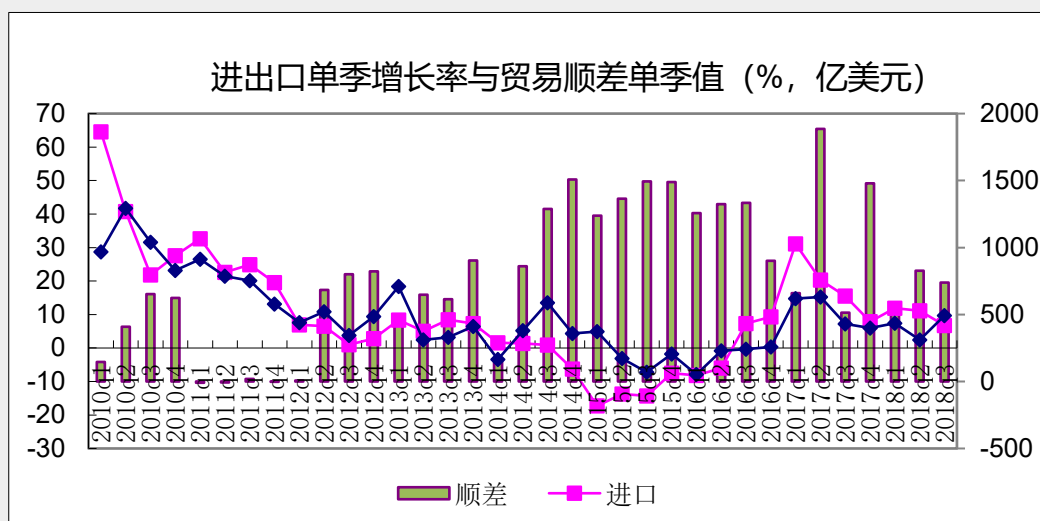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4299 亿元，同比增长 9.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0.1 个百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34717 亿元，增长 9.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39582 亿元，增长 10.4%。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281 元，同比名义增长 8.5%，比上年同期加快 1.0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3%，加快 0.4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6.5%，加快 0.3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12.0%，加快 3.4 个百分点。

## 2. 进出口增长加快 外商投资企业家数大增

前三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 222839 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1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18585 亿元，增长 6.5%，加快 1.8 个百分点；进口 104254 亿元，增长 14.1%，加快 2.5 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顺差 14331 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 28.3%。主要贸易伙伴中，对欧盟、美国和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7.3%、6.5%和 12.6%。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中，对俄罗斯、波兰和哈萨克斯坦进出口分别增长 19.4%、11.9%和 11.8%。

2018 年 1-9 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近 4.6 万家，大增 95.1%，而实际使用外资 6367 亿元，增长 2.9%。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5 个国家和地区的 4597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82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



## 3. 税收和非税收入一增一减，政府性基金收入持续高速

1-9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5831 亿元，同比增长 8.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9582 亿元，同比增长 9.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76249 亿元，同比增长 7.8%。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27486 亿元，同比增长 12.7%；非税收入 18345 亿元，同比下降 12.8%。

1-9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3289 亿元，同比增长 7.5%，为年初预算的 77.8%，比序时进度快 2.8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22959 亿元，同比增长 8.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0330 亿元，同比增长 7.3%。

1-9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9348 亿元，同比增长 28%。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101 亿元，同比增长 4.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46247 亿元，同比增长 30%，其中土地出让收入 42298 亿元，同比增长 32.1%。

1-9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9728 亿元，同比增长 36.3%。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1981 亿元，同比增长 28.6%；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7747 亿元（含用上年结余安排），同比增长 36.6%，其中土地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43185 亿元，同比增长 39.1%。

#### 4. 货币供应量微增，本外币存贷款一增一减

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80.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增速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7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53.8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增速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10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7.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 609 亿元。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3.14 万亿元，同比多增 1.98 万亿元。外币贷款减少 190 亿美元，同比多减 495 亿美元。

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 12.01 万亿元，同比多增 3257 亿元。前三季度外币存款减少 473 亿美元，同比多减 1088 亿美元。

#### 5. 货币市场成交量大幅攀升，利率同比降环比升

前三季度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 734.64 万亿元，日均成交 3.89 万亿元，日均成交比上年同期增长 26.6%。其中，同业拆借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75.6%，现券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38.4%，质押式回购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21.2%。

9 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2.59%，比上月末高 0.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33 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6%，比上月末高 0.35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47 个百分点。

#### 6. 股指持续下跌，A 股长期不振

2018 年前三个季度，A 股整体呈下跌走势。上证综指由 1 月的高点 3587 点跌至 2449.2 点，跌幅达 31.7%；沪深 300 指数跌幅同样达 31.7%，中小板指数跌幅达 41.2%。创业板指数自 2015 年以来已经跌去 70%。从 2018 年 A 股的“走熊”来看，似乎印证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下滑、金融风险局势紧张、中美贸易争端等诸多不利影响因素。



上证综指近一年走势

如果从 A 股历史走势来看，A 股整体表现为“快牛慢熊”，虽然上证综指 60 月移动平均线仍然缓

慢上扬，但股市似乎与经济基本面是脱离的。A 股的长期不振，越来越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层次问题，例如：上市公司治理问题、资本市场信息操纵、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等。



上证综指历史走势 (附 60 月移动平均)



创业板指数历史指数



美国标准普尔指数 2004 年以来走势

### 三. 政策效应

#### 1. 宏观总体趋势

2018 年第 3 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65 万多亿元，增长 6.5%，分别比一、二季度回落 0.3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作为经济增长“压舱石”的服务业，1-9 月增长 7.7%，比 1-6 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4%，分别比一、二季度回落 0.4 和 0.3 个百分点。虽然完成今年政府 6.5% 的增长目标问题不大，但考虑到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实绩和未来经济增长环境的恶化，经济运行总体进一步回落的趋势已经形成，且近期内改善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大。切莫再报喜不报忧，拿“稳”、“进”、“新”的修辞自我安慰和自我陶醉。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来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9.3%，分别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回落 0.5 和 0.1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78%，也比上半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8.5%，实际增长 6.3%，分别比上半年回落 0.3 和 0.4 个百分点，城镇和农村均较上半年趋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居民非外出务工收入 1854 亿元，较上年下降 32.13%，折合人均收入约为 1031 元，较上年下降 31.33%。可见，农村和农民的消费需求面临严峻形势。须知，消费的扩大和升级是经济平稳运行和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撑，更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推动力，被誉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和“顶梁柱”。虽然在无重大变故的情况下提出消费降级的说法依据不足，但消费提质升级的步伐比较缓慢，除了收入增长的因素以外，还有预期的作用，消费的方便、安全、舒适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普遍感到经济发展的环境恶化，改革开放出现停滞和倒退，前景堪忧，预期看淡，股市就是最好的反应，且不说财富效应，割肉还来不及，因此，只能捂紧自己的钱包。现在，新业态的发展，网上零售增长很快，快递业往来穿梭，非常繁忙，人们的生活的确比过去方便了许多，但安全、舒适则存在很多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前不久揭露的疫苗造假事件直接危及到人们的生命，还有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都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质量，至于国庆、五一等长假期间的旅游，人满为患，服务很差，与其说是享乐，不如说是受罪。这背后不仅是消费体制问题，而且是整个经济体制问题。正因为如此，报纸才发出了“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的呼吁，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印发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以及《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 年）》，提出了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等六项重点任务。问题在于发文件不难，能够真正落实实施才是关键。现在文件发得不少，但能够做到的比例太低。

消费回落，投资也在趋缓。前三个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落 2.1 和 0.6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比上半年加快 0.2 个百分点。要知道，这是在政府在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补短板，稳投资、稳基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地方债发行的情况下出现的。

鉴于二季度投资回落较大，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各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有效投资，稳住投资正常增长。中国铁路总公司确认今年铁路投资重返8000亿元。民航局和发改委联合公布《民航领域鼓励民间投资清单》，28个项目预计总投资1100亿元。国家能源局今明两年核准9个重点输变电线路，其中7条为时隔一年多重新审批的特高压工程。在暂停一年后，发改委重启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审批，长春、苏州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已经获批；合肥、西安、武汉、成都、太原新一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已经上报待批。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已经累计开工130项，在建项目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152项，52项已经完成，100项在建，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抓紧推进一批西部急需、符合国家规划的重点工程建设，重点是十大高铁通道建设，包括三个贯通和七个建设，三个贯通是从乌鲁木齐到连云港、昆明到上海、昆明到广州的三大高铁通道，七个建设是建设从呼和浩特到南宁、昆明到北京、包头银川到海口、银川到青岛、兰州西宁到广州、兰州到北京、重庆到厦门的高速铁路。很多省市也启动了不少项目，如四川国资系统今年共推出118个项目，其中省重点项目58个，总投资7827亿元。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进度，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早见成效。8月14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并指出发行进度不受季度均衡要求限制，要求地方债承销商投标利率较相同期限国债前五日均值至少上浮40个基点（BP），同时酝酿地方债风险权重或从20%降至0。于是，广东省财政厅于8月15日连发3份特急文件，8月16日发行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珠江三角洲水利资源配置工程专项债券（一期）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第一批）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第二批），共计442.9亿元；从15-22日的一周，全国共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369.28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纷纷出笼，地方基建项目将迎来井喷。可见，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政府将再度依靠投资来稳定和拉动经济增长。因而提出和论证西部6000公里的调水工程也就不必惊奇了。

如果说消费和投资双方回落，那么，进出口则逆势增长，第三季度货物贸易增长9.9%，比上半年加快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6.5%，进口增长14.1%，分别比上半年加快1.6和2.6个百分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加快，对欧美出口的增长也不低。在中美贸易战加剧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似乎表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和出口的短期影响不大，但却无法令人感到鼓舞，反倒引起不少质疑。据有的出口商透露，他们现在先把商品运到美国储备起来，用于兑付明年的交货合同，但却计入了今年的出口成绩。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出口数量有多大，居然能使第三季度的贸易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亮点！这使我们想起2013年第1季度贸易增长13.4%，进出口分别增长8.4%和18.4%，到了第2季度增速大幅下降，6月份出现了负增长（-0.7%和-3.1%），主要原因在于银行的“内保外贷”政策造成了货物旅行，兜圈套利，数据参水。如果上述行为的出口商不少，明年的进出口贸易将会跌得更惨。

## 2. 股市：信心和制度

今年以来,股市跌跌不休,从年初 3587 点的高点跌到 10 月 24 日 2449 点的低点,跌幅超过 30%。中小板和创业板跌得更惨,前者跌幅超过 40%,后者从 2015 年起跌幅超过 70%。第三季度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尽管有关方面不断大力提振股市,但无法挽救股市的颓势,股市一直在 2500 点以下运行,中国股市已经成为 2018 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如果再与 2009 年以后不断走高的美国股市比较,其情景的确令人担忧。以至最近先有三部门掌门人同时发声,股市利好信号不断,后有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来喊话,提升股市信心,但股市在当日上涨以后又掉头向下。对此,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首先,把中国股市波动归因于全球股市下跌、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并不恰当,美国股市虽有波动,但基本上是上涨行情,如果放长点来看,标准普尔指数已经从 2009 年的 667 点上涨到 2490 点。中美贸易摩擦虽有影响,但并不直接,也是根源于国内和通过国内因素起作用的。因此,股市大跌还得主要从内部找原因。

其次,认为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股市的走势与宏观经济背离。这种看法也过于短视和表面。过去,股市确有与经济走势背离的情形出现,如 2015 年经济增长降至 7%以下,而股市在央行降准降息以及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却出现了井喷式的牛市,从 2 月中的 3050 点上涨到 6 月中的 5178 点,上涨了 69.8%,紧接又出现暴跌,6 月 26 日跌到 3373 点,接着全面动员打了一场“股市保卫战”。不过,股市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反映经济的未来走势,今年的情况更是如此。今年以来,经济持续走低,内外的营商环境和发展条件都在恶化,历年积累的问题纷纷显露,未来的情况不可乐观,投资者也失去了信心。但我们仍然是报喜不报忧,假大空连篇累牍,这不仅不能提振人们的信心,反而进一步挫伤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如果去掉高压和恐惧,让人们说实话,究竟有多少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对国家的发展报有信心,又有多少人对未来的前途担忧?有信心的是什么人,而担忧的又是什么人?恐怕会让人们跌破眼镜。

再次,拿股市本身来说,尽管股市改革不断,令人眼花缭乱,沪港通开通,沪伦通启动,入“摩”正热,又开始入“富”,最近有针对性地推出了瞄准市场建设短板和弱项的一系列措施,概括起来,一是动员商业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债权、股权、信贷工具,设计专项产品和专项平台,为企业和股市补充和注入流动性,进行“输血”。二是解决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问题和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盘活”存量资产。三是加快修法,支持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依法合规回购股份。这些措施虽然必要,但仍然主要着眼于技术层面和短期考虑,而忽视中国股市基本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其中最主要的是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这才是中国股市最根本问题所在。就拿上市和退市制度来说,我们一再强化发审委的权力,而不愿用注册制代替审批制,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股指已经跌到了历史低位,自然具有了较高的投资价值,有可能出现

一波上涨行情，但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解决股市以及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仍然避免不了股灾的重演。

### 3. 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和扩大

中美贸易战打响以来，已经进入第三回合，战火还在继续蔓延和扩大，大大恶化了我国的外部环境。我们在前两个季度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曾从不同方面作过讨论，因为兹事重大，还需要继续讨论。

从7月6日起，美国把此前宣布的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惩罚性关税中的340亿美元商品付诸实施。中国立即予以反击，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也从7月6日起开征。贸易战正式打响。

8月23日，美国对自中国进口的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针锋相对，也从即日起对从美国进口的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至此，两国加征关税的商品均达到500亿美元，贸易战进入第二个回合。与此同时，美国正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听证。

就在关税相互施加的同时，中方宣布，应美方邀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22-23日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就双方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建设性、坦诚的交流。白宫发言人表示，双方“就如何在经贸关系中实现公平、平衡和互惠交换了看法，包括解决中国的结构性问题”。看来未取得突破和进展。

9月24日，贸易战进入第三回合，美国对从手提包到纺织品的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立即反制，宣布从24日12时01分起，对美国原产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还扬言，明年把税率从10%提高到25%。

与此同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发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的白皮书。明确指出，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繁荣、稳定。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在贸易战升级的同时，双方都在采取一些与此有关的对策，贸易战向其他领域蔓延。中国加紧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自己的贸易体系，美国也在加紧对中国的围堵和施压。

7月底，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承诺，“共同致力于取消工业产品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补贴”，但汽车行业除外。

9月25日，日本、美国和欧盟贸易负责人在纽约会晤后发表声明，将共同发起一项旨在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提案，内容涉及国内工业补贴通报制度以及加强世贸组织一般性委员会的活动，声明称，“三方合作者将继续探索如何提高不遵守透明度和通报制度的代价以及如何加强有关获取信息的能力”。

10月3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签字，替代原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第32章第10段规定，协议成员国不得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接着，10月16日，美国宣布将与英国、欧盟和日本分别进行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

10月10日，美国发布一项新的投资监管新规，11月10日生效，过去只对并购以及获得美国企

业控制权的交易进行审核, 新规允许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 27 个关键行业中任何一项对美国的投资。这些关键行业包括航空、电信、计算机、半导体和电池等。据说其中一条是不允许设有共产党党委书记的公司在美国进行一切投资活动。与此同时, 欧盟内部正在探讨一项草案, 主要针对非欧盟成员国对战略行业投资加强监管。

10 月 5 日, B20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向 11 月举行的 G20 会议提交的政策建议文件,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 B20 中国工商理事会分别代表中国工商界发表声明表示反对, 至于文件的具体内容, 国内媒体一律不予报道, 据说提出了政府官员公布财产的建议。

很明显, 这一切虽然未直接说明, 但都是以中国为背景或针对中国的。

在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分析中, 我们曾经明确指出, 中美贸易摩擦“根本问题不在贸易, 而在中国的崛起和走向、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美国社会结构的断裂及其前进道路的修正和调整”。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分析。尽管中国承诺继续扩大开放, 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如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上宣布的扩大金融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多数已经落地; 政府发布了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大幅放开 22 个领域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再如国务院决定把关税总水平从 9.8% 降至 7.5%。但是, 这一切都无法缓解和改变外部环境不断恶化和我国逐步被孤立的趋势。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

中央关于全方位开放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但是, 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主有次, 有重有轻, 不能事无巨细, 眉毛胡须一把抓。全方位开放的主要方向应当是对发达国家开放。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基本道路和主要经验。须知, 从 1949-1978 年, 我们实行“一边倒”的国策, 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友, 并与之结盟, 进而国内政策也以其为楷模, 搞了 30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结果是反复折腾, 几度危机, 老百姓还填不饱肚子, 政权的合法性也发生动摇。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 另谋他途。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 对发达国家开放, 与发达国家为友, 向发达国家学习, 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 结果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社会面貌也大为改观, 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因此, 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以前, 向发达国家开放的主要方向不能动摇, 不能改变, 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 可能更不是问题。向其他方向的开放不应喧宾夺主, 更不应成为改变和对抗主要方向的手段。然而, 我们目前把开放的方向和全部工作主要定位于“一带一路”和向不发达国家开放, 与美国的贸易战更加剧了这方面的偏差。要知道, 如果中国崛起使周边国家感到恐惧, 要请美国出来平衡, 如果中国的崛起使自己孤立, 那么, 就说明我们的国际战略存在偏差。对此, 我们应当从内外政策方面做出调整。近来, 与日本的关系有所缓和, 这是正确的选择, 应当坚持和扩大。但应当清楚, 在日本的天平上, 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轻重是不一样的。

#### **四. 体制分析**

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 目前又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8月20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抓紧解决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健全激励机制，强化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10月17日，刘鹤主持召开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重视中小微企业当前存在的突出困难，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10月2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根据督查发现和企业家关切的问题，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帮助缓解企业融资难。央行当晚宣布，决定引导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积极支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债券信用增进公司等机构，在加强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的基础上，运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等多种手段，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同时在6月份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1500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1500亿元作为初始资金，由上述专业化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样，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似乎有了解决的希望。其实，问题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还需进一步讨论。

**第一**，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两个毫不动摇”，即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写进宪法，而且官方一再宣示的。但实际情况如何呢？要知道，我们宪法中的很多重要条款不仅没有落实，而且还在公开违宪。这一条也是如此，口头上、文件上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做的是另一套。不错，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中国的，但什么时候民营企业在实际上取得了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地位？既然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最近又在大力学习、宣传和实践《共产党宣言》。要知道，《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是，“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它的最后一句话是“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既然如此，怎么让人相信第二个毫不动摇呢？

**第二**，从我们建国以来近70年的实践看，前30年是逐步消灭私有经济的过程。现在来看，肯定错了，我们认错了吗？没有。相反，《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建国32年的历史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难道土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合作化、公社化也是巨大成就。有人会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改正了错误。须知，思想观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上不认错，能彻底改得过来吗？前不久批判了否定土改的小说《软埋》，最近正在热播讴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电视剧《正阳门下的小女人》，这怎么能让民企业家放心大胆地发展私营经济呢？

**第三**，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发展了民营经济，今天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有了“四五六七八”的概括，但是，民营经济在夹缝中生长，在歧视和限制中经营的状况彻底改变了吗？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又规定集体土地只有先变成国有土地，才能用于开发建设。连两种公有制都不平等，更不要说公有和私有经济了。事实上，在82宪法通过以前，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这表明，我们的改革从侵犯产权开始，而且是从宪法侵权开始，这完全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它为我们改革的倒退和歧视政策的持续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多次修宪，是否意识到82宪法的这一问题，并试图改正？初期，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得不戴一顶“红帽子”，发展壮大以后又不得不在体制内找一个靠山和保护伞，否则迟早就会遭遇不测；然而由于不少官员被双规，又珠连出多少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左右不是，进退两难，难道改革开放以来，倒下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还少吗？有的身陷囹圄，有的亡命他乡，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不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取信于民和民营企业？

**第四**，远的不说，本世纪以来，我们发布了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2005年2月24日发布了著名的《非公36条》，2010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人称《新36条》，2012年各部委又发布了各自的《新36条》实施细则，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7年9月25日，又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些文件都很重要，都很正确。问题在于，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这些内容大致相同的文件，证明没有落实，问题没有解决。那么，进一步要问，为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我想人人心理明白，只是大家王顾左右而言他而已。

**第五**，最近，由于24家民营上市公司出现问题先后被国有企业接盘，引发市场关注和社会议论，高层再次宣称“两个毫不动摇”。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市场上的并购重组完全是企业的市场行为，不会发生什么问题，更不会触及根本制度问题，但在我们这里却成了问题，高层不得不就基本制度问题表态，而且表了态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有媒体又提起了“不争论”的口号，主张“走出争论实干兴邦”。在大方向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实干确实可以兴邦，可以成就大业。而在目前，上下左右大方向并不一致，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包括官员在内，很多人也不想干，不能干，不敢干。不要说不争论，现在全面监控，能争论吗？不允许公开正常的讨论，就只能在背后议论，这是一种腐蚀剂，离心剂，闹到最后，大家离心离德，怎么实干？既然“姓社姓资”、“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是大非问题存在，能不争论吗？不让争论就真的不争了吗？邓小平当年提出“不争论”已经过去了30年，今天还在争论，而且争的是同一个问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第六**，在政策执行中，我们缺乏一套严格的程序，喜欢刮风式和运动式的一刀切作法，这对中小

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打击和伤害最大。比如，环境保护的确非常重要，政府进行整治治理是必要的和正当的。但刮起环境风暴，进行集中整治清理，各地倒闭了一大批中小企业。还有，追缴社保费有无明确规定，前不久，常州裕华玻璃公司被追缴十年的社保欠费，哪个企业扛得起？尽管税务部门发现后暂停追缴，但在现行制度条件下，此举对民营企业造成的恐慌和压力却难以消除。

**第七**，减税降费是政府减轻企业负担，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今年初，政府决定全年减税降费 1.1 万亿，后来又出台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等一系列措施，预计全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 1.3 万亿元。仅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及减税降费达七次之多。7 月 23 日提出，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增值税留税返还的 1130 亿元，9 月底前要基本完成。8 月 16 日强调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尤其是营改增等减税措施。8 月 22 日提出加快落实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8 月 30 日，再推出三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举措。9 月 6 日明确了创投行业的税收政策。9 月 12 日决定再压缩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1/3。9 月 18 日再推出两项减税降费措施，并强调按“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已定部署，在机构改革中确保社保费现有征收政策稳定，同时加紧制定降低社保费率方案，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对此我们坚决拥护，双手欢迎。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方面政府对减税降费非常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缺乏一种根本考虑和总体打算。于是零敲碎打，措施不断，手忙脚乱。在大力减税降费的情况下，前三个季度政府一般性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8.7%，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12.7%，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长 28%，均超过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为什么不能大力度精简合并减少税种，并较大幅度降低主要税种的税率？这么多减税降费措施，令人眼花缭乱，基层征收人员搞得清楚吗，能落实吗？不仅如此，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超过了 20%，民营企业的利润增长不到国企的一半，但民营企业税收的增长却超过了国有企业。其实，对于政府来说，国企的利润和税收只是放在哪个口袋的问题，而民营企业的税收，才真正构成企业的负担。税负问题人人关心，不免会提出很多质疑。前年，有人提出死亡税率，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反击，今年有人对财政收入增长超过 GDP 增长提出质疑，财政部官员在解释时说，中国的宏观税负不高，且连年下降，2017 年只有 27.2%，比 2015 年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而全世界 2015 年的平均水平是 36.8%。这样看来，中国的税负已经很轻了，政府还在减税降费，岂不是功德无量，似乎不应当再说三道四。要知道，财政税收是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任何一个纳税人都可以提出问题。

**第八**，应当指出，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政府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其实，这一问题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既有制度环境的问题，也有企业本身的问题，只是我们目前制度环境的问题特别突出。有消息说，由国开行牵头，有 16 家银行参加，给一汽贷款 10150 亿元的战略授信计划正式开始实施，而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资金却得不到。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由于制度环境问题实际上解决不了，只好在技术问题上做文章。这类文章要做，但必须明白它的局限性。如果不解决制度环境问题，只在技术问题

上下功夫,不仅技术问题解决不了,还会走到邪路上去。不仅如此,有人把目前鼓励民资定位于“救市”,更是南辕北辙。

总之,我们讨论的目的是从中国的长远发展着眼,希望能够关注实际基本制度问题的真正解决。

## 五. 走势预测

根据 CEEM《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2018 年第三季度中国外部经济综合 CEEM-PMI 为 54.8,较上季下降 0.5 个百分点,除美国外,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经济体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全球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下半场。大宗商品价格环比上涨 6.68%,主要来自于油价。出口增长回落主要受经济景气程度趋缓的影响,进口增长加速主要来自价格因素。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回稳,外汇、股票、债券市场基本稳定。未来几个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持续放缓,美联储还会进一步加息,中美利差会进一步分化和两国经济周期不同步,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和扩大,会加大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以及出口的下降。据此,报告提出,中国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好应对措施:保持内需稳定对冲外需下降;增加汇率弹性应对资本外流冲击;理性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寻求对外开放政策新突破。我们认为,CEEM 长期跟踪和客观分析是有道理的。

从国内情况来看,政府还会坚持实施和进一步出台一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具体措施,但一些重大的政策不会变化。在这六个方面,其重要性和紧迫程度也不一样,还有个权衡和选择问题,更有个配合和协调问题,有些政府可以直接行动,而且有效,如增加投资,有些就不一定,如外贸和外资,前者取决于外部需求,后者取决投资环境。总体来看,内外环境还会进一步趋紧,也无法采取根本有效的办法,出口增长会进一步下降,经济增长也会进一步回落。据此,对第四季度和全年的经济运行预测如下。

| 季度<br>经济指标    | 2017 年全年<br>(实际) | 2018 年 3 季度<br>(实际) | 2018 年 4 季度<br>(预测) | 2018 年全年<br>(预测) |
|---------------|------------------|---------------------|---------------------|------------------|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 <b>GDP</b>    | 6.9              | 6.5                 | 6.3                 | 6.4              |
| <b>工业增加值</b>  | 6.6              | 6.4                 | 6.2                 | 6.4              |
| <b>固定资产投资</b> | 7.2              | 5.4※                | 5.5                 | 5.6              |
| <b>消费品零售额</b> | 10.2             | 9.3※                | 9.0                 | 9.2              |
| <b>出口</b>     | 10.8             | 6.5※                | 2.0                 | 4.0              |
| <b>进口</b>     | 18.7             | 14.1※               | 12.0                | 12.5             |
| <b>消费物价</b>   | 1.6              | 2.1※                | 2.3                 | 2.2              |

注: 1. GDP 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 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 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4. ※系 1-3 季度的数据。■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18 - 10 - 27, 于北京

[【返回目录】](#)

## 吴敬琏：在改革大道上且行且思

[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本文首发于 2018-01-15 新京报，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经济已面临新一轮的结构调整，而在过去五年，吴敬琏站在现实与观念的前沿，一直在关注并致力于探讨改革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大道行思录》即为他此间的文集。吴敬琏在致敬礼现场的对谈与演讲中继续着他的改革思考，到了新的时代，怎么过改革的“三峡”呢？他抛出这一问题并随即提出，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除了知与行，还有“学”。而遗憾的是，“学”正受到网络传播碎片化的挑战。

### 市场经济是否有统一标准？

最近美国和欧盟等一些国家都表态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判断当然是基于其自身标准做出的。在我看来，这个判断对我国的民营企业不公平，因为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倾销行为”，而不是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衡量。所谓倾销就是低于成本的销售产品，

如果是市场经济国家，就应该考察我国在外国卖产品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拿到了补贴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产品销售。

如果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那就要找另外一个国家，看它的成本是不是低于我国产品的销售价格。这个对我国做出口的民营企业是很不公平的。国际纠纷里面很难以标准问题作为论据，就是说你这个标准要用我的标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不如把这种障碍，作为我们自己的动力，是不是更好一些？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我们不如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作为我们自己的标准，以此来检查各方面的体制、政策。哪怕是种压力，是种阻力，也可以变成前进的动力，我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处理问题的办法。

比如说，“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在“十九大”以后，多位重要官员都表示，该制度目前推行的程度还是很低的，要在今后五年，特别从今年开始，就要在全国推行负面清单制度。过去我国实行正面清单制度，就是说指定的领域才能够让企业自由进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指定企业不能进入的领域，除此之外都可自由进入。

“十八届三中全会”类似的规定很多，不妨一条一条地去检查。我们如果没有做到的，加快地做到，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如果我们都做到了，我认为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来驳倒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这一套标准，全世界的主要国家说其不对，我认为这并不能站住脚。

### **改革路上的学与思**

讲一点我最近想的问题。这本书的题目是《改革大道行思录》，收集的文章是我在改革的大道上且行且思的一些记录。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用一位杂志主编的话，新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快速地驶出了历史的“三峡”。那么过三峡就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什么？这本书的标题就说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实践；一件事是思考。

但是我这本书出了以后，我思考人生除了这两件事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就是要“学”。今天来的哲学家有好几位，我哲学学得不好，但我觉得我们始终在认识论上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实践出真知有误解，人类所有的知识来源于实践，这点我是同意的。可是，这里把人类的整体和个体混在一起了。对人类来说，知识、思想是从实践来的。但每一个个体不是这样，每一个个体通过学习，去掌握他人、我们祖祖辈辈实践中所取得的知识——因为人类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就是语言。有语言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而不是亲践亲知。这叫做思而不学，思而不学就会变得迷茫、无所适从。

那么要学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一件事是，网络兴起以后，使得信息的交流快速化，而且范围可以非常广大。但它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都愿意吃快餐，使得知识片断化。

所以通过语言传播的知识，就是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就牵扯到书，需要大家来写好书，需要出版好书，需要有传媒书评家们进行评论和筛选。

说到底，光说要行要思还不够，还要学。而这个学依赖于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人要尽量把书写好，出版家们把书出好。而且有书评者，有网络来替读者推荐、筛选、评论。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改革就能过“三峡”。最近中央会议所提出的——新时代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发展质量就是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靠效率提高来推动发展，来支撑增长，而效率怎么才能提高呢？其实说到底就要靠改革，改革要靠我们大家的行、思和学。■

[【返回目录】](#)

## 刘鹤：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采访

[刘鹤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硕士，1969 - 1970 年曾为知青在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本文转载自 2018-10-19 新华网]



本文作者刘鹤先生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10 月 19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龚雯、新华社记者赵承、中央电视台记者许强的联合采访。以下是采访记录。

**记者：**刘副总理，我们知道您非常忙，但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出现一些变化，希望您能回答几个问题，回应市场关切。

**刘鹤：**欢迎你们采访，我非常愿意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 (一)

**记者：**刘副总理，请问您对中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有何看法？

**刘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股市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和下滑，这是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外部因素。主要国家央行加息后，全球股市都开始波动，有所下滑，美国的股市也出现明显回调，目前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也造成了影响，但坦率地说，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目前中美正在接触。二是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必然对股市带来影响。三是市场预期发生变化，未来经济环境的种种不确定性，影响了投资者行为。投资者很关心民营经济发展、产权保护等

问题。此外，最近几天也存在一些市场的技术性因素，比如在股市下滑过程中出现了被动减仓的现象。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股市产生波动。

最近我高度关注国际投资机构对中国股市的评估和国内专业机构的市场分析。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中国正在成为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泡沫已经大大缩小，上市公司质量正在改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所以很多机构建议对中国股市给予高度关注，认为中国股市已经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对这些评估，相信投资者会做出理性判断。可以说，股市的调整和出清，正为股市长期健康发展创造出好的投资机会。

## (二)

**记者：**政府对促进股市健康发展有哪些新的举措？

**刘鹤：**政府高度重视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当前股市的心理特征是，对制度创新和改革政策有很强的期盼，市场表现与这种期盼之间有很强的正反馈效果。因此，促进股市健康发展，一定要有针对性地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最近以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都在研究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有了一些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今天上午，这些政策已经陆续宣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稳定市场方面，允许银行理财子公司对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要求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做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管理，鼓励地方政府管理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帮助有发展前景的公司纾解股权质押困难。二是在市场基本制度改革方面，制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推进新三板制度改革，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上市的支持力度等。三是在鼓励市场长期资金来源方面，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壮大机构投资者力量，巩固市场长期投资的基础。四是在促进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方面，加快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包括推动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行业龙头民营企业进行产业兼并重组，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计划以及股权融资支持计划等。五是在扩大开放方面，继续全方位扩大开放，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博鳌讲话精神，加快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的开放。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已定，关键在狠抓落实。现在是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关键时刻，各方面落实的力度要大一点，责任心要强一点，敢于担当，快速行动，切实推出一些具体政策，推动股市健康发展。

## (三)

**记者：**当前民营企业对落实基本经济制度面临一些焦虑，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鹤：**首先，我想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目

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比如说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些为了所谓“个人安全”、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行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问题，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对民营企业，要强调“四个必须”：一是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必须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暂时困难，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三是必须进一步深化研究在减轻税费负担、解决融资难题、完善环保治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四是必须提高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自身能力，不断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最近，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工商联等要专门到各地了解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实情况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情况，希望大家给予支持。

#### (四)

**记者：**社会上对“国进民退”有一些议论，您对此怎么看？

**刘鹤：**社会上所谓“国进民退”的议论，既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最近，一些前期通过高负债扩张较快的民企，由于偏离主业，在流动性上遇到困难，国有银行或者国有企业进行帮助甚至重组，是帮助民营企业度过难关，恰恰体现国企和民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我认为这是好事，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好了，国有资本可以退出。反过来，如果国有企业遇到困难，也可以通过民企积极参与提高效率。我们还鼓励具备条件的、比较好的民营企业在产业重组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同行业的一些有竞争潜力但目前面临困难的中小企业进行兼并重组。

必须看到，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在基础产业和重型制造业等领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两者是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未来中国经济将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提高，走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从传统固化的观念，转向用全新的现代化产业链理念来认识国有和民营经济。

我特别想说，在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一些企业面临一些困难，这恰是企业家大有作为的阶段，有勇气、有眼光、敢作为的企业家应先走一步，不负众望。中国政府将创造平等环境，强化法治，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深化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经济发展广阔前景充满信心。

## (五)

**记者：**您怎么看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和产业结构变化？

**刘鹤：**我认为，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看，我国经济运行都处于合理区间。与国际上的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经济的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从金融领域看，货币政策稳健操作，金融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各类机构不顾风险盲目扩张的冲动明显收敛，投资行为趋于理性。与此同时，历史上积累的各种风险和问题正在不可避免地水落石出，这是个必然的过程，要理性看待。

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边际变化，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努力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要求，我们要坚决抓好落实。当然，尤其是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防控好金融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相对稳定。两者平衡的关键是实施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过去3年来，我们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通过“毁灭性创新”，中国经济中一些过剩领域的价格水平回归均衡，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深化一步，下一步重点应是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韧性、创新力，从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我们要抓紧做好三件事。一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提高金融可及性，减轻各类负担。二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尤其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激励机制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金融体系要提高适应性，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当前形势下，特别要加快制度建设，发挥好资本市场的键作用。当然，做好这些事需要稳健的宏观政策加以支撑，我们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明确的产业投资政策、更具有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政策，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核心政策进一步深化。分析看待中国经济的表现，如果从一时一事看，可能会感觉有一些困难，但是一旦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往前看，发展前景十分光明。

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看，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一次结构性的变革，我们常说，是从传统动能向新动能转变，现在市场很关心向什么方向转？清晰描述这个转化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是一个市场化探索和试错的过程，但从需求方向来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中国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崛起，他们在创造巨大的多元化需求；第二，人口老龄化明显，也在形成巨大需求；第三，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这既要求我们提出供给侧解决方案，也会创造巨大需求；第四，绿色发展创造着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些方向，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全面推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辨认和抓住新的机遇，努力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产业，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

我最后想说一句话，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是历史必然，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只要大家牢记这一点，心就会静下来，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

[【返回目录】](#)

## 林重庚：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

[林重庚 Edwin R.Lim 英籍华裔金融专家，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任 CEO，曾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本文首发于 2018-11-06《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本文作者林重庚

**林重庚** (Edwin R.Lim)，英国籍，曾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任总裁，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事件。2008 年 6 月，林重庚应邀为《中国经济 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年)作序，为此接受了苏国利等人的专访。在此基础上，2018 年 3 月，苏国利、吴素萍进一步专访林重庚，修改整理成本文。

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再次回顾这段历史，分析这一伟大历程并分享其中的宝贵经验，对经济学界、世界各转型国家的经济决策者，乃至世界上还在为快速促进本国经济进步而奋斗着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始于 1979 年。那年 7 月，我携家人来北京旅游，住在北京饭店。当时，外国人来华并非易事，华人华侨也不例外。我在世界银行东亚处工作，越南统一后不久，世行便开始了越南业务。那时的越南很封闭，抵达河内最便利的航线须经北京转机。由于中国尚未恢复世行席位，与世行没有业务关系，1977 年至 1979 年间，我几次赴河内出差过境北京，都要以主管越南业务官员的身份到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申请过境签证。即便是这种短暂过境中国的机会，我们这些海外经济工作者也十分向往。国际社会并不清楚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以我们都极想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情况。

在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曹桂生公使的帮助下，我的家人取得签证，与我同行，但在北京只能停留三天。抵京第二天，我意外地接到邀请，中国银行要在前门烤鸭店设宴招待我们。到了烤鸭店我才明白，原来宴请的主人是中国银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他是中国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可行性调研团团长【1】，在座的还有王连生（当时在财政部地方财政司工作，随后成为派往世行的首位执行董事）、戴乾定（当时在中国银行研究部工作，后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张小康（当时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后任中国驻爱尔兰大使、中国驻新加坡大使）。作为调研的一部分，他们已经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了解到这两个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交往经验。

我从席间的讨论中发现，调研团成员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从世行集团的“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获得软贷款，想了解申请软贷款的条件。当时的软贷款是无息贷款，50年偿还期。我告诉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申请世行贷款，无论是按照市场利率的硬贷款，还是无息的软贷款，关键步骤是世行总部要派代表团对申请国进行经济考察，贷款资格取决于经济考察的结果。为此，我们主要讨论了世行经济考察的程序。

1980年初，林基鑫率领的调研团向中央提交了《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程序和安排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随即邀请世界银行集团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行长访华，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世行席位的相关事宜。

麦克纳马拉率领的世行代表团于1980年4月抵京。麦克纳马拉行长后来回忆访华情况时说，邓小平会见时向他明确表示，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有世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会更快、更有效率；没有世行的帮助，也照样要做，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些【2】。在双方积极配合下，谈判很顺利。一个月后，世行董事会批准中国恢复世行席位。麦克纳马拉行长离开中国不久，我即被任命为负责中国业务的首席经济学家，分管中国经济调研及政策对话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行驻中国代表处并任首席代表。这一任命直至1990年。

在那次意想不到的前门烤鸭店晚宴之后不到一年时间，我便身临其境，不仅可以就势观察中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而且一定程度上亲历其中。以我当时的工作身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一个主要领域自然是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由于参与这个过程的许多前辈已经故去，反映这一方面的资料并不多，我希望通过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大家分享当年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演化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我将按主题回顾：首先是如何理解和运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想。随后是如何引进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我只讲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如何接触外国经济思想，以及如何与外国经济学家和改革实践者接触。最后，我还会补充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中国参与创办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经历，以及近年来参与的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情况。

## 一、认识到引进新思想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于思想创新。20 世纪 70 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正走出几十年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知识封闭状态。尽管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努力、富有勇气，也很有能力，但没有几个领域像经济学界那样严重地与外界隔绝。

中国领导人早就认识到学习外国思想及先进经验的重要性。早在 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的“第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3】然而，事与愿违。在随后 20 年间，传统的苏维埃中央计划体制原封不动地被照搬到与苏联情况千差万别的中国。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和经验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政治错误。

中国下决心启动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70 年代后期，中国高层领导发现，世界其他国家经济进步是那么迅猛，相比之下，中国是那么落后。1978 年，前后共 12 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 20 次访问了 50 多个国家。其中邓小平先后 4 次出访，到过 8 个国家。他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 年代一个样，60 年代不一样了，70 年代就更不一样了。”【4】

70 年代末，邓小平的讲话主题再次重现了学习外国经济和技术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5】。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们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的过程中，引进外国思想和学习外国经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二、引介苏东改革理论和经验

从思想理论到中央计划体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与中国比较相近，而且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们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便已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事实上，中国改革先驱孙冶方和顾准的改革思想与东欧早期的改革思想几乎一致。所以，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很自然地始于学习苏东改革理论。学习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该院的经济研究所牵头，所里的主要经济理论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留学。

1979 年到 80 年代初，中国与苏东国家经济交流活动频繁。中国方面的出访包括：孙冶方 1978 年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刘国光、柳随年 1982 年访问苏联，廖季立 1983 年访问匈牙利。苏东方面的来访包括：1979 年，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 (Maksimovich) 访华；1981 年，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 (Włodzimierz Brus) 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 (Ota Sik) 分别应邀到中国社科院讲学，吸引了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众多经济工作者到场，会场座无虚席，他们还与中国著名经

济学家薛暮桥、廖季立和马洪等座谈，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那时，中国已经恢复世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讨论世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报告草稿。吴敬琏和刘国光来找我，提议请世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我当即应允协助。这就是 1982 年 7 月在浙江莫干山一个避暑山庄里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 (Julius 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考斯塔 (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肯德 (Peter Kende)，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格兰尼克 (David Granick) 等。

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其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加难以估量。根据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中国经济工作者的状况，并观察后来中国的情况，我认为这种交流对以下三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6】

首先，东欧经济学家不像中国经济学家那样脱离国外经济理论，因此他们可以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将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指出，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源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原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然而究其根源，这些问题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改革经验后，中国经济工作者加剧了对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虽然可以洞察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但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机制”，都暴露出重大瑕疵。“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中国的改革前辈敏锐地质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别是靠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克等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特别是根据计算机精确算出的数据调整价格的方法。即使用计算机处理众多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也绝不可能同时算出数以万计的价格！

再次，东欧专家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认为东欧改革经验不大适合中国，中国需要另谋改革出路。这一点同样可以从“莫干山会议”得到证明。会上讨论了中国改革应采用“一揽子”方法还是分步进行，所有与会东欧专家都强烈建议“一揽子”方法。然而，他们在会后到中国几个城市考察，考察途中便改变了想法。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贫困现象严重，综合改革所需要的人才和资金匮乏，物资储备薄弱……总之，中国总体上经济落后，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犯错误的余地，所以专家们最终转而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他们认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和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分步进行。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来自东欧、世行（包括伍德【7】和我本人）以及中方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8】

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已取得成功，推动了整体经济增长。没有一个苏东国家有这样的改革经历，中国的改革前景令东欧来访专家受到鼓舞。布鲁斯等坚信，尽管可以预见中国在城市改革中会面临困

难，但这场变革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理论及改革发展情况已渐渐脱离了东欧改革模式，东欧经济改革理论明显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与苏东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日渐增多。1989年3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在莫斯科召开“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力量”圆桌会议，会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学家董辅初代表中国发言，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发展》，详尽介绍了中国改革的情况。他分析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如双轨制，又如通过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而不是国有部门私有化来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情况，等等。我以世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身份参会，明显觉察到，除了已取得成功的中国农村改革外，苏东及西欧专家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明显有所质疑。他们认定中国改革会日渐消退，最后将如苏东一样，以失败告终。两种思路从根本上支配着苏东经济学家：一是在中央计划体制的框架下，改革应依靠高技术来提高计划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市场的作用；二是在西方专家的怂恿下，后来逐渐成为主流的一种思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即实行全盘私有化，并以激进的政治改革与之相伴，甚至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改革放在优先位置。众所周知，在随后20年里，苏东国家采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既不是原来的路径，也不同于中国的选择。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这一点有目共睹。

### 三、世行报告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

除了学习苏东改革思想，中国还从世行的两份经济考察报告中认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第一次经济考察是因为中国向世行申请贷款，第二次考察则是应中国领导人要求而进行。正当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明显发觉苏东改革思想和经验的局限性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应用，对中国融入主流经济学思想理论和迈向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0年5月，中国恢复世行席位。同年7月，世行派高级代表团来华，磋商启动中国业务事宜。作为代表团成员，我的任务是组建工作小组，来华进行经济考察，向世行董事会提交一份考察报告，这是启动贷款项目的第一步。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世行最好的经济学家和行业专家组成的30人考察团，按行业分组，包括经济组、农业组、能源组、工业和交通组。考察时间是1980年10月至12月，每个小组轮流赴中国各地一个月；考察地点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

由于几十年的对外封闭，外国专家到中国各地考察经济情况的安排让负责接待的官员有些不知所措。他们心里没底，不知道考察团到底需要什么信息和数据，因为这可能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他们还担心考察团“另有目的”。我心里很明白，尽管中央领导已决定跟世行全面合作并开展这次经济考察，但配合我们具体工作的官员仍旧顾虑重重。

为增强这些官员对世行考察团的信任，我们商定，由中方指派一个工作组，跟我们并肩工作，一起参加所有会议，凡是收集到的信息和数据，双方各持一份，报告的每一稿也都请他们过目。同时，

我们请中方工作组提出他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并加入报告中。这一模式显然很成功，在随后几十年里，世行延续了这种做法，所有的经济考察团都有类似的工作组。

与世行首次考察团一起工作的中方工作组成员包括财政部的星光、朱福林，国家计委的郑立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此外，各相关行业部委也派人与考察团行业小组一同工作。跟考察团工业组并肩工作的其中一位主要的中方人员来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后来去了政府部门，这个人就是朱镕基。

世行的这份考察报告，在“概要和结论”部分就考察目的写道：“近年来，中国境内境外都在争论两个相关的问题：自 1949 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为中国人民服务方面做得如何？同时，非政府因素、政府制定的政策以及政府自身的经济管理体制都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这份中国经济考察报告将初步尝试讨论这些问题，同时探讨这些问题对未来政策的影响力。”1981 年 3 月，考察报告初稿递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报告包括主报告和多个附件，涉及统计制度、基本数据统计表、农业、工业、能源、交通、对外贸易、金融、人口、卫生和营养以及教育等多个行业。6 月，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正式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根据这份报告，世行随即批准了中国政府首笔软贷款——大学发展项目，同时确定了中国申请世行软贷款的条件。报告满足了世行中国业务的需要。

世行第二份考察报告是应中国领导人的特别要求而准备的。1983 年 5 月 26 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赵紫阳分别接见由克劳森行长率领的世行访华团，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邓小平向代表团讲述了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想法及国家的长远目标。他说，中国刚刚决定启动一个发展规划，要在 1980 年至 2000 年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赵紫阳说，他看了世行第一次中国经济考察报告，很有意思，很有用。他们请世行再组织一次经济考察，针对中国未来 20 年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要根据国际经验，为达到中国上述发展目标提供一些可选择的建议，并对这一目标做可行性研究。

遵照中国领导人的提议，世行第二次经济考察于 1984 年正式启动。由经济学家及各行业专家组成的这支庞大的考察队伍，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共花了九周时间进行考察，地点方面同样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1985 年 2 月，带有六个附件（教育、农业、能源、经济模型与预测、国际视角的经济结构及交通）的主报告草稿被提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3 月，我和伍德作为报告主笔人再访北京，与中方工作小组深入讨论报告草稿，受到中央和财政部领导接见。

1985 年 5 月，题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报告尝试根据多部门模型预测可能的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经济快速增长及 20 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可行性表示认可。报告同时指出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途径，尤其强调指出：以服务业和更有效地利用能源两方面为基础的途径，与主要依靠快速工业化为基础的途径相比，增长速度虽然相同，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达到更好的平衡。报告还详尽分析了农业、能源、技术、交通、工业分布、内外贸易、人

口、教育、就业及社会等问题，包括收入差异、社会保障、住房以及社会服务等问题。

上述两份报告除了满足世行和中国政府的工作需要外，也破天荒地创造了由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透彻分析中国经济情况的先例。这标志着中国在经济思想对外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有了突破。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一，两份考察报告证明了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科学客观地进行经济分析的可能性。报告中的分析均基于合乎逻辑的理论、统计数据及国际经验教训，目的不是限定或改变中国的发展目标——例如关于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当时国内外许多人士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而是单纯地对如何更快、更有效地用较低代价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提出建议。

其二，与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在华讲学及出版论著相比，这两份报告更多地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其中既有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又有计量经济学、经济模型这样复杂的分析工具。通过两份经济考察报告，这些工具的使用得到广泛传播，让中国经济工作者坚信现代主流经济学适用于中国。赵人伟后来告诉我，当年他把世行第一份经济考察报告念给躺在病榻上的孙冶方听，除了在西部特困地区人口移民问题上保留自己的看法外，孙冶方完全同意世行专家的意见。1985年考察报告里提出的建议，则对中国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发挥了作用。

#### **四、“巴山轮会议”引介宏观调控国际经验**

到80年代中期，通过自身的改革经验和对东欧国家改革失败教训的了解，中国领导人及矢志改革的经济工作者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必须突破苏东框架，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前进。众所周知，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方向，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87年，这一说法被进一步表述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最终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思想已经清晰地显现出市场经济的轮廓。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就突显了这一特点。

此次会议的召开源于中国领导人的建议。1985年初，国家体改委的廖季立约我见面。他说，体改委领导建议世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一下这些题目：（1）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2）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3）关于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我们商定，与国际专家需要有以上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中方与会人员则应包括政府各部委参与制定政策的经济工作者和研究机构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会议不能只请国际专家做演讲，而是要为中外与会者提供一个深入交流的平台。随后几个月里，我、廖季立和体改委指定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秘书长洪虎多次见面，讨论会议如何满足领导的这些要求。

1985年8月底，外国专家应邀抵达北京。8月31日，中央领导接见与会外国专家及部分中方专家。随后，与会人员飞往重庆，并于9月2日在那里登上一艘名为“巴山”的长江游轮，“宏观经济管

理国际研讨会”就在这艘游轮上召开了，俗称“巴山轮会议”。9月9日，会议结束，游轮在武汉靠岸。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会场，是为了保证与会人员一周内不受日常工作的干扰，专心开会，也是为了让与会的知名外国专家不用离开会场就能欣赏中国最美丽的风景之一——三峡。受邀外国专家还被允许偕夫人同行。会议期间，游轮经常靠岸，夫人们可以上岸游览长江沿岸的小镇和景点，会议则照常进行。其间仅休会半天，全体与会人员下船，游览了“小三峡”。

在游轮上开会，最大的限制是空间太小，只能容纳有限人数。中方参会人数因此受到严格控制。最初的中方参会人员名单只有高级领导和一些长者，经一再磋商，我们议定，与会中方人员应代表不同年龄段，遂特意预留了几个40岁以下的青年参会名额。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在随后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几位青年与会者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这样，中方与会人员真正做到了老、中、青三结合——老年与会人员包括安志文、薛暮桥、马洪、童大林等；中年与会人员包括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项怀诚、赵人伟等；青年与会人员包括郭树清、楼继伟等。

在与会外国专家的选择上，除了日本的小林实是中方直接邀请的以外，其他专家均严格按照中方领导提出的三个题目，有针对性地邀请：

关于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有三位专家：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时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几年前因论证金融市场与消费/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及物价关系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论述稳定和增长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十年来的新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英国著名政府官员、国际公务员阿莱克·凯恩克罗斯爵士（Sir Alec Cairncross），经济政策领域知名学者，曾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英国政府经济顾问、英国政府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德国著名国际货币政策经济学家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多年担任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该行是发达国家中最独立的中央银行。

关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恩克罗斯和埃明格尔分别在英国和德国负责放开价格管制及市场复兴工作，而且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制定反通胀措施及解除价格管制方面有着直接的经验；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是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问题的专家，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讲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微观经济要求。

关于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邀请的专家有：法国前国家计划办公室主任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南斯拉夫稳定委员会、政府经济改革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巴伊特（Aleksander Bajt）；美国经济学家里罗尔·琼斯（Leroy Jones），他专门研究韩国经济，曾在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过，这次会议没有直接从韩国邀请专家，后面我还会谈到。

今天，大家公认“巴山轮会议”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转折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很多中方与会者撰写了文章，谈论自己的感受和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此补充几点：

第一，纠正一下外界的错误印象，如前所述，并非世行主动提出组织这次会议。实际上，会议的组织，包括游轮会场的选择，都是遵照国家体改委领导指示进行的。会上安排了全体会议、小组讨论，也有一对一的会谈，无论哪种形式，都能进行到夜里。在世行工作多年，我的亲身体会是，讨论政策问题最奏效的方式是由需求驱动，进而专为满足主办国的需求而策划讨论活动。在我看来，“巴山轮会议”是由需求驱动的杰出案例。

第二，尽管在 1984 年已经决意突破中央计划体制的限制，但中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方式缺乏了解，他们尤其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盲目竞争和非指导性增长充满顾虑，并且不可避免地想到经济迅速增长期之后的大萧条。“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已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的自由放任政策发展到了 80 年代的总需求管理及宏观经济的积极应对政策。很多讨论围绕着通过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工具管理总需求，以间接方式管理市场经济等议题进行。

第三，国家体改委领导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 1984 年下半年到 1985 年上半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过热。如果中央大幅推进改革，很可能造成地方政府争相增加投资项目，企业设法提高工资和奖金，结果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因此，宏观经济形势管理成为“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具体包括诊断经济过热、使用财政和货币工具应对问题等。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三位专家来自三个不同国家，尽管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见解不同，各自代表着经济理论的不同派别，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经济过热问题。从这三位具有丰富宏观管理经验的经济学家到熟悉发展中国家经验的世行经济学家（伍德和我本人），再到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与科尔奈，在分析中国这个问题的缘由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方面，都持有同样的观点。这显然表明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核心特点，那就是它并非个人的或政治的解释。

第四，“巴山轮会议”还有一份意外收获，这份收获很少有人谈起，但在我看来，它对后续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理论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在“巴山轮会议”上，与会国际专家有机会与中国青年经济工作者交流，聆听他们对中国改革问题发表见解。凯恩克劳斯爵士对此尤为用心，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在中国未来经济改革中将大有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懂得现代经济学的年轻一代。回国后，他向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提议，在该中心专门为中国设立“经济培训项目”，培训青年经济学家。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需求，他们共同设计了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特点的现代宏观经济管理课程。1986 年至 1994 年，每年有五名至七名具备经济学专业背景和综合潜质并已参与改革实践的年轻人，由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推荐，经世行中国代表处官员面试，在世行、联合国开发署、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联合资助下，到牛津大学学习现代经济学课程，其中包括到英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或投资银行实习，为期一年。几名学员随后继续留在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该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约 50 名学员，他们绝大多数学成回国，投身于中国经济改革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山轮会议”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对于韩国这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施经济计划的讨论就不太深入。所以，两年之后，世行再次应国家体改委提议，组织了一次题为“计划与市场”的研讨会。会议地点选在曼谷，目的是方便从韩国邀请高级代表团参会，时间是1987年6月。韩国代表团团长是前副总理兼韩国发展研究院（主管韩国战略规划事务）院长金满堤（Kim Mhnn-Je）。有意思的是，这次会议竟让印度代表团受益匪浅。印度代表团团长是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时任印度计委常务副主任（主任由总理兼任），副团长是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当时的总理经济顾问。在会上，这两位印度资深经济学家被中国矢志从根本上推行经济改革的决心所打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启动改革计划，总策划人就是改任财政部部长的曼莫汉·辛格，阿卢瓦利亚是他的副手。曼莫汉·辛格后被称为“印度改革之父”，并于2004年至2014年任印度总理。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会议一直是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工作者学习国际改革和发展经验的主要途径，会议主题则从宏观的战略改革问题逐渐转移到更加具体的职能部门问题上，例如世行与国家体改委于1986年联合召开的“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和1987年的“国有企业管理和组织国际研讨会”等。

从90年代到现在，中外经济工作者、实践者的交流和对话越来越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活动都是由中国国内机构与不同的外国机构、以不同的层次及多种多样的形式组织的。其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是1993年6月在大连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也被称为“大连会议”。这次会议给我提供了再次参与中国改革的机会，也成为我重返中国的一大契机。

## **五、组建中金公司，助推国企和金融改革**

1990年，我离开世行中国代表处回到世行总部，负责西非各国事务。20世纪70年代，我曾作为世行经济学家常驻尼日利亚拉各斯。我遗憾地发现，在这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尼日利亚和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明显改进，有些领域反而呈现倒退情形。此外，我在世行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常驻，已不大习惯世行总部的文化氛围。这一切都令我十分怀念在中国的工作。

1992年底，老朋友刘国光在华盛顿和我见面，我向他透露了心事，他听后对我大加鼓励。回国后的12月5日，他向朱镕基副总理写信，转述了我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想法。朱镕基副总理在信上批示了四个字：“是件好事”。这对我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1993年3月，世行安排我去哈佛商学院参加“高层管理课程”（Advanced Management Program）。三个月的学习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了解到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比如投资银行，可以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时，我异常兴奋。事实上，90年代初，中国已有不少经济工作者在探讨发展资本市场的可行性。与此同时，许多外国金融机构也正千方百计地进入中国市场。我当即萌生了重返中国的念头，期盼着自己能在中国金融领域的迅猛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在不少中

国朋友的建议和支持下，完成哈佛商学院的管理课程之后，5月28日，我写信给朱镕基副总理，提出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投行的想法，并请求面谈。80年代考察中国经济时我便与朱镕基副总理相识，后来他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与世行代表处也有业务往来。

6月10日至12日，世行中国局邀请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连会议”，这对我来说可谓恰逢其时，因为很可能有机会面对面地向朱镕基副总理说明我的想法和建议。果然，会议结束前一天，我接到来自北京的通知，朱镕基副总理同意见我。于是，我启程前往北京。

6月13日，在与朱镕基副总理的会见中，我们谈到了企业重组和兼并，讨论了如何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用行政手段来推动这项工作。我们还谈到了中国需要外国资本发展基础设施，以及如何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谈到了投行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朱镕基副总理说，合资投行可以提高内资和外资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改善整体市场经济中的投资决策。会见结束时，他鼓励我试着在中国创建一家合资投行。

此次会见后不久，我毅然决定重返中国，帮助组建一家合资投行。我的想法得到世行总部的支持，特准我停薪留职两年。12月17日，我向朱镕基副总理递交了设立一家合资投行的申请。文中说：“希望在中方的支持下，联合外方一些机构，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标准和惯例的投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可以在国际上募集巨额资金，更可以推动和帮助国有企业改革，为国家金融改革和人才培养做出示范。”这份申请由中国人民银行陈元副行长转呈。

改革试点想取得成功，中外机构能否有效合作至关重要。因此，在公司的股权设计方面，我们决定中外双方各持股50%，这样不会一方独大。在数月的斟酌以及多方、多轮谈判后，摩根士丹利最终成为外方大股东，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外方小股东。中方大股东是中国建设银行，小股东是财政部与经贸委下属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经过近两年繁复的筹备、多轮的复杂磋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简称“中金公司”）终于在1995年6月25日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获得中国首份中外合资投行营业执照。

成立至今，中金公司无疑取得了成功。作为发起人之一，我为自己当年在哈佛课堂上萌生的念头和随后的决定深感欣慰。我在投行领域毫无实践经验，在这之前的职业生涯也从未涉足商业企业。中金公司成立后，我的作用不再明显。担任首任总裁仅几个月后，世行特准我两年的停薪留职期限也到了，我完成了重返中国的使命，于1996年1月返回世行，直接到新德里，主管世行印度业务。

中金公司创业的功绩主要得益于首任董事长王岐山领导下的中方管理团队，他们的共同努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获得顶级国际投行技术，公司起初三年全权委托摩根士丹利进行业务管理（后延至五年），这在当时是个大胆的举措。事实证明，这一安排对实现彻底转让投行管理实务和技术是完全必要的。为确保公司长足发展，在合规、风险管理、员工薪酬和激励等方面，中金公司采取了符合最先进国际惯例的市场化做法。

回顾这一历程，作为改革试点的中金公司可以说是中国金融改革中的一次思想对外开放。当时的中国正致力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投行是新生事物，更何况这是一家中外合资投行。中金公司在国企改革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大大提升了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还培养了一大批投行专家，成为中国投行界的“黄埔军校”。从成立到现在，中金公司有千余名员工到海内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公司早期管理团队成员均成为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高管。由此可见，中金公司在申请成立文件中描述的愿景已经基本实现。

如前所述，邓小平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号召“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中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精神。在 2005 年的“中金论坛”上，首任董事长在论及中金公司的发展历程时总结道：“改革开放激发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对资本市场提出了要求，中金公司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中金公司既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的组织创新，也体现了它的制度创新。中金公司起到了试点、探索和‘领头羊’的作用”。

## 六、新世纪的理念和思想引进

2002 年，我从世行退休。彼时，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新的挑战。吴敬琏等几位老朋友积极鼓动我继续为中国做些政策研究，像以前一样，引介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和前沿经济思想，我欣然答应。非营利、非政府、非机构化的“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China Economic Research and Advisory Program）就这样诞生了。

项目研究的工作由一个顾问小组指导，顾问们都是当年与我共事过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作用是确定研究课题，确保研究内容与中国优先考虑的经济发展问题相关。课题确定后，我们根据实际需要，邀请一组相关领域的国内外最著名的专家组成研究团队。研究方式是：中方专家介绍相关情况，外方专家介绍相关国际经验，双方并肩工作，共同完成课题报告。该项目旨在通过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促进中外学者、官员之间的交流，从国际视角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通过与国外知名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合作，提高中国经济学者、研究机构及其人员的经济政策分析、研究能力。

在中金公司董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郑国枰的积极推动下，项目的前期课题研究主要由新加坡政府资助。后期研究工作则主要由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提供资金和行政支持。这个基金会是“巴山轮会议”之后牛津大学“经济培训项目”的产物，是该培训项目师生为纪念凯恩克劳斯爵士发起成立的，宗旨与我们的研究项目恰好一致。

“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的首个研究课题“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在全体顾问一致建议下启动的。2004 年 10 月，课题报告《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问题及对策选择》完成。报告及政策建议提交到国务院后，课题组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切接见。接见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下一个课题应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2006 年 6 月，这一课题的报告《中国与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和选择》完成。在项目顾问的提议下，我们随后着手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政策问题和

选择》课题报告于 2007 年 5 月递交到中财办。

各项研究成果适时地以不同方式得到推广，达到了预期目的。此后几年，中财办的关切成了我们的研究方向，项目顾问鼎力支持据此确定的研究课题。例如为制定“十二五”规划，受中财办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委托，项目组开展了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30 余名中外著名专家参与，听取了众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意见，2010 年春节前完成了课题报告《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并于 2011 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报告还荣获 2016 年度第十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2011 年至 2012 年，我们继续开展了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 结语

当前，中国经济学无疑早已结束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状态，理论和实践上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行列。这应该被看作是中国在经历曲折之后恢复正常状态。

这里有必要区分改革和开放。经济改革并不是一种新的提法——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就已经逐渐显现，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都做了种种努力，试图克服这种弊端。与此相对照，40 年前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外国思想制度的开放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它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

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开放和具有技术创新活力的国家。唐宋时期，在 60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艺术、文学、科学和经济技术等领域都是最具创造力的。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文化和技术能力的社会，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可是，14 世纪之后，中国没能通过自身的技术变革和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有效利用来保持经济增长。实际上，在 20 世纪后期之前的 500 多年里，中国拒绝并抵制外国的思想和制度，自明朝后期以来，变成了一个以内向型为主导的经济体。1800 年前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技术上超越中国。在接下来的 150 年里，这种差距日渐扩大。1850 年前后，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大约处在势均力敌的发展阶段，但 100 年以后，日本已经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20 世纪中期，中国和印度（另一个历史上发达而现代经济落后的国家）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当时，既没有任何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转型的宏伟蓝图作为引导。因此，这样一种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试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遭受了经济重创，大部分东欧和中亚国家经历的经济衰退甚至比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大萧条”更严重和持久。中国是唯一一个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取得持续和快速增长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

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展现了过人的勇气和远见，他们吸收国外新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将之转化并应用于实践。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们采取

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和“试错”的方法，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领导者能够如此成功和明智地把国外新的经济思想转换为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政策。

在中国过去 40 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外新的经济思想、发展理念、国际经验和教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为了全面建成经济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正在继续深化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有很多国际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和汲取。同样，也有许多国家能从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学到经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元素。

在这 40 年里，我以国际组织官员和经济学者的角色，经历和观察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较为完整地参与了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开放，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也将成为我人生中难忘的记忆，我感到无比荣幸。从个人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海外华人参与和体验这一过程，我觉得意义尤为不同。

【1】中国在 1945 年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创始成员国，1949 年后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占据，直至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 年至 198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中国均无业务往来。

【2】麦克纳马拉晚年经常提起，通过 1980 年那次与中国领导人的简短会晤，他坚信，中国不仅把世行当作资金来源，而且要充分利用世行席位带来的所有机会。

【3】《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1 页。

【4】张树军：《小平在 1978》，《南方人物周刊》2004 年第 14 期。

【5】张树军：《小平在 1978》，《南方人物周刊》2004 年第 14 期。

【6】这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人伟（后任经济所所长）大量参与接待外国经济学家的活动。1979 年布鲁斯来华讲学期间，他全程陪同；1980 年世行第一个经济考察团考察期间，他是中方工作组成员；1985 年，他是“巴山轮会议”与会人员。林重庚没能亲身经历的一些情况，均通过赵人伟得知。

【7】在世行首批中国工作队队里，主管经济学家是伍德（Adrian Wood）。从 1981 年到 1985 年的两次经济考察报告，从 1982 年的“莫干山会议”到 1985 年的“巴山轮会议”，伍德一直与林重庚并肩工作。1985 年，伍德离开世行，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现已退休，仍然坚持从事中国经济研究。

【8】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在 1982 年 8 月 10 日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报告中介绍了相关情况。参见《薛暮桥文集》第 9 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年，第 268—276 页。❏

[【返回目录】](#)

## 张五常：从邓小平的智慧来说说中美贸易之争

[张五常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创始人之一，其著作《佃农理论》获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本文转载自 2018-07-10 微信公号经济学家圈 ID: dalianpapapa]



本文作者张五常教授

### 1. 盗非盗：从邓小平的智慧说起

朋友传来一篇英语文章，是 Peter Navarro 写的。此君以敌视中国知名，写过一本题为《中国致命》(Death by China) 的书。目前他是特朗普总统的制造与外贸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顾名思义，他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可以致命。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看法，但这些年特总统的言论，主导着的贸易战，有这样的味道。我曾经说过，特总统是奸商，竞争要把对手杀下马来。然而，国际上的贸易，基于互相得益，要赚他家的钱你要让他家赚你的钱。

Navarro 的文章是为特总统辩护，题为《特朗普抽进口税是为了防守中国的侵略》。文内的重点，是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科技知识，提出一位中国的女士因为这类盗窃而认罪的例子。那所谓工业间谍活动 (industrial espionage) 在美国历来是大话题，这方面的盗与防盗，花上的钱每年以百亿计。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给我资助，要求我考查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这些难度甚高的话题。无论是深度或广阔度，在经济学者中没有另一组人比我和几位助手调查得更全面。但我说过，

因为难度太高，我们以失败收场。话虽如此，如果读者参阅我的《英语论文选》中的《产权与发明》那章，会知道我们当年的考查与研究是有着深度甚高的一面。

## 2. 中外合资的成因

说今天特总统要大手征收中国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税，其中的科技知识是从西方引进，是没有疑问的。不是局部——是全部。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的干部朋友，读过大学的，对外间有点科技含量的产品所知一律是零。邓小平比我知得早：一九七五年他就说中国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才可以把经济搞起来。那当然，但要怎样才能把西方的科技引进呢？

关键是一九七八年十月，美国通用汽车的董事长造访中国，提出与中国合资经营 (joint venture) 这个当时中国人没有听过的安排。这建议传到邓小平那里，他说：“合资经营可以办。”一九七九年七月，邓老提出的选择合资的理由清楚明确：

“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 3. 研究同学执到宝

十多年前，一位在内地念经济研究院的同学，拿着八套中外合资的合约来找我，不知是怎样弄来的，问这些合约提供的数据可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所有合资皆以五十、五十合股。真巧，这些合约中竟然有中方与通用汽车的合资合约。见到这批真实的中外合资合约的样板，我只翻阅几分钟，就跳起来。每项合资有几份合约，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说明科技的投入与商标名牌的收费，说明外间的银行户口号码，中方要按时汇款。这是说，除了合资所获的分成，中方还要付的是商标、科技等费用。其他七家外资跟中国的合资合约也大约如是。真替通用高兴，今天，他们的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比在美国还要多。

当我见到那些合资合约时，感到震撼，因为意识到，合资之外，一个街上人看不到的要点是商业或科技秘密的租用。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容易，但牵涉到商业秘密租用的合约很困难，因为秘密这回事，一经外泄就去如黄鹤，无法收回。一项值钱的商业秘密，要找买家，不容易写出给秘密的拥有者可靠的保护的合同。一般的习惯是：你要把值钱的秘密给我考虑购买或租用吗？先给我签一张如有外泄我概不负责的合约（称 submission agreement）吧。

这里的问题，是一部汽车必有多项发明专利的保护，这些专利是什么发明在申请注册时一定要公开说明，今天任何人可在网上找到。商业秘密没有明确的保护。任何人见到成果而可以追溯成因或可复制出来的，法律皆不能保护。像云南白药那样能历久地守秘的例子罕有。问题是一般的商业机密不

像药方那样清晰明确。一项做生意的程序可以是重要的秘密——好比多年前美国一间航空公司出售机票的程序就曾经惹来商业秘密盗窃的官司。相比起来，一间有斤两的工厂，其产出程序及无数的其他数据一般要员工守秘——美国工厂的运作，很多琐碎的事项不要让外人知道。中美签订的合资合约容许中方知道产出中的无数方法与程序，合资可以协助守秘，因为外资可派人到现场监管。

#### 4. 市场换技术发展

这就带到另一项有趣的发展，也跟邓小平有关：市场换技术。这里的理念是说，外资到中国设厂，科技含量越多，中国会越开放本土的市场给有关的外商。这个理念起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那么早有点奇怪，因为那时中国还算不上有什么市场。但邓小平显然是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发展起来将会是非常大。始于一九八二年沿海的经济特区。本意是外资到特区设厂，必须外销，让中国赚点外汇。跟着的改变是，如果外资的工厂带进可观的科技，内地的市场可放一点给该外资。

市场换技术这项战略性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变得清楚明确。记载说：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这个问题要解决（即打开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局面），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换取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凡属外商确实提供了先进工艺、技术、设备的产品，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允许一定比例内销；国内紧缺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要允许内销以替代进口……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

这里要注意，市场换技术是不需要跟中国合资的。这是说，要在中国设厂制造出口货，可让中国赚取外汇，欢迎，但要卖到内地市场赚钱，那么你设的厂要有相当的科技才成。换言之，来自香港的无数的所谓“来料加工”的厂商，其产品一律要出口，管得很严。

作为经济学者，我不能完全同意上述的政策，但北京上头就是这样处理，而跟着的科技引进无疑是成功的。今天外间见到的有相当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其科技知识不是盗窃而得，也不是明码实价地在外间市场买回来，而是通过合资与“市场换技术”弄回来的。

听说北京将逐步取消合资的规限，到二〇二二年全部取消。我认为可以早点这样做：只要有点科技斤两的外资进来设厂，不能不多用中国的员工，其科技知识会扩散，虽然不及合资那么快，但够多可以弥补。这里的有趣问题，是如果让外资自由选择，我认为他们大多数会选跟中国合资，虽然中方的股份多半会低于百分之五十。他们会要求合资，因为有中方的参与所有经营必须办理的手续会来得远为容易。这不是说在中国经商的手续格外麻烦，而是外商不容易弄清楚什么是门什么是路。

#### 5. 深圳是邓小平的代表作

今天，中国每年申请国际发明专利的数量超越了日本，估计约两三年会超越美国。这些数据不一

定能正确反映科技的进度或水平，何况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国科技迈步前走的证据，是深圳的发展。那里中外名家云集。年多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的发展会超越硅谷。这推断主要是因为该市有一个工业重镇——东莞——在旁边。十年前东莞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一片萧条，今天，深圳的急速发展扩散到东莞与惠州去，导致这两个城市的楼价跳升。



深圳成为国际化现代都市，是改革开放的成功案例

是深圳之幸。东莞的工业不像昆山那样，厂家各有各的产品牌子，也不像苏州工业园那样，厂家各有各的名牌。东莞有的多是接单工厂。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机构，要造一件产品的样板，东莞可以立刻做，快而精。这样的服务硅谷没有。难怪天下的知名品牌今天纷纷跑到深圳去。

回头说“中国致命”这个话题，我怎样也想不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整体会有害。美国某些行业需要转型，某些行业需要放弃，但整体而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一定是利大于害。美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率，是里根总统以来最好的。去年我对一些朋友说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机会超越里根一九八四年的六点八五。现在看不会。贸易的保护政策历来是害人也害己的。❏

[【返回目录】](#)

## 田国强：大国战略之定力、改革与全球化

[田国强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共同主编，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 主编。本文首发于 2018-10-17 财新网，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田国强教授

**作者按：**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关系越来越紧张，似乎有向其他方面延伸的势头。其走向如何，关乎世界格局、关乎中国国运。对于贸易战打还是不打？打的话，怎么打？会面临什么后果？不打的话，如何有效应对？对内如何应对？对外如何应对？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各界观点纷呈，莫衷一是。近期，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改革开放往何处去有媒体记者问了我以下九个问题，我想这些也是大家都在关心、关注的问题。故此，我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形成了以下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给出了我的大致看法，每个问题相对独立，可以有选择地看。

### **应尽力避免让中美竞争关系滑向敌对关系，中国还要韬光养晦**

**Q1：**贸易战前后的见闻，以及美国经济界对贸易战的看法。

**A1：**近些年来，特别今年以来，我对中美关系走向越来越担心，可说是忧心忡忡。中美关系正迈向一个走向影响特别深远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找不到消除双边关系紧张的途径，排除双边的战略误判，就很可能往一个更负面的方向发展，进入更多方面的战略竞争，甚至是全面对抗，弄不好会导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局势紧张，演变成多方面的敌对，从而必将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稳定和世界和平。此前 30 年来，中国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但由于国体差异的原因，我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认为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为什么我的看法近年来有这么

大的转变呢？由于中国国力不断上升，近些年来双方的基本心态和内部舆论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从而民间、学界、智库，媒体对双方的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双方缺乏足够的信任，导致中美各方面的争论和冲突越来越大。在美国，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为代表的对华“鹰派”势力先后掌握了贸易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这些“鹰派势力”就是希望不断把贸易战的规模扩大化、长期化，将中美良性竞争合作关系转化为敌对关系，将中国取代俄罗斯视作为最大竞争对手，甚至是敌手。



2018年11月6日，中国的老朋友95岁的基辛格

在新加坡参加彭博社举办的“创新经济论坛”上就中美贸易摩擦谈到：

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应避免陷入“细节的泥潭”，应当先相互解释双方正在寻求实现的目标，以及能够和不能做出哪些让步；并表示他是以中国式的思维来看待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也可以看做是他对当下华盛顿思维的一种反思

**而在国内，不少人仍将中国崛起的竞争关系与敌对关系混为一谈，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味地视对方为敌方。其实，大国崛起也可以是良性竞争关系，比如美国与英国，日本与美国，但不见得就一定是敌对关系。加上我们不少学者和媒体舆论对自身国力的过分渲染、误判和外交上越来越强势，同时政府主导经济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优势，民间和学界的盲目自大及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度民粹主义等多重原因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和恐惧，从而让许多原本主张对中国友好的人也被推到了中国的对立面去，包括许多中国通活跃在里面。过去的基本情况是，苏俄问题专家都比较反俄，中国问题专家基本亲中，而现在发生很大逆转。特朗普政府不仅重用了一批入华、知华，对中国政府和政治有亲身感受的中国通，更启用了一批仇华、反华的强硬派。尽管美国主流经济学界依然是支持自由贸易的，对莱特希泽、纳瓦罗等的经济观点大多持不同意见，对特朗普以缩减国际贸易顺差为目标的关税政策大多持否定立场，例如萨默斯、克鲁格曼等，但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民间智库对中国经济模式及其走向大多不太认同，包括对中国**

友好的政界人士。例如 2005 年提出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最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就提到了四个方面的担忧：国企的作用；中国的外交策略；中国制造 2025；除特朗普之外美国其他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贸易战前后，我就由于态势的重大转变而感到不妙，在今年 6 月的上海财经大学宏观年中报告中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的国际环境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围堵中国的现象日趋严重，经贸摩擦不断加剧，并且这只是表象。……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有被激发放大的倾向，心理脆弱，缺乏自信，看国外无论什么都是阴谋论或陷阱，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优势，试图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但媒体和学界基本没有认识到形势的迅速恶化，都在一味地出谋划策怎么打贸易战。

针对这种现象，我在今年 7 月一个讨论改革的微信群中也提到：“我们缺少像春秋战国时有那么多极高水平的战略家和谋士，或像基辛格那样的战略家，或懂当代博弈论专家学者我看国内也很少。现在我看到的绝大多数文章就是告诉政府怎么去打贸易战，而不知道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化解战争而不是一味想着战争，是怎样去化干戈为玉帛，让态势和结果有利于己方。我不是国际关系和战略方面的专家，但我的判断是要权衡中美经贸摩擦，仅仅只是从经济层面上考量中美两国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如此，有理有据，站在全球视野和中国长远利益的高水平智库报告很少，而是将自己的理想等于现实来考量和处理问题。另外，要尽量做到，无论美国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我们的战略不能出错，并且上策是怎么让自己战略影响到对方的战略，让态势转化到有利于己方，而不是完全被动。我们当前的一些政策和战略容易被一些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被语不惊人死不休，要就是不是训练有素或浑水摸鱼唱高调的人影响。”仅仅几个月过去，形势迅速恶化，我的这些担心和判断不幸成真。

Q2: 美国发动贸易战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A2: 在这次贸易博弈战的战略方面，感觉美国是作了充分准备，有备而来的。从美国副总统彭斯 (Mike Pence) 最近 (10 月 4 日) 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所发表特朗普政府的最新中国政策的讲话中得到了印证，这是一个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的重大改变，对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经济、社会及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海外媒体认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厉的发言，是立场极其强硬的讲话，尽管彭斯提到美国希望和中国建立具有战略性的关系和希望中国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然而，媒体和学界在自我安慰，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拿出有份量，有事实、有数据和量化分析，令人信服的反驳或澄清，没有指出提及的许多例子和事实其实只是整个事件的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或真相，而集中反驳的主要是称彭斯不过是在帮助特朗普助选，转移“通俄门”的矛盾等等，而台湾地区某电视节目女主持人的反驳却要具体的多，许多方面都是有理有据，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从彭斯的讲话可以看到，如果不想尽办法让中美关系危机尽快止血，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将有可能发生巨变。在我看来，他的讲话基本上就是一篇摊牌的宣言书，好像是在下战书，根本就不给自己和对方留退路，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从未发生的，让人十分棘手。更严重的是，尽管许多美国人不喜欢特朗普及其政府，但在应对中国的立场上，特别两党和学界在对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上，贸易战及遏制中国方面没有什么分歧。这样的摊牌和不给自己和对方留退路，是中美关系正常化 30 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让中国作出大的让步的，同时也不像 1989 年政治风波后，美国主动与中国恢复关系和搞好关系，这样的可能性也很小。美国的民意、智库、商会、媒体、两党和几年前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实有无特朗普，中美关系都正快速移向十字路口，今后任何一党或人上台，都可能是将中国作为头号对手。彭斯的讲话弄不好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彻底转向，也意味着全球局势的一个分水岭，这真是到了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及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关头。怎么解脱这种极度的困境，的确需要大智慧，需要冷静和认真思考及处理，而不是意气用事。

由于中国国力不断加强，在全球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美中间动态平衡无疑已经发生改变，现在美方想做的就是形成全方位的统一战线，将中国踢出由美国主导的发达世界的经济圈。的确如此，美国正在采用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要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法宝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跟西方国家全面友好的战略战术，想在西方国家也形成全面统一战线，正在一个一个地通过双边谈判把多边的 WTO 架空，极力否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想形成一切可能的反中统一战线，孤立封堵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壮大，或者使其经济萎缩，或逼中国退回到自闭状态，使之无法分享世界文明进步成果，一旦成真，中国又怎么可能在脱离全球稳定经济秩序下取得飞跃发展呢？

在战术方面，美国发动贸易战之所以底气足，在很大程度上跟特朗普政府通过大规模减税方案带来的经济增长刺激效果有关，也与美国由民营经济主导的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有关。民企天然具有效率优势和创新冲动，民营经济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而我们要就是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举措的重要性，比如尽管学界和民意都希望中国政府大幅度减税，但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特别是近 10 多年来政府税收以近 20% 增长速度上升，或者在市场化改革方面说得多，做得少。而在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业准入壁垒、歧视性政策，同等对待民营经济等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国还做得非常不够，还需要深化改革。唯其如此，才可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了对冲美国贸易战带来的影响，我早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曾提出若干建议：一要降低民企的过重税费负担（放水养鱼）；二要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基础研究、交通设施、网络设施）；三要支持民企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四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有利于高薪吸引人才回国服务）；五要支持人才引进（积极鼓励和支持引进高层次人才）。

Q3: 贸易战的结局有哪几种？

**A3:** 无论贸易战的结局是哪种，都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两败俱伤结果。尽管一方将在这场对抗中胜出，但是最终没有谁能从中得利！对于中美贸易，我们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今年 7 月份发布的《2018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中有详细论述。我们认为，尽管中国对美出口在中国 GDP 中的比重不大，但中美贸易摩擦将显著增加进出口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引发其他风险。中国和美国在货物贸易上相互依存，且中国出口对美国的依存度远远大于美国出口对中国的依存度，中美贸易战将注定是个双输游戏，且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此外，中美贸易仍然以互补性为主，但互补性在逐渐减弱，竞争性在逐渐增强，这是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



美国副总统彭斯 2018-10-4 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发表了中美建交以来言辞最为强硬的长篇演讲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更担心的一点是，美国利用中美贸易战杀鸡给猴看，一边给中国大棒，一边给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各国、加拿大、巴西、日本、韩国等胡萝卜，让后者全面倒向美国，形成围堵中国的同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美国已经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基本上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版 NAFTA——USMCA 协议，并且其中一款基本上是针对中国的排非市场经济体的协议。早前美欧政府间就曾经有过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探讨，可能很快会达成协议，与韩国的自贸协定已经签署，和日本也有很大可能达成类似协议。我们在应对这次由美国发起的贸易博弈战的战略战术方面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由于美国是发起方，中国是被动应战方，处处显得被动，给人的感觉就是显得措手不及，反驳几乎没有什么针对性，更多是大批判式的，甚至是意气用事的空洞口号式反驳。**

中美之间的贸易博弈战和彭斯针对中国的全面开花的讲话，局势演变之快，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

外，学界和绝大多数智库的分析科学性和严谨性严重不足，基本没有起到智囊的作用，本本主义多，不切实际的空谈多，研究方法落后，基本上都只是泛泛而谈的定性分析，没有什么科学性、严谨性的逻辑分析，量化分析和历史比较分析更是没有，许多人给出药方要么就是错误的，要么没有实际可操作性，要么就是过于短视，误导了政府的决策。而美国智库研究一直以来却非常重视政策建议的理论分析、实证量化分析，具有较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比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博弈论刚刚诞生，就被用到和日本具体作战实际中去，起到了很重要作用。对孙子兵法也研究得很透，其分析报告更像是学术论文，其分析看起来非常严谨并且有大量的统计量化分析，尽管许多都是盲人摸象，不是事件的全部真相或事实。如果中国应对不当，没有尽早面对现实和去澄清完整事实，找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共同点，仍然是自说自话，形成不了聚焦和没能消除误判，弄不好就会错失机会，弄得越来越被动。一旦如此，对中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其所追求的中美竞争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无法实现，所剩的选项差不多就是对抗的敌对关系，从而十九大提出来的新征程两阶段愿景目标将很难实现。

其实，在彭斯讲话之前，特朗普对中国在贸易摩擦方面的诉求还是比较明确的，寻求的就是“**三零、两停、一允许**”，即，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移，允许美国人在中国独立开设公司。事实上，在三零和一允许不是单方的，对其他国家也是这个要求，中国实际上就可以以此作为谈判出发点，找出双方能接受的共同点而展开谈判，而不是一些抽象原则的意见或打口水战的各说各话。其实中国政府早已在行动上有所回应，例如针对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关税大幅下调（其实在早前的谈判中，中美已经达成不少共识）。至于“一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许多行业一直都允许开独立开公司，现在是希望中国也给予美国企业这样的对等条件，中国其实也开始准备这样做，并且已经这么在做，如最近特斯拉在上海、埃克森美孚在广东的投资设厂等等。至于“两停”更可以坐下来谈。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强行技术转让，这个从字面上也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并不认为自己存在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移，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存在巨大鸿沟。无论怎样，不要各说各话，鸡和鸭讲，而是应该形成聚焦，坐下具体谈。其实，理性地分析“三零、两停、一允许”这些条件，从更加长期的角度，或者说更加开放的角度去权衡这些条件，这将也是对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有利的。

**Q4:** 达到什么情况，贸易战会停止？

**A4:** 中美两国经贸纠纷问题愈发严重，已升级为中美贸易战，并且向其他层面和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大为上升，这不仅将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相关企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而且会损害中美彼此国家利益，对我们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场贸易战短期内难以停止，如果处理得不好，从小处说有可能扩大化、长期化，变成一个持久战，从大处看弄不好会引起全方位冲突，影响到国运和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走向。**如今再不改善，日后局面发展到不可控制就会凸显今日的贸易战根本就是小事。因此，我们要抓最主要矛盾，从根源上找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办？首先，我想说的是要尽量避免贸易战和重大敌对性的冲突。孙子说得好：“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意味着冲突导致的战争将会牵涉到国家安危，需要慎重再慎重。为此，孙子给出策略好坏的顺序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也就是最佳的结果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没有办法的办法才是像攻城一样的强行进攻。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想办法尽可能促成坐下来有针对性的谈判，比如有可能，两国尽快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尽量寻找和形成双方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忽视或相互指责或敌视，不要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如果真的是一无是处，美国尼克松政府主动靠近中国，而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手主导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对美开放对中国 40 年来的迅速发展和崛起，难道真的没有起到正面作用？而中国的发展和美国与中国的合作难道真的对美国没有帮助？显然这都不是真的，至少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方面及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和美国有过很多合作，并且双方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且获利巨大。还比如，在世界文明方面的一些双方认可的普世价值观方面也是可以形成共同点，而不是相互批判，简单地给予否定，要充分尊重双方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选择。在经济方面，针对美国想要的“三零、两停、一允许”进行谈判，同时还是需要韬光养晦。

为此，我们更需要进一步地思想解放，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真正地而不是口头上进行全方位改革。当然，谈改革不能完全不主动去破旧的制度框架而去谈改革。改革当然就是要改掉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旧的规章制度。所以，我认为谈改革开放是有特定内涵和意义的。现在改革两个字已经泛用，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将改革往回改，往回走，或只说不做，或说一套做一套也称之为改革，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改革就是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及其规章制度和政策进行改变，对体制、机制和制度进行转型才能称之为改革。具体到中国情景，就是要将原有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过多主导和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过多地干预和参与竞争行业，改为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比如，一旦真正要被逼的要实行“三零、两停、一允许”，由于效率和创新力方面的不足，对中国来说难度是相当大的，是非常难于竞争的，要能适应和具有竞争力，就必须下决心深化市场化改革和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以此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

所以，我认为在谈改革开放时，最好加上前置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只有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政府发挥好的、恰当而不是多的作用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内涵而不是其他。并且，我认为这也是美方希望看到的。其实对彭斯的讲话，不必集中在中国是否干预了美国的中期选举等口水仗上和对特朗普的认同及网民在这方面的反应，这些都是处于相对次要的方面。应该注意到他讲话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当前在诸多方面偏离了改革开放的初衷，没有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认为尽管中国政府仍在口头上支持“改革开放”，邓小平的著名政策现在看起来有些空洞。这个更好回应，我们可以讲事实，摆道理，对有欠缺的地方，告知对方，我们正在有序加快速度地在改，当然关键是真正去做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应付。事实上，这对

我们是大有好处的。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最好阶段其实就是改革开放这 40 年，这 40 年有很多可以总结的，其中应该要有一个最重要经验，那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另外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良性的互动，在现阶段，这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况且我们这样做也让对方在这方面没有话说。

特朗普政府的谈判策略应也是有谋划的，包括他之前的白宫顾问班农是少数真正读过《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讲“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美方就在采用孙子兵法在对付中国。难道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是利而诱之和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亲而离之，以此形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国采用的战略却是乱而取之，实而备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早期引而不发，让你卑而骄之，让你自大，让你自我感觉很好，觉得正在或已经全面超越。同时，在这次贸易战中，每当中美团队谈判接近成功或要重启谈判的时候，特朗普就通过推特抬高要价，不给中国台阶下，采用的是怒而挠之、乱而取之。这些战略在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中也是屡试不爽。

所以，跟特朗普政府打交道，进行博弈，需要讲究策略，需要沙盘推演。是不是仍然按照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方略，做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强而避之”呢？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一旦谁谈论主和，就好像成了投降派，遭受种种诽谤和不理解。邓小平曾说过一句话，“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才行。”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一大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共同利益应该是远远大于分歧点、冲突点的，如何避免掉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相互冲突的“修昔里德陷阱”，需要中美双方进行双向的战略调适和战术调整，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才行。尤其是中国，仍处于为“两个一百年”目标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现代化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关键历史时期，需要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来继续强大自己，对外开放还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下去，还需要继续韬光养晦。从而，当前的形势是危中有机，中国只有很好抓住这次机会通过经贸摩擦倒逼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过度渲染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过度意识形态化、自我膨胀，才有望让外界看到共同点，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才能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及其他任务。

**Q5:** 贸易战如何重塑世界经济，重塑中国经济，世界工厂的地位能不能保住？

**A5:** 目前来看，短期内其他国家要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还没那么容易，但长期就不太好说，一旦大量外国企业转移和产业链发生变化，弄不好就会失去这个地位。中美贸易战确实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有可能会重构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否定来孤立中国。当然，这些也可能给中国的改革带来了机遇，因为改革往往都是倒逼的。要让其他国家认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必须通过深层次的市場化的改革来实现，以此倒逼

中国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倒逼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融合到世界经济体，让外界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贸易战是危中有机，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形成倒逼。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风险。一旦美国通过和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双边贸易协议，而中国失去了机会，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中国而言，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导致大量失业，从而引发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迅速上升，外汇储备减少和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具体来说，有以下风险。

**第一、经济下滑，导致大量失业的风险。**尽管贸易占比 GDP 不高，但会有很大负外部性和传递性，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如：大量的外贸订单会减少，从而意味着大量工作岗位会消失，很多产业链企业大幅度萎缩甚至倒闭，带走了技术和产业链，其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制造业优势弄不好会最终被南美、东南亚甚至美国本土替代，再想恢复就很难很难了；

**第二、国际资本外流风险。**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额的贡献高达 40%以上，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受阻、美国大规模减税计划和美元加息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中国资本外流风险大大增加。同时，资本外流风险必将进一步在国内进行传导，引发一系列的贸易风险、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值得警惕；

**第三、汇率风险。**2018 年以来，美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美元加息步伐加快，均导致人民币兑美元出现贬值且贬值预期仍然持续。此外，中美贸易摩擦的反复和不确定性也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有所增强，汇率风险有所增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因此将面临受阻的风险；

**第四、债务风险。**当前，国内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都处于较高水平，债务结构也不尽合理。在这一背景下，贸易摩擦引发的汇率和资本外流风险或将通过企业和金融系统传染到债务部门，从而引发较大规模的债务违约风险；

**第五、政策风险。**为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资本外流风险和汇率风险，并防止其对国内金融系统产生传染，中国的货币政策等将被动做出调整，因此，货币政策解决国内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将有所下降。在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国内债务水平仍然较高、经济结构继续调整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下降将进一步引发内部的金融风险、债务风险和经济增速下滑等风险。因此，在外部风险和内部结构性问题并存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应该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行业政策等互相搭配，并确定不同政策的力度选择和协调方式，以避免内、外部风险互相传染互相叠加，进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 **技术创新基本要靠民企，应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

**Q6:** 怎么看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关系？

**A6:** 以史为鉴，知兴替，如我在合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近代以来有过三次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来推动工业化，分别在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改造**

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是它整体上无法从根本上同时解决国企的效率低下、挤压民企、不利创新及造成社会不公这五大弊端，并且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后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并将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

的确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经济主导。早在 1994、1995、1996 年，我就连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则主要是向专业学者阐述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及其如何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逐步落地的探讨。三篇论文分别是《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的三阶段论》《中国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改革》《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给出了一个在转型过程中“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即有限经济自由、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在该理论框架下，企业所有制及最优产权安排的选择将依赖于经济环境的非规范化程度。根据经济环境的不规范程度的差异，给出不同的最优产权制度安排（民营、集体或国有产权安排）。它表明，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改变，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并论证了通过不断改善经济制度基本环境的改革，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的三阶段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合理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正是得益于民营经济大发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把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归结于党的领导，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党的领导，也有人归结于政府的主导，但改革开放前也是政府的主导，甚至更厉害。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前后都有的因素。辨析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应按照实验物理学中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还要找出哪些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经济增速的巨大差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新因素就是邓小平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选择和市场化的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改革。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包括民营经济的非国有经济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

在今后的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及其减少地方政府债务方面仍将会起到主要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业进入壁垒、歧视性政策等，同等对待民营经济。

十九大报告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直接使用民营企业表述，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无疑抓住了发展的关键。民营经济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已经占绝大部分比重，为什么下一步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还是要靠民营经济呢？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基础研究的创新，这个得靠政府、大学。

由于基础科学创新往往周期长，见效慢，但外部性巨大，从长远来说，基础性研究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稳定，要有前瞻性，但这种投入常常是亏本的，逐利的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这时，政府及大学就需要补位，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做，所以要靠国家。然而，创新不仅仅是

基础研究创新，还包括应用科技创新。二者一个立足当下，一个立足长远，不可偏废，不应对立。

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和商务方面的创新基本靠民企，为什么？全世界所有技术创新的成功率是多大？即使在发达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其创新的成功率只有 5%左右，在中国可能连 5%都不到，如果创新只有 5%的可能性，国企敢创新吗？哪一个国企的领导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新，即使他敢，上级主管部门会同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即使厂长经理敢去创新，上级主管部门也不会让你冒大的风险去创新，因为拿的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去创新，但是创新 95%的可能性是失败的。并且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中的国企有激励和动力去创新？这样，创新只能主要靠自愿承担风险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企。老百姓不一样，民营企业哪里有钱哪里赚，甚至是铤而走险，无论怎样，失败了是亏你自己的钱。所以说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更加要靠民营经济，能不能让民企和国企公平竞争，同等地对待呢？

**但是，现在有一些非常不和谐的论调，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完全相背离，那就是所谓的民营经济离场论。主要观点是“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理由是“私营经济是没有纪律的，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而“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很多民营企业为了生存，主动向国企靠拢，寻求公私合营。上世纪 50 年代公私合营的结果是什么？是随后公有制经济的铁板一块，是经济的激励扭曲和低效。中国一定不能再折腾回去，重走那条老路。**

**Q7：中国有没有能力重新走向封闭？**

**A7：**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国家边界，核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弄不好正好中了对方的下怀。难道不是？在当前的贸易摩擦中，对方就是想形成一切可能的反中统一战线，孤立中国，使之经济萎缩，逼你退回到自闭状态，这点想不清楚，后果将十分严重。

从内部看也面临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这一结构转变不应是靠政府主导、国企主要、靠产业政策来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并且弄不好会造成外部的反弹，给国际社会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造成由头而遏制中国，从而需要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需要以更大的改革决心、力度，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重中之重，同时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的基本职能边界之内更好发挥作用，包括作为“裁判员”的规则维护者作用，而不是作为“运动员”高度嵌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去。**同时，提升国家依法治国能力和政府执行力及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依法治国能力的提升最终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改革往往是要靠倒逼的，我想这次也不应该例外，中国不但不能走向封闭，而且需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反思以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生相关的进口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才是广大民众真正所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第二，主动面向国际资本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倒逼打破国内民营资本的有形无形投资壁垒，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减轻外界认为中国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活动的印象；第三，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营商环境，激发、培育和保护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

**Q8:** 目前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形成共识了吗？

**A8:** 应该说，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了，从党的决议、政府文件、学者著述、媒体报道等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市场经济的肯定表述。当然，也不否认存在各种各样的杂音，这有多重的原因。

首先是理念和教条主义的原因。一些人常常将经济学过度意识形态化和教条主义化，我不否认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但是不应该将其教条化，将经济学藩篱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那样，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是研究市场制度的工具，从而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关键。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说明

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要取得 40 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而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在市场化改革措施和政策制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利益上的原因。市场化的改革，会触动一些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起始于 30 多年前的上一轮改革，之所以能很快凝聚起共识、形成改革的势能和动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积重难返的极端旧体制成为众矢之的。但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会影响到很多**

人的现有利益或将改革和改革失误所导致的问题混为一谈而反对市场化改革，其原因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满足于现状，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新一轮改革所面临的既定利益格局已不那么容易打破，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下降，或由于自己的东西被改掉反正无法高兴，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本身有问题，而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动力和勇气。所以，**下一步首先当然还是要让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利益阶层不反对改革，一方面尽量做到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还要从理念上影响他们、团结他们。**

**Q9:** 个人在这种局面下，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未来？

**A9:**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大环境是外生给定的，大家都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我们能做的改变非常有限，所以最优的心态就是面对。同时，也不要将自己及其专业的作用想象得无限大，个人是无法解决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的。

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探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当然是自不待言，也是我们作为学者的责任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但是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制度才是根本、关键和决定性的。如果**关系到国家的走向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没有确定，再好的理论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说不定还适得其反，个人的作用就更加有限。当然，也不能完全束手无策、毫无作为，我们作为学者应该为改革鼓与呼，为开放鼓与呼，希望政府能真正能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中国古语有云四十不惑，不惑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航程，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挑战空前。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更大力度的全球化开放，不埋头苦干、韬光养晦，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而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并且这样的改革一定是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统一的改革，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及其各个层面互动互补的综合改革治理，才有可能应对，导致平衡充分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当前的中美形势和国际形势是危中有机，中国只有很好抓住这次机会通过经贸摩擦倒逼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过度渲染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过度意识形态化、自我膨胀，才有望让外界看到共同点，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为此，在涉及改革方向和大政方针方面，当前急需统一思想，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和误区太多，有很多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使得下面很多部门方向感缺失。我们只有从思想上、方向上进一步统一到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上来，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协调，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正确处理目标与过程的关系，才能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及其他任务。■

[【返回目录】](#)

## 荣剑：中国外交格局中的“东亚突破”

[ 荣剑 独立学者。本文首发于《新视角》杂志总第 83 期，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本文作者荣剑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0 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外交主动实现“东亚突破”，大力开拓中日友好新局面和实现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无疑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中日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是东亚永久和平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的战略地位。

### 中国外交正面临着困境

中国外交目前正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时代的前半期，外交政策选择“一边倒”，即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基本上是闭关锁国，除了向亚非拉少数后进国家输出革命之外，主动和世界先进国家隔绝。“文革”后期，中国面临着苏联军事侵略的危险，巨大的压力之下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把美苏视为第一世界，把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视为第二世界，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第三世界。由此采取的外交政策是：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统战)第二世界，对抗第一世界(实际上是对抗苏联)。在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中国外交抓住了两头：一是和美国和解，用“乒乓外交”开拓契机，主动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取得对美外交的战略突破，一举解除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二是抓住第三世界，用中共自己的话说，是非洲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毛泽东的外交相比于其内政而言，具有开放性、务实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外交遗产至今仍然还有价值。

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政策，延续了毛泽东时代开拓的近美路线：亲美亲日亲西方国家，放弃意识形态外交，走务实的外交路线，坚持对发达国家开放，对穷国小国的经济支援量力而行，开展对日对韩外交时不被朝鲜政策所绑架，奠定了东亚和平友好的新秩序。纲举目张，对美国友好是中国外交之纲。在中美友好的主基调下，中国视日本为现代化的榜样。邓小平 1978 年访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彻底打开了对日友好的大门，并从日本现代化实践中获得重大启示，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胡耀邦和赵紫阳全面贯彻了邓小平的这个外交思想。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执政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外交取得了重大突破，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1986 年 11 月 8 日，胡耀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时任日本首相首相中曾根康弘会谈



1986 年 11 月 8 日，胡耀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时任日本首相首相中曾根康弘会谈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遵循了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八九风波之后，中国遭遇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外交面临极大的困境，邓小平的外交嘱托是：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 20 个字，核心就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是中国外交的战略定位，而不是策略选择。基于此，江泽民对美外交基本上是成功的，在处理美机“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能够秉持理性冷静的立场，不因突发事件而影响中美友好大局；并在中美友好的大好形势下，完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重大步骤。胡锦涛执政时期，中美友好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外汇。

从 2012 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改变了从毛泽东时代以来所确定的以美国为纲的外交路线，特别是改变了邓小平所确立的“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这是路线性和方向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澳(澳大利亚)关系都处在比较困难的状态。

首当其冲的是，中美关系陷入了难解的僵局。目前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亲华反华派，前所未有地对中国形成共识，一致主张对中国在世界的发展和扩张实行遏制战略。美国日趋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原来长期对中国实行的开放、接触政策并没有换来中国制度上的变化，反而造成了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各个方面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主动掀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其实影响不限于贸易领域，而是中美关系全面转折的开始。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走向战略对抗，这是中国的外交之纲从正面导向走向了负面导向，有人说这必将影响中国未来 30 至 50 年的国运，这个判断也许并非言过其实。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在中美之间外事繁忙

其次，正是受制于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南海、台海和东海三线的行动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南海“填岛”的军事行动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促成了美日印澳四国新的准同盟的军事体系，目标显而易见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大陆在台湾地区持续制造紧张气氛，客观上加强了美台关系，美国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和“台湾旅行法”，显示出美国对于维护台湾现状的坚定立场；虽然在东海围绕钓鱼岛的中日冲突有所缓解，但冲突的根源没有消除，中日之间随时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的冲突。

第三，中国新的国际发展战略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遭遇了各种限制性条件。中国原来一直行之有效的“以市场换取技术”（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以投资换取支持”（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在人权等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以援助换取友谊”（主要是针对非洲落后国家）的对外政策，效力在下降。欧美国家正在日益警惕并采取措施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有时甚至宁愿放弃中国市场也不愿意再继续容忍中国对欧美知识产权的侵犯（中兴芯片事件对欧美国家具有广泛的

警示意义)。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提出批评，已非获得中国投资就可停止。中国用经济援助的方式来换取他国友谊的做法，在国内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

第四，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实质是意识形态外交)，遭到了世界主流国家的警惕和抵制：中国号称用“中国方案”不仅要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世界问题;主张重建人类共同体却以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为导向——这种价值观外交和世界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普世价值存在抵牾。

### **中国外交困境源于意识形态障碍**

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是如何造成的?是不是来源于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利益冲突或领土冲突?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四面为友转化为强敌环伺?

从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所获得的国家利益来看，中国自对外开放以来，一直是处在有利位置;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和多数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均处于顺差状态。按 2017 年的统计，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 3750 多亿美元(按中国海关统计是 2750 多亿美元)，对日本的贸易顺差是 315 亿美元(按日本海关统计)，对欧盟的贸易顺差是 2007 亿美元(按欧盟统计局统计)，对加拿大的贸易顺差是 365 亿美元(按加拿大统计局统计)。中国贸易的主要逆差国，排在首位的是韩国，2017 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是 442 亿美元，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是 273 亿美元。从对外贸易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是独领风骚，贸易顺差占了世界各国货物贸易差额的大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可谓如鱼得水，获得了各种好处，国家利益有了巨大增长。

从中国的领土主权来看，自从 1979 年中国和越南之间发生的一次边境局部战争后，中国近 40 年来没有和世界上主要贸易国家发生过领土争端，尤其是和美国迄今没有发生过领土冲突。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支持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挑战，但美国政府反复声明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是反对中国大陆以武力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这是美国政府长期一贯的立场。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展开的冲突，是一个历史问题，长期存在，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执政时期，并没有成为中日和平友好的障碍;如同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侵吞了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对俄罗斯仍然采取友好的立场，这说明历史遗留问题在现实的国家利益面前并非不可化解。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和印度的边境纠纷时有发生，但中印目前几乎没有因为边境纠纷而再次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因为战争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美国、日本、欧洲等主流国家并未发生国家主权或领土的武力冲突，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是得益国家。中国最近二十几年来的迅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采取了大力支持的立场，通过各种方式促使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利益结构中一直处在有利位置。因此，不是改变

而是继续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将对中国有利。中国即使和美国发生贸易战，或者和其他国家处在利益冲突状态，这些利益矛盾和冲突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常态现象，可以通过国际公法和各种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则来予以处理和解决，不足以造成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

中国外交困境的根源在于，近五年来实行的是一条意识形态导向的外交路线。

(1) 中国对朝鲜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是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东体制崩溃之后，世界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已经日渐稀少，中国至今仍然把朝鲜视为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共同的意识形态出发，中国对朝鲜一直采取支持的立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援助，从粮食、石油到军事装备，几乎应有尽有。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的强大支持，朝鲜才有恃无恐地发展核武，从而构成了对东亚和平的严重威胁。在目前朝鲜是否弃核的关键时刻，如果中国依旧秉持意识形态的外交路线，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将会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障碍。

(2) 中国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从反美的意识形态出发，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长期实行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就叙利亚局势尤其是就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旨在通过美英法联军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和军事打击的决议草案时，中国成为少数投反对票的国家。目前美国和伊朗关系处在战争边缘状态，美国要求国际社会统一制裁伊朗，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邀请伊朗外长访问中国。中国的这个外交姿态，会被美国人解读为是中伊联手来对抗美国。

(3) 中国对俄罗斯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对抗性关系，期待俄罗斯在和美国对抗时寻求和中国建立一种战略同盟型关系，中国在对抗美国时也期待获得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另一方面是基于前苏联体制遗留下来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普京的个人集权所包含的精神和传统，让中国的领导人有同道者之感。

(4) 中国对日本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是基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年来中国民间发起的反日运动，是中国政府和官媒长期宣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果。东亚的政治动荡，一方面是朝鲜拥核引起的，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惹的祸。中国的民族主义喧嚣，从客观上助长了日本政治的右翼化。围绕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和钓鱼岛主权之争所持续展开的中日外交之争，时而沉寂，时而热闹，完全是源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并非是国家利益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5) 中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总根源是对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偏见。美国虽然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但是，中国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长期以来将美国树立为海外敌对势力的总代表，总是认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以朝鲜、叙利亚、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为友，和日本对抗，反对在韩国布置萨德导弹系统，完全是以美国划线：视美国的敌人为友，视美国的朋友为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虽然谈不上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一直期待建立的关系），但至少能够和平相处，现在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巨大鸿沟，中美的战略对抗已近乎形成。

中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实质，是中国的价值观外交，这一价值观的核心是：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中国要主导世界秩序的重构，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的领导国家。中国的意识形态外交还能不能继续走得下去，应该反思了。

### “东亚突破”的核心是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

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证明，意识形态外交已经碰壁。举目四望，还有多少国家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按照“三个世界”划分，失去了美国这个“第一世界”国家的支持，也就是失去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支持，而要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则要花出多少钱？以金钱换来的支持又有多大的可靠性？按照邓小平所确定的外交路线，“韬光养晦”不仅仅是中国的外交策略而是战略定位，中国不管是从实力上看还是从价值观上看，都不足以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决不当头”应该是中国外交的长期选择。



1979年12月5日-9日，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邓小平**在谈话中，首次提出中国要实现小康目标

中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必须要有根本性的调整，调整未必是要回到“三个世界”理论，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世界的划分不再是简单地以国家大小穷富为界线，而是还要以各国都要遵循的共同国际规则为基准——从联合国宪章到世贸组织所确定的基本规则，是现有国际秩序赖以形成的共同基石。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要想另起炉灶，用自己国家的一套价值标准来重新建立国际秩序，那相当于和世界的**主流国家为敌**。现在需要调整的是，重新回到邓小平所奠定的“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上来，在战略高度上重新认识中国的外交之纲：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基于中美和平友好的战略格局，才可

能真正打开中国的外交空间。

外交路线和政策的根本调整，除了要在意识形态的困境中走出来之外，需要在外交实践上有大的突破。如同毛泽东时代中国主动寻求与美国的和解从而一举解除了外交困局，中国目前也需要有这样的外交突破。事实上，中国外交并没有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所呈现出来的世界主流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非友好状态，是中国意识形态外交所导致的结果，是中美两国由战略合作走向战略对抗的结果。在中美关系陷入极大的僵局时，中国外交率先在东亚突破，重新寻求和日本真正建立一个和平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和韩国彻底恢复原来的友好状态，是中国迅速摆脱外交困境的当务之选。

中国外交困境在客观上为改善中日关系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国际条件。在中美关系处在僵持状态时，中日关系率先突破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从外交策略上考虑，中国如果不能首先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就不能取得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有力地位，而中日关系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无疑具有最重要的位置。中国古代外交策略推崇“远交近攻”，这是基于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领土扩张和防守的需要，在现代地缘政治中，“近交”才能“远攻”，只有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才能掌握世界外交的主动权。今年中日关系开始改善，和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是有关联的。如果中美关系继续处在紧张状态，中国政府寻求“东亚突破”的动力会更大。

中国在国际压力之下寻求“东亚突破”，肯定有利于东亚和平与东亚的国际秩序。这要取决于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包括韩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按 2015 年公布的经济数据统计，已超过了 16 万亿美元，总量超过了欧盟，占世界总量的 20.9%，亚洲的 70%。2015 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2016 年，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而韩国则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日韩三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共同体，经济关系如此密切，同时又有着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作为共同的文化资源，从历史到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基于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关联性，中日韩和，三国肯定是共赢，中日韩斗，三国都是输家。因此，中国外交政策的“东亚突破”，符合中日韩三国的根本利益，符合东亚的稳定和发展。

中日两国关系的再正常化，是中国外交“东亚突破”的核心。所谓“再正常化”是指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出现的不正常的两国关系的再调整，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化的轨道上来。中日两国之间原来基于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所形成的长期矛盾和冲突，必须有一个总体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基本要求。中日关系不能仅仅从策略上考虑，而是要像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从战略高度上奠定中日长期友好关系的基石。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中美关系是纲，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目，那么，在东亚范围内，中日关系就是纲，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就是目。纲举目张，通过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矛盾就能迎刃而解。

中国外交的“东亚突破”，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要解决朝鲜的拥核问题。目前对东亚和平和东亚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就是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能力，这是中日韩三国的心头大患。决不能让朝鲜拥核

成为无法改变的既定现实，而由中日韩三国采取共同行动迫使朝鲜去核，是当务之急。解决朝鲜核问题，中国肯定具有关键性或决定性作用。美朝元首会晤之后，用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已出现了良好开端，但最终能否迫使朝鲜彻底弃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采取和美国一致的立场，这也是中国外交“东亚突破”的关键一步。惟有彻底解决了朝鲜的核问题，中国在世界才能真正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在东亚才可能真正行使有影响力的话语权。

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外交策略，而是要致力于真正实现 20 世纪 80 年代时所确立的“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这一长远目标，为此，必须对横亘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三大障碍——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有一个总体性的解决方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时，这三大问题都存在，但中日两国领导人都能够基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中日友好的大局，存小异，求大同，不激化矛盾，不把问题意识形态化，不诉诸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加强官方互访特别是高层互访的同时，扩大民间的交流和来往。正是基于中日两国领导人对于中日长期和平友好的共识，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日两国国民的互相好感度都高达 80%，使中日两国进入了自隋唐以来最友好相处的年代。这说明，中日两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不能也不应该成为阻碍中日友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现在的中日两国领导人，应该有政治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暂时还解决不了，那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先“搁置争议”，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总之，不能把问题当作包袱背起来，而是要卸掉包袱，尽可能轻装前进。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0 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外交主动实现“东亚突破”，大力开拓中日友好新局面和实现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无疑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中日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是东亚永久和平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当然，中日关系要有根本性的改善，要彻底地再正常化，取决于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取决于中国从意识形态的外交困境中走出来，取决于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和根本改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日两国持续友好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

[【返回目录】](#)

## 神田丰隆：中苏分裂与 1960 年代日本对华政策

[ 神田丰隆 日本新潟大学副教授。本文首发于《冷战国际史研究》2017 年夏季号，翻译：陈洪运，刊发时略有删节，注释略去，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东方历史评论。图片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1960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1962 年，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战败”后，中苏两个共产党政权开始出现公开的争端。这一冲突持续升温直至 1969 年，中苏双方的驻军在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面对中苏分裂，美国采取了“亲苏反华”的态度。美国加速同苏联缓和，结果是双方开启了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如 1963 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 1968 年的核不扩散条约——的新纪元。相反，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敌视政策。1960 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的爆发）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作为回应，中国批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密谋”垄断核武器，并因为担心中国可能获得原子弹而“合谋”孤立中国。总之，1960 年代经历了由于中苏分裂而带来的冷战政治的转型。

### 1

战后日本的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可被划分为两派。其中之一是所谓的保守主流派，由吉田茂 (Yoshida Shigeru) 及其后继者，如池田勇人 (Ikeda Hayato)、佐藤荣作 (Sato Eisaku) 和田中角荣 (Tanaka Kakuei) 领导。另一派是“反吉田”派或称保守支流派 (conservative tributaries)。来自这一派的领导人 有岸信介 (Kishi Nobusuke)、石桥湛山 (Ishibashi Tanzan)、椎名悦三郎 (Shiina Etsusaburo)、三木武夫 (Miki Takeo) 和福田赳夫 (Fukuda Takeo)。

大量与日本政治相关的研究已强调了这两派政策的差异，尤其是他们对美国态度的不同。保守主流派更为亲美。他们是美日同盟的热情支持者，且毫不犹豫地支持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但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们认为这些政策将牺牲日本的独立和主权。“反吉田”派并不反美，只是对美日安保体系多持怀疑态度。他们追求更为自主的外交，并坚持认为日本应拥有足以独立保卫自身安全的军事力量。

但是，学者们尚未充分探讨这两个派别对中苏同盟的不同看法。正如下文所示，吉田派的政治家们强调中国人与俄国人历史上的竞争，并试图诱使中国脱离苏联，尤其是借助扩大日中贸易（的手段）。虽然他们希望同中国接近，但是他们对改善日中关系几乎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反吉田派倾向于认为中苏同盟将保持稳固。虽然他们也希望同中国接近，但是对他们来说，同苏联建立密切关系才是必要之举。

吉田在 1946-1947 年和 1948-1954 年两度出任日本首相，为战后日本的亲美外交奠定了基础。

同时，他也是一位政治“导师”，对1960年代出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吉田对中苏同盟有着独到的见解。早在1950年代初，他便坚称中苏同盟不会维持太长时间。考虑到两国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性格，他认为：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他们自称中央王朝，拥有一种强烈的比其他国家，起码是比其他亚洲国家先进的优越感。虽然苏联人建立了基于相对理想和乌托邦观念的社会理论，但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且对其自身的利益十分敏感。鉴于两国的民族性格和环境的差异，这两个国家是不可能长期合作的。



**吉田茂** [日よしだしげる，英 Shigeru Yoshida 1878—1967]

日本政治家、外交家，二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及第45、48、49、50、51任首相，也是最后一位由天皇所谓大命降下形式任命的首相，日本战败后对内推行经济中心主义国策的“吉田茂主义”系列思想，他的反对大规模重整军备，对外实行对美一边倒的实用主义主张，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于此，吉田坚称将很容易拆散这一同盟。

虽然[中国]同苏联结盟在短期内可能对中国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不利。中国同苏联携手的情况持续时间越长，则中国愈发确信对其自身是不利的。我认为，如果采取某些措施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这一理论和现实，那么将中国从苏联阵营中拉出来是很容易的。

在他看来，美国对中国的过分敌视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此外，他认为有必要要求英国在日本和美国之间调停：

最理解中国人这类心理的是日本人和英国人，他们对中国问题有着长期的经历。坦诚地讲，美国人尚未达到完全理解中国的程度。战后美国人采取的所有政策几乎都失败了。[...]英国作为调停者加入

[美日关系]，并同后两者在对华政策方面密切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更具体地说，吉田认为应该将同中国进行贸易作为实现这一政策的一种方法。

从长远来看，目前在战略物资和重要物品方面的禁运，并不总是符合自由国家的利益。[...]相反地，使中国人认识到同自由国家的贸易将最终使他们获益，而同苏联的结盟将最终使之受害是必要且有益的。就此而言，美国的对华政策正走向相反的方向。

诚如后文所言，吉田对中国和苏联的看法及其政策框架对池田和佐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反吉田”派的政治家们对中苏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中苏关系的纽带十分牢固。即使在 1960 年代这两个共产党政权的分裂公开化后，“反吉田”派的政治家们仍坚信中苏同盟将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恢复。因而，仅仅中国同西方接近，并不能使他们满足，除非他们也可以同苏联接近。虽然吉田的“保守主流派”对发展日苏关系甚为冷淡，但“反吉田”派的政治家们却对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甚为推崇，并对改善同后者的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其中，石桥湛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于 1950 年代末出任日本首相，是“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鼓吹者。与吉田希望中苏同盟分裂不同，石桥认为维持这一同盟是非常必要的。1963 年 10 月，当池田首相试图通过扩大同中国的贸易以便诱使中国脱离苏联阵营时，石桥访华并拜见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石桥含蓄地批评了池田，并告诉周，“在日本，有些人想要利用这一分裂，他们认为中苏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对日本是有利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认为，如果中苏相互合作，则互利共赢。因此，我认为两国不应分裂。”由于他的目标是创建“日中美苏和平同盟”，因而，有必要确保包括中苏在内的这些国家间没有任何冲突。

另外，虽然石桥赞同苏联的外交政策，但却不认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1964 年，他以日苏友好协会主席的身份访苏。访问结束后，他在个人备忘录中写到，“长期以来，我一直支持和平共处理论。现在，我认识到这对苏联来说是一个现实。”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同样认为，以 1963 年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标志的美苏关系的改善，是一个“真正令人愉快的现象”。然而与之相反，（对中国）他表述道，“我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待和平共处]的思维方式。”

椎名悦三郎、三木武夫和福田赳夫均曾在池田-佐藤时代担任外相，并对（日本）同中国和苏联的外交持有类似的政策框架。在这一时期，他们每个人都在改善苏联同日本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2

1960-1964 年间出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时常作为“吉田派最好的学生”之一被提及。虽然其前任岸信曾为日本外交争取到了更多的自主权，并完成了对《美日安保条约》的修改，但池田却毫不犹豫地安全方面依赖美国，同时更为强调经济发展。当今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池田的政策奠定了吉田主义的基础，而吉田主义被视为战后日本外交最主要的原则，即经济中心导向。此外，池田在制定有

关中苏同盟的政策时，倾向于他的导师吉田。他本人承认，“首先开启我对外交和国际事务认识之眼的是前首相吉田”。



**池田勇人**[日いけだはやと,英 Ikeda Hayato 1899.12.3—1965.8.13]

日本政治家、第 58 任、59 任、60 任首相，  
曾任日本大藏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任内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  
其“所得倍增”一词成为当时日本朝野上下的流行语；  
对外推行以繁荣经济为目的的经济外交和亲美外交路线，在中日关系中作出过重要贡献

确实，1950 年代中期的某些迹象表明，池田对中国和苏联的看法受到了吉田的显著影响。1954 年 8 月，池田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并表达了同中国接近的愿望：“正如印度支那停战协定所表明的，美国的反卷政策（roll-back policy）是一个败笔。因此我们有必要调整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打破当前未维持关系的局势。”然后，池田进而对吉田（的政策）进行呼应，建议日本力争同英国合作：“除了维持同美国的和睦相处外，同英国的合作[对日本]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1955 年，池田抨击了鸠山一郎内阁（Hatoyama Ichiro Administration）采用的“同苏联和中国恢复关系”的口号。在池田看来，“视中国和苏联为一体是不恰当的。我认为中国和苏联是不同的。”他进而解释道，中苏同盟是有问题的，正如吉田也曾指出，“因为两者历史上不同”。

但是，当池田在 1960 年组阁时，日本的决策者们普遍认为中苏同盟是稳固的。虽然他们公开承认中苏关系中存在着某些问题，但日本外务省的大多数官员拒不相信中苏两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可能性。中国课课长远藤马唐（Endo Matao）在外务省的一次会议上谈到：

中国和苏联拥有共产主义者[共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坚持其追求共产主义发展的基本立场，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们有必要在国际政治中保持一个强大的声音。同时，他们也需要安全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

国和苏联的关系在近期是不可能疏远的。

尽管外相不支持诱使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政策，但池田仍坚持追求自己的目标，热切期望在他的任期内能同中国接近。1961年，联合国的许多成员国开始声称共产党中国应该得到承认并成为其中一员。池田和他的外相小坂善太郎（Kosaka Zentaro）访问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以期说服西方国家领导人，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池田同中国接近的政策，尤其得到了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的同情。池田向迪芬贝克表达了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从长远来看，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中国人似乎不会同苏联人合作太长时间，”这同吉田在文章中的看法如出一辙。

1962年秋，自民党内亲华派的两位政治家：松村谦三（Matsumura Kenzo）和高崎达之助（Takasaki Tatsunosuke）为商讨恢复日中贸易问题访华。他们的努力促成了于同年11月成功开始的“廖承志-高崎达之助贸易（Liao-Takasaki Trade）”。然而，直到最近，人们才得知事实上池田引导了整个外交过程。他亲自指导谈判，甚至亲自挑选访华的代表。此外，在这两位政治家前往中国后不久，池田便访问西欧，努力说服欧洲领导人认同其对华政策。例如，池田告诉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我与吉田先生有着近乎相同的看法，即如果西方推动同中国的贸易，那么中苏关系将疏远。”现在中苏关系“已经迅速恶化”，中国开始采取一种“比以往更为现实的政策”。因此，“西方国家不应错过此次离间中苏同盟的良机”。



**周恩来**和日本政治家、自由民主党前顾问**松村谦三**

松村谦三 [1883.1.24—1971.8.21] 在 1958-1970 年中日恢复邦交前曾五次访华，他促成了中日互派新闻记者和双方互设贸易联络办事处，为此后 1972 年 9 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1963年8月，池田授权出售化学纤维维尼纶设备，这是西方阵营第一次向中国出售这种设备。在

池田做出出口这种设备的决定前,美国和台湾曾表示强烈反对,警告这将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援助。而且,日本外务省也不支持这一计划。事实上,外务省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结论是,“一旦这一计划被批准,将存在引起一场远比出口本身更为重要的国际反应的危险。”尽管如此,这些国内外的压力没能改变池田的想法。正如池田于同年4月份对法国外长莫里斯·顾夫·米尔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所说的,他的决定同样基于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我认为,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糟。因此,我们应该同共产党中国进行交往,使他们认识到自由主义有多好。”他同时指出,“长期同共产党中国不发生关系是不现实的”,但障碍之一便是“美国对中国过分敌视的态度。”

同他在对华政策上热情十足不同,池田不愿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1961年8月,他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开始了所谓的“书信战(correspondence war)”,对各自在领土问题、和平条约以及核试验等问题上采取的态度相互攻击。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多,但没有产生任何建设性的结果。为推动“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理念,1963年9月,石桥试图一并访问中国和苏联。但是,池田拒绝了访问苏联的计划,因为他关注的不仅是这次访问本身,还有其对日本同中国关系的影响。总之,池田在中苏分歧扩大时期采取了一种“亲华反苏”的政策。

然而,美国对中苏两个共产党大国的政策同池田的政策恰恰相反。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肯尼迪政府加速了同苏联的缓和。此外,在1963年8月池田向中国出售维尼纶设备之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增强了其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尤其是在意识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中国人的威胁之后。越南局势的恶化更增强了美国对中国的敌视。美国的政策之外,中苏的冲突也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孤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似乎倾向于采取一致敌视中国的政策。这一趋势与池田试图将中国整合进国际社会的政策显然是不相容的。

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政策分歧导致两者在中国问题上出现了令人心痛的争端,并于1964年1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访日期间达到高潮。腊斯克曾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Ohira Masayoshi)就此展开激烈争论。当大平询问美国对苏、对华政策的“调整可能性”时,腊斯克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正在寻求和研究着各种可能性,1962年8月古巴导弹危机带来的苏联的重新谨慎,使其有了更大的希望,当时核恐怖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相反,“不幸的是,北京并不认同这种体验。”因而,腊斯克暗示不管日本的偏好如何,美国都将坚持其“亲苏反华”的立场。

然而,当为日本的“亲华反苏”立场辩护时,大平坚称:

二战中日之间的冲突至今仍使日本民众有一种负罪感,日本民众并未感到自身直接卷入东南亚以及共产党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冲突中。

(日本民众)对苏俄有一种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深刻的仇恨感,而对共产党中国的敌视并不强烈。因此,日本民众的感情同美国民众的感情十分不同。

但是,腊斯克以如下的言论来驳斥大平的观点,

日本应该考虑其自身的利益——例如，在朝鲜、台湾(Formosa)、越南、柬埔寨、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应该考虑它自身的利益将受到北京方面对这些地区政策和行动怎样的影响。

虽然他们最重要的外交盟友不甚满意，但池田内阁直到 1964 年中期始终坚持其同中国亲近的政策。尤其是 1964 年 4 月，池田再次派松村访华。按照池田的指示，松村建议中国应同美国和日本交换记者。虽然中国拒绝了同美国交换记者的意见，但却同意同日本交换记者。此外，松村成功地同中国达成在东京和北京分别建立贸易办事处的协议。这些办事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和日本之间第一批固定交流渠道。

然而，同年 8 月初的东京湾事件不仅使越南危机进一步升级，而且恶化了中美关系。由于美国开始为对抗中国做准备，池田的对华政策因之受限。他不能为了中国牺牲美日同盟。结果，两周后他向台湾人宣布他不会批准授权向中国出口维尼纶设备。同时，他任命椎名悦三郎为外相，后者以“台湾说客”的称号而出名，且对改善日中关系毫无兴趣。

鉴于椎名对国际局势，尤其是中苏关系的看法，对他的任命表明池田放弃了诱使中国离开苏联阵营的政策。1964 年 10 月前后，椎名在其个人备忘录中写道：

国际局势正在瞬息万变或不稳定吗？

(是的。) 它不稳定。因而，我的看法是基础没有改变。

何以如此？

东方：虽然苏联和中国不能很好地和解，但是双方都有彼此接近的意愿。

西方：美国和英国同此前一样。虽然法国不是很合作，但是自由阵营没有分裂。

因此，虽然东方和西方都有某种极化的趋势，但这只是一定限度内的现象而已。

椎名将苏中之间任何潜在的冲突都只归咎于同盟内部的摩擦。他不相信中国将如池田认为的那样离开苏联，而同西方接近。然而，椎名的看法并未对池田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后者的健康问题使他在任命椎名不久后便很快辞职。但在佐藤荣作接替池田后，椎名却仍居其位。在佐藤内阁任期的最初两年里，椎名领导了支持美苏缓和的新政策，从而将日本置于支持两个超级大国共同遏制中国的境地。

### 3

尽管椎名坚持自己的看法，但于 1964 年 11 月接替池田的佐藤荣作却在在中苏关系上同吉田和池田保持一致。他同时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同中国接近，以离间中苏同盟。早在 1954 年，他陪时任首相的吉田访问欧洲时，便对吉田的见解十分钦佩，他在日记中写道：

[吉田]首相关心的是英国和美国在诸如是否承认共产党中国和援助蒋介石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他认为让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保持原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因而，他坚称

西方务必要采取一种离间中国和苏联的协调政策。陪同首相出访后，我认识到他的看法是完美的。现在是自由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了。



椎名悦三郎 [しいな えつさぶろう 1898.1.16—1979.9.30]  
日本政治世家背景，日本政坛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重要人物

另外，他写道，此前的英日同盟“阻止了俄国的侵略，并对世界和平以及两国的长久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就当今的世界局势而言，取代俄帝国主义的苏俄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仍然存在。”佐藤同意吉田和池田的看法，即为了实施分离中苏的政策，英国的作用至关重要。

1963 年秋，佐藤出访欧洲，同包括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内的许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此次同佐藤的会谈中，戴高乐批评道，美国的对华政策基于一种“美国人的错觉 (American Illusion)”。戴高乐说，“在美国，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在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竞争中有必要支持前者。在法国，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就事论事。”佐藤答复说，他也不“认同美国的政策，因为它不是用来应付真实的情形，尤其是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相反，在欧洲，他们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更清楚些。”佐藤和戴高乐都对同苏联缓和以及美国试图孤立中国的类似政策表示怀疑。

然而，当佐藤组阁后他不能将中国视为他的第一选项。1964 年 2 月，美国开始轰炸北越，导致中美之间强烈敌视。另外，佐藤试图实现冲绳回归日本，二战以来它一直为美国所占领。因此，他对增强与美国的合作以及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结果，他决定支持美国同苏联缓和以及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

在 1964—1968 年佐藤内阁执政的前半期，苏联与日本的关系迅速改善。双方的部长互访不断，在民用航空、贸易、渔业以及领事方面签署了诸多协议。另外，佐藤加强了同台湾、南韩和印度的关系，它们都同中国存在竞争。佐藤的政策引起中国对其政府的强烈抨击。这一时期，中国常常抗议其被“美苏日反华神圣同盟”所包围。外相椎名是佐藤内阁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领导了肯定苏联的外交政策。1966 年 5 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外交政策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 将苏联和美国联合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在诸如航线等领域，在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斡旋。我们可以将[莫斯科-]东京航线扩展到纽约。

……

共产党中国问题

和平共处。

迫使北越放弃其游击战略。

接受我们单独承认中国（包括台湾）。

在椎名看来，日本不仅应该支持美苏缓和，更应作为一个调停者推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与他实现苏日友好关系的热切渴望相反，其对华态度甚为严苛。他要求中国采取一种苏联业已坚持的和平共处原则。另外，在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时，他毫不妥协地坚持条件。简言之，椎名是一位“亲苏反华”的领导人。

另有证据表明他对中国和苏联的看法。几乎与此同时，他在个人备忘录中写道：

日本的立场

1、为维持日美安全同盟体系，维持台湾的现状是必要的，这也是《日美安保条约》中认可的。

2、只要共产党中国不接受这一点，日中关系将不会改变。我们希望[同中国]和平共处。

……

3、只要苏联继续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就将支持它，虽然我们不应忘记他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66 年继任椎名的三木武夫，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认同椎名的观点，因而直至 1968 年任期结束，一直致力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椎名相似，三木倾向于认为中苏同盟是稳固的。1969 年 3 月，苏联和中国的边界驻军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冲突。在日本，许多人认识到了中苏分裂的严重程度。但是，甚至在 1970 年 10 月，三木仍坚称“中苏关系可能在某些时候出乱子，但在将来必然得以改善。”在他看来，苏联可以迅速地改变它的态度。因为就在 8 月份，苏联还同其过去严重不信任的西德签署了《莫斯科条约》。

像椎名一样，三木相信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并期望中国能以苏联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为榜样。1966

年，三木访美并发表演讲，他指出，推动“中国变成一个同当今的苏联一样，相信同美国存在共处可能性的国家，”是“日本和美国”的“共同问题”之一。作为佐藤内阁的第二任外相，三木继续采取同美国外交一致的亲苏政策。

然而，“亲苏反华”政策并不符合佐藤的长期目标。虽然他致力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1967年2月，他告诉驻大亚瑟·戈德堡（Large Arthur Goldberg）的美国大使，“虽然美苏关系似乎在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他[佐藤]想提醒美国，过于相信苏联是危险的。”此外，他强调说，他视苏联而非中国为主要威胁。由于这一“反苏”言论与此前佐藤内阁采取的立场泾渭分明，因而不免在华盛顿引起热议。美国驻日大使 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Alexis Johnson）的分析被给予了最多的关注，因为他在东京发电报称：

当然，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它与历史上和内在的日本人对不管是俄帝国还是共产主义的俄国的态度相符，虽然中国的最新发展，已使历史上形成的日本人的态度发生某种改变，但是佐藤的言论似乎预示着这些短期的趋势不能改变日本人潜在的亲华反俄情绪。



**沃尔特 W·罗斯托** [walt whitman rostow 1916—2003 ]

20 世纪备受争议的美国犹太裔经济史学家，  
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罗斯托学派方法论创始人

时任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沃尔特 W.罗斯托（Walt W.Rostow）称赞该电报为“一位称职的大使应该写，但是很少有人这么做的”。但是，尽管约翰逊将其注意力放在日本对中国和俄国“历史上的”和内在“感情上的”态度。但罗斯托认为，日本对这两国的态度基于其对两者实力的判断。罗斯托写道：

总的来说，日本想看到的共产党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既不太弱而依附于苏联，也不太强而威胁到日本。日本希望苏联既不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也足以同美国、中国等相抗衡，以便它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同时不认为能够自由地对它施加影响。

日本想要得到我们的保护、经济上的联系以及友谊。基于此，日本意欲在亚洲建立领导地位；同时日本希望以实力为基础同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都进行贸易。

但是日本不希望我国与共产党中国或苏联任何一方走得太近——尤其是后者，因为苏联实力相对更强。

不管他们对日本外交的背景有何见解，佐藤都成功地使美国人认识到其政府的亲苏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同时，随着越南战争达到顶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大势已去，同中国接近变得更为现实可行，佐藤逐渐放弃了“反华的美苏日神圣同盟”，努力回归到池田采取的“亲华反苏”的路线上来。

#### 4

1969年3月，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边界军事冲突。事后，大多数日本决策者不再视国际格局为以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两极结构，而开始视之为由美国、苏联和中国组成的三极结构。这一转变的出现，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现在完全摆脱了苏联的影响。然而，对于将来这三极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的看法。特别是，中苏关系能否恢复以及中美关系能否缓和的问题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三木和岸信介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有可能。相反，外务省的大多数官员对这两种可能性都表示质疑。佐藤的看法是中美缓和比任何情况下的中苏重新联合都更有可能。7月份，他告诉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苏联已替代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公开敌人。”他期望美国能放松对中国的孤立，以便日本能很快有机会同中国接近。

1970年初前后，佐藤向“亲华反苏”政策的转向更为明显。他在议会中声称，他的政府打算同中国谈判。此外，世界各地的日本外交官寻求机会同中国代表接触。同时，佐藤还派遣了多名特使前去中国。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公布他的访华计划以及1971年7月份中美实现缓和后，佐藤在议会中评论说，他也可以访华。同时，他改变了他的对苏政策。事实上，他多次拒绝苏联提出的要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另外，他是第一位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声称“日本和苏联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北方领土问题上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日本首相。此次演讲后，日本与苏联之间开始相互攻击，这同池田时代甚为相似。

但是，佐藤亲华反苏政策的转变面临困境。首先，中国对佐藤本人持有很强烈的个人偏见。原因之一是，在成为首相前，佐藤似乎很想实现同中国的缓和。然而，佐藤随后实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被中国视为“背叛”行为。另一个原因是，佐藤是岸信介的弟弟，而后者是亲台湾说客中的鼓手，并曾出任主张修改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的前首相。

第二个困境是佐藤连续掌权 7 年之久，是日本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首相，因而被认为受日本的政治文化影响太久。为了避免失去自己的政治影响，他任命福田赳夫担任他的外相。福田是自民党党内最大派别的领袖，也是当时下届首相最有可能的人选。但是，福田本人又是一个十分重视日苏关系的人。1972 年，福田发表了其有关日本外交的文章。在文中，他甚至未曾提及尼克松访华一事，却对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大肆渲染，而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是在访华后三个月进行的。同椎名和三木相似，福田对美苏缓和的进程赞不绝口，同时希望日本对此强烈支持。1972 年 1 月，他成功地邀请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 (Andrei Gromyko) 访日。2 月份，他还主动同孟加拉共和国和蒙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这是应葛罗米柯访日期间的要求而做的。由于日本人民对佐藤的过长任期感到厌倦，加之他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弱，因而除了接受福田的亲苏政策外，他别无选择。

但是，1972 年 7 月，田中角荣而不是福田被选为自民党主席，并接替佐藤成为首相。田中对中国以及中苏关系的看法同佐藤一致。1968 年，田中在一份杂志上表达了他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另有所图’。他们口口声声地攻击‘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并将日本卷入冲突之中。但是，我怀疑他们的真正冲突，不是同遥远的太平洋对面的美国，而是同与他们有着共同边界，在同一大陆的苏联。”与佐藤相似，田中认为同苏联的冲突，而不是同美国的冲突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因而，田中持“亲华反苏”的态度。9 月份，田中访问北京，同中国成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其访问结束，同中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同意“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国家集团谋求霸权。”这一“反霸条款”意指“反苏”，招致了苏联的批评。

在 1972 年 2 月份公布的《美中上海公报》中，尼克松也同意与中国一道反对“霸权”。但是，当尼克松访问完上海，继而访问莫斯科时，他也对苏联提出的“将不承认任何人在世界事务中有任何特权和优势”，表示赞同。美苏协议意在抵消美中反霸条款，以维持美国同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平衡。相反，田中没有同苏联达成此类协议。虽然尼克松在中苏冲突中努力保持一种中间立场，田中却毫不犹豫地采取了“亲华反苏”的立场。

## 5

1960 年代，中苏分裂带来了冷战国际政治的转型。在这场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的冲突中，美国站在了苏联一边并加速美苏缓和，同时强化敌视中国的政策。结果，中国同时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从总体上看，日本对这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影响甚微。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对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反应消极。这在 1960 年代中期美国推动同苏联缓和时表现的尤其明显，由于日本别无选择只得采取追随美国人同俄国人合作的政策。类似地，如果没有此前一年美中关系的和解，1972 年日本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也不可能实现。

然而，这并不是说日本领导人对国际秩序没有自己的看法。“保守主流派”的领导人认为中苏关系将会破裂，并预感到中国将加入西方阵营反对苏联。“反吉田”派政治家们则认为中苏关系是稳固的，

并重视日本同苏联的关系，这恰恰是吉田派忽视的方面。1960—1972 年间，两派都影响了日本对华和对苏外交。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有首相都来自“保守主流派”，“亲华反苏”的路线在日本外交中相对更为重要。特别应指出的是，1972 年日本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就是由对苏日关系不感兴趣的“保守主流派”政治家田中实现的。

而且，田中的政策是日本消极回应外部环境的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外。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美国在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平衡关系的政策是不一致的。随后，美国靠向田中的立场。1980 年前后，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由缓和转向了“第二次冷战”。期间，美国同中国建立了官方外交关系，并鼓励美中军事合作。简言之，美国此时也采取了“亲华反苏”的立场。值得指出的是，田中在日中关系中的成就之一是促进了美中外交的正常化。实际上，美国和中国同意在台湾问题的谈判中使用“日本模式”。同时，田中也开创了在同台湾解除外交关系后交换“非官方”机构的先例。因而，田中的亲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秩序乃至推动中国融入西方都产生了影响。 ■

[【返回目录】](#)

## 沈明高 赵洪岩 陈蒋辉：中美贸易战会让中国走上日本的老路吗？

[沈明高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财经》杂志、《财经网》首席经济学家。本文首发于 2018-06-19 广发证券]



本文作者沈高明

一般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然而，当贸易摩擦或贸易战发生在世界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时侯，一定会分出输赢。假以时间，或者美国成功地遏制了中国的崛起，或者中国成功反遏制并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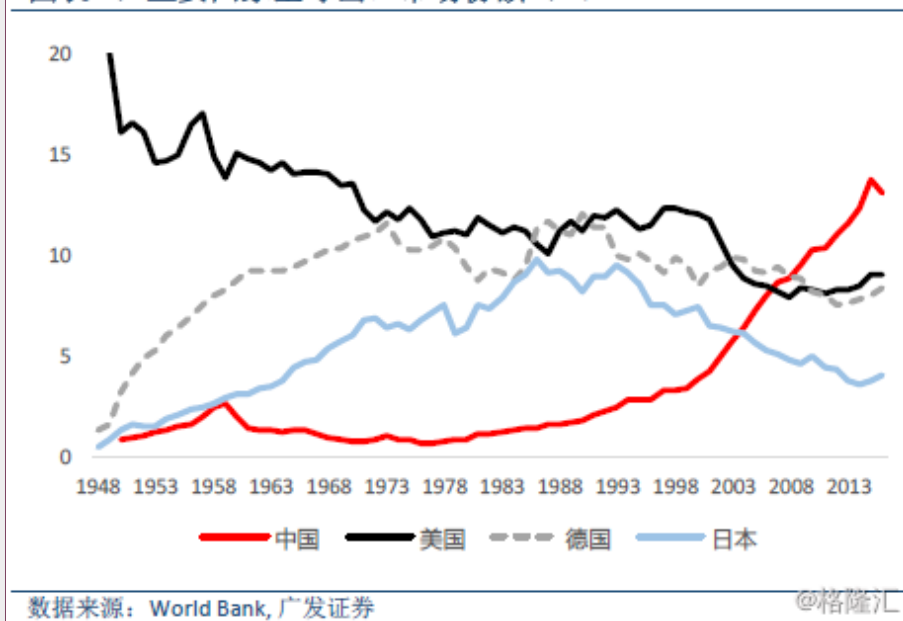
**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政治问题凌驾于经济分歧之上。**尽管贸易纠纷尚未正式上场，贸易谈判的反复增添了中美博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一轮贸易战发生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民粹主义抬头，以及中国经济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键时刻。**多重因素叠加，中美贸易摩擦或延绵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历时近 30 余载，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时结束，美国成功地遏制了日本崛起的势头。从此之后，日本离世界最大经济体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现在的中国与彼时的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制造业扩张、房地产价格泡沫和经济的高杠杆率等，因而难以完全排除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的可能性。**

但是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美国作为现在的世界消费中心与中国作为潜在的世界消费中心之间的博弈。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只要政策应对得当，中国应该比日本更有条件赢得这场“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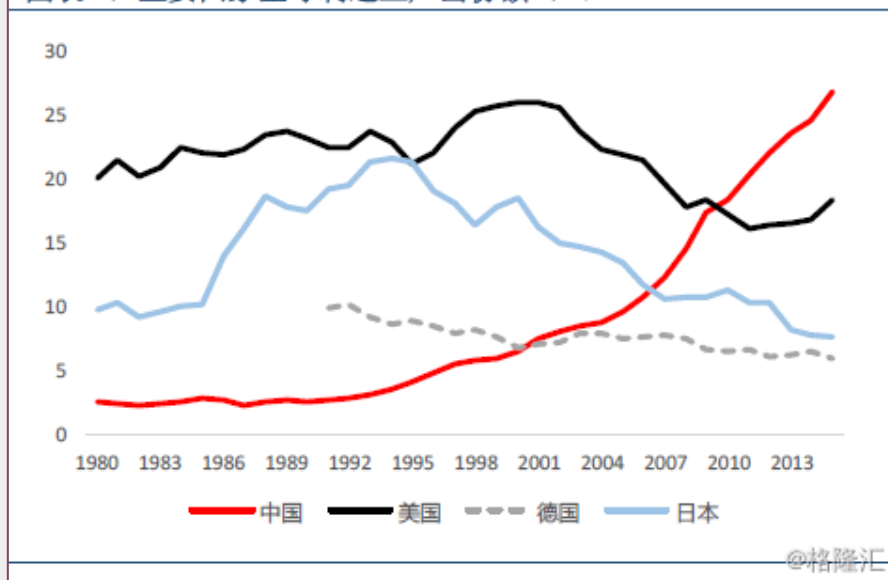
### 一、中日“贸易困局”的同与不同

图表 1: 主要国家全球出口市场份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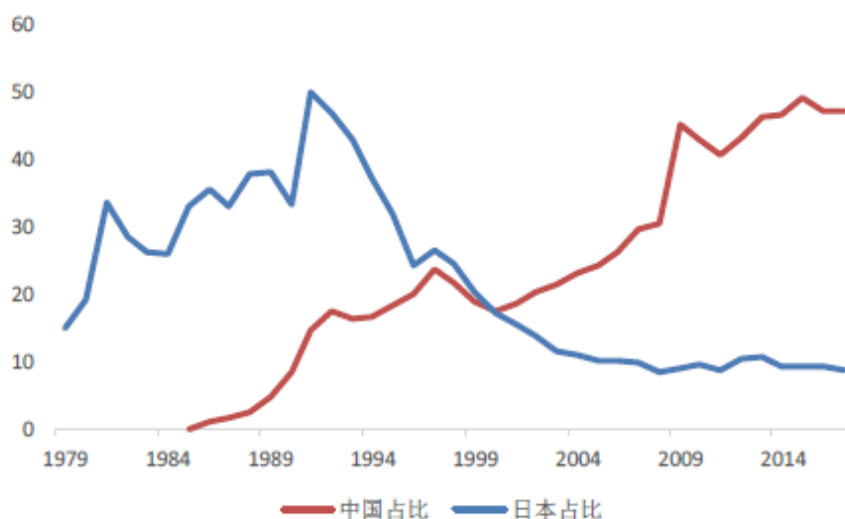
同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与过去的日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首先，都是出口带动本国工业化进程。无论是从全球制造业份额，还是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当下中国和 80 年代末的日本具有很大的相似度。中国自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出口占全球份额快速攀升，2009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6 年，中国的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为 13.1% (图表 1)。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出口占比峰值也曾突破过 10%。

图表 2: 主要国家全球制造业产出份额 (%)



中日两国制造业产出份额跟出口市场份额几乎同步上升，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制造业全球占比一度突破过 20%，仅次于美国；在 2016 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达到 25%，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图表 2)。从人口规模来看，未来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业份额都有上升的空间，但是这一过程将以其他主要国家的份额持续下降为代价，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很难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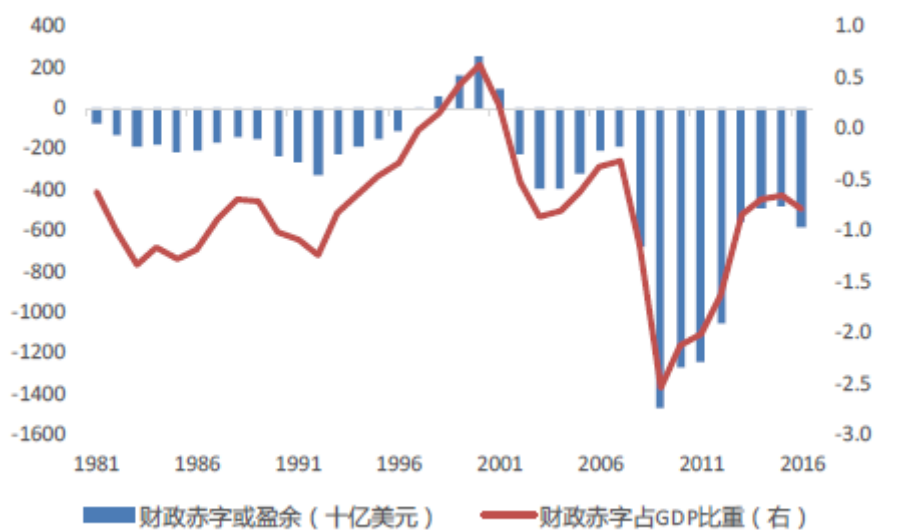
图表 3: 美国对中日贸易逆差占总逆差的比例 (%)



数据来源: CEIC, 广发证券

@格隆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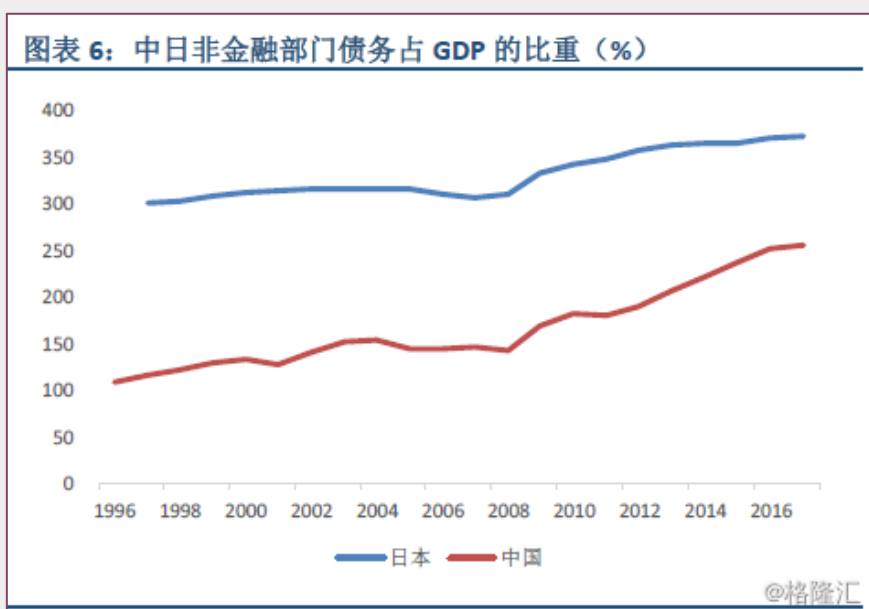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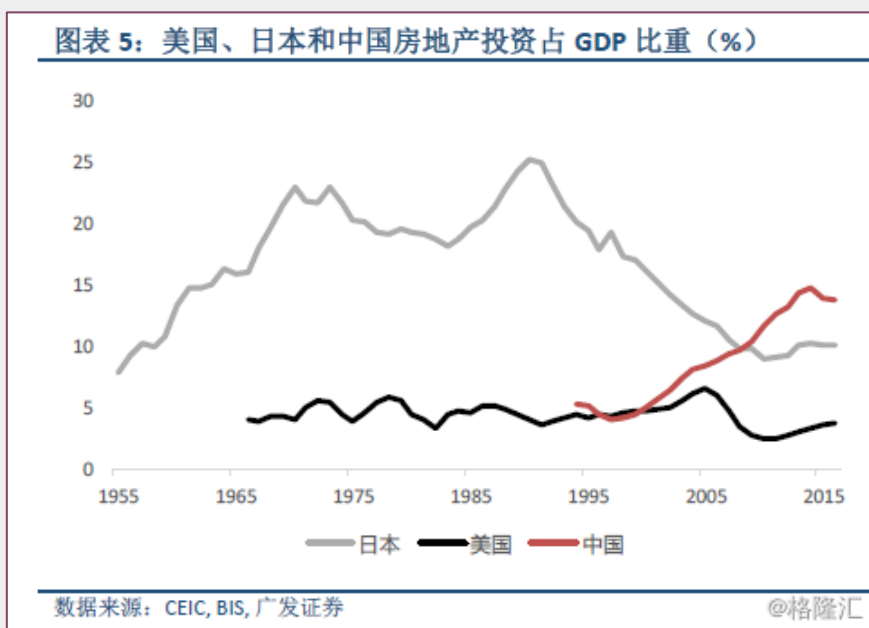
图表 4: 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及占 GDP 的比例 (%)



@格隆汇

其次，都是发生在对美外贸顺差高、美国财政赤字高的“双高”时代。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大背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很接近，当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峰值时占美国整个逆差的 50%左右，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占比目前就在这一水平（图表 3）。同时，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为 1%左右，虽然远低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但与八十年代的水平相当。

第三，房地产价格泡沫都处在较高水平。如果采用间接指标来衡量房地产价格泡沫，即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中国目前处在主要国家的最高水平，即 14%左右，即由于高房价导致更多的资源配置到房地产行业（图表 5）。这一水平虽然还远不及日本九十年代初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前夜的 25%，但已经处于风险区域。美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房价泡沫破灭，但其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一般不到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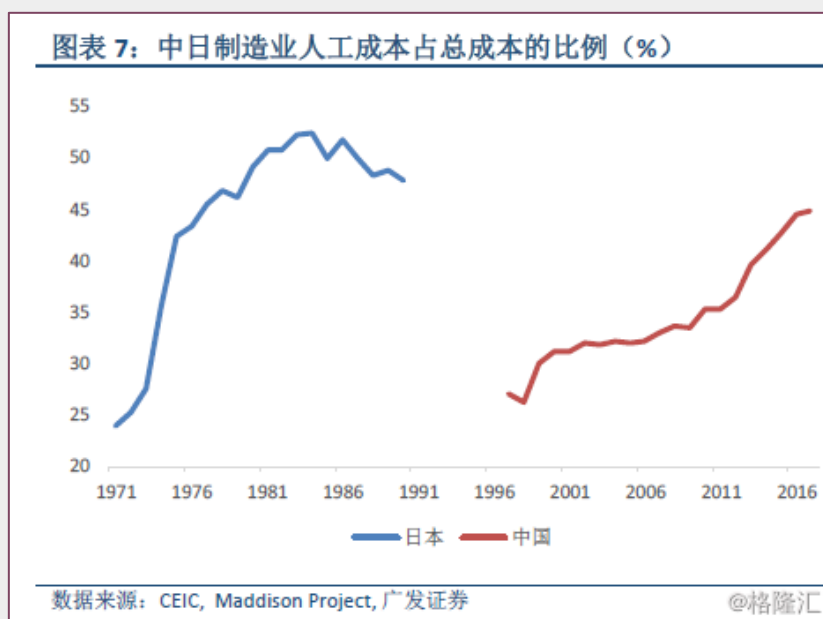


第四，整个经济的负债率都偏高，违约风险较大。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债务占 GDP 的比重开始快速升高，由 2008 年的 142.8% 上升到 2017 年的 256.3%，与日本九十年代初的水平接近**（图表 6）。

第五，都处在低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初期。相对而言，日本属于较小的国家，其制造业人工成本占比上升较快，在 1971-1981 年间，从 25% 左右跃升至 50% 左右（图表 7）。相对而言，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占比已经接近日本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当时日本的低端制造业已经开始向中国转移。**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恰好是由于人工成本提高，不少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中美贸易摩擦如果加剧，为规避高关税，会有更多的企业转移海外。**

粗略划分，自二战之后，全球范围内出现过两次世界级的制造业转移浪潮：第一波是美国制造业向德国、日本转移，后期扩散至亚洲“四小龙”；第二波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德国和亚洲

“四小龙”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二战后日本百废待兴，利用相对廉价的人工成本，承接了大量从美国流出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奠定了日本制造业在世界的地位，出口也随之增加。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日本制造业工人已不再便宜，日本试图通过制造业升级来获得更大的发展，与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美国的利益冲突加剧，美国对日本发动贸易战。同样的，之前 40 年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低廉的人工成本，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都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质。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优势也在逐渐丧失。中国制造 2025 就提出要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产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等行业，形成了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冲击，同样使美国感到了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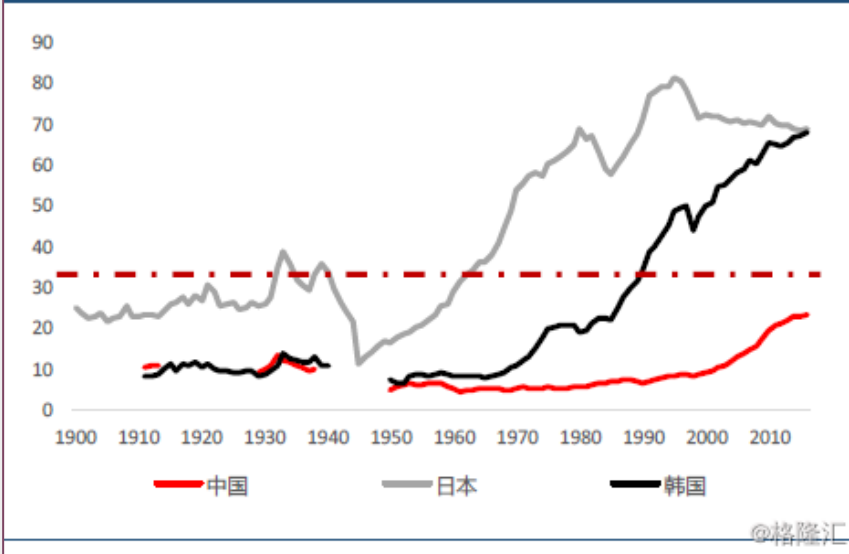
当然，中国与日本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即日美贸易摩擦发生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而中美贸易摩擦则发生在这之前。我们认为，按 PPP 计算，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美国同期人均 GDP 的三分之一，即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即跨过陷阱，而其房价泡沫破灭发生在 30 年之后，可以说日本掉入的是“高等收入陷阱”（图表 8）。就人均 GDP 相对于美国的比例而言，中国目前接近 25%，如果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中国房价泡沫破灭或系统性危机，我们不应低估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从时间维度来看，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未来 10 年最为关键。一方面，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急速恶化；另一方面，需要找到摆脱贸易摩擦纠缠、同时又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可持续新动能的长期解决方案。

## 二、美日贸易战的长期性及结果

美日贸易摩擦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七十、八十年代进一步升级，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进入白热化阶段，前后持续时间长达 30 余年。在这期间，美国对日本发动了大约 7 轮贸易战，涉及纺织品、彩电、钢铁、汽车、半导体等产品，也提出过开放日本国内市场和日元升值等要求（图表 9 和 10）。

图表 8: 主要国家人均 GDP 相对于美国的水平 (%，PPP 计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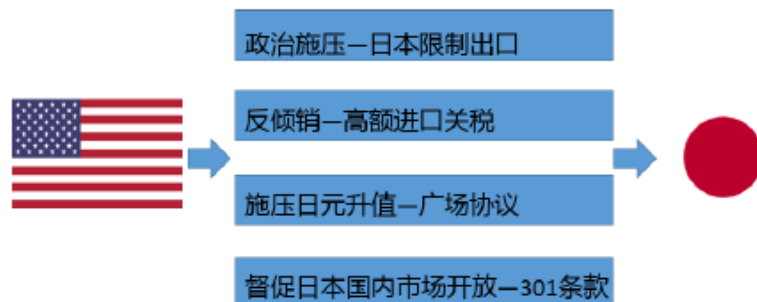
图表 9: 美国对日本贸易战概要

- 1 • 1968-1972 纺织品战
- 2 • 1976-1977 彩电战
- 3 • 1976-1978 钢铁战
- 4 • 1979-1981 汽车战
- 5 • 1985 汇率战
- 6 • 1987-1991 半导体战
- 7 • 1989-1994 结构性障碍

数据来源: 广发证券

@格隆汇

图表 10: 美国针对日本贸易战的具体措施



@格隆汇

**1、纺织品战** (1968-1972): 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开始, 日本纺织品对美出口就开始增加, 引起了美国纺织品行业的不满。由于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 在政治经济上依附美国, 在贸易谈判中比较弱势; 两国在纺织品贸易方面签订的协议包括 1957 日美纺织品协议, 1963 日美棉纺织品长期协定, 最终在 1972 年达成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这场纺织品摩擦拉开了美日贸易战的序幕。

**2、彩电战** (1976-1977): 七十年代起, 日本彩电行业飞速发展, 出现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彩电巨头, 对美国彩电出口也迅速增加, 约占美进口彩电的 90%, 占据美 30% 以上的市场份额。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针对这种现象采取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作出了不利于日本的裁定, 要求日本主动限制对美彩电出口, 日本政府也不得不鼓励本土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3、钢铁战** (1976-1978): 几乎在同一时间, 日本钢铁业也飞速崛起, 美日钢铁贸易逆差日趋严重。美国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美钢铁出口, 并通过 1977 年反倾销起诉和 301 条款等对日本施压。最终于 1974 年美日签订了自愿限制出口备忘录, 1976 年签订了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 1978 年建立了美国钢铁“自动启动反倾销诉讼”的制度。

**4、汽车战** (1979-1981): 进入八十年代, 日本本田丰田等汽车厂商崛起, 物美价廉的日本车广受世界欢迎, 日本汽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而美国汽车行业开始走向衰落。美国发动对日汽车贸易战, 要求日本自愿限制汽车出口, 开放国内市场, 并要求日本汽车厂家到美国投资建厂。最终, 到 1981 年两国签订美日汽车及零部件贸易协议 (后于 1994 年撤销)。

**5、汇率战** (1987-1991):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 日本政府选择的策略是一再妥协, 但是仍然没有扭转日本对美国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于是, 美国将此归因为美元的强势。1985 年 9 月 22 日, 美日德法英五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 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 达成联合干预国际外汇市场, 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 (包括日元) 有序贬值, 以达到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协议, 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

**6、半导体战** (1987-1991): 广场协议并没有缩小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 八十年代后期, 美国对日本半导体行业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美国发动第六轮贸易战, 通过 301 条款, 反倾销诉讼条款等禁止日本企业在美投资与并购, 并对日本半导体行业征收制裁性关税。半导体战以 1987 年两国达成美日半导体贸易协定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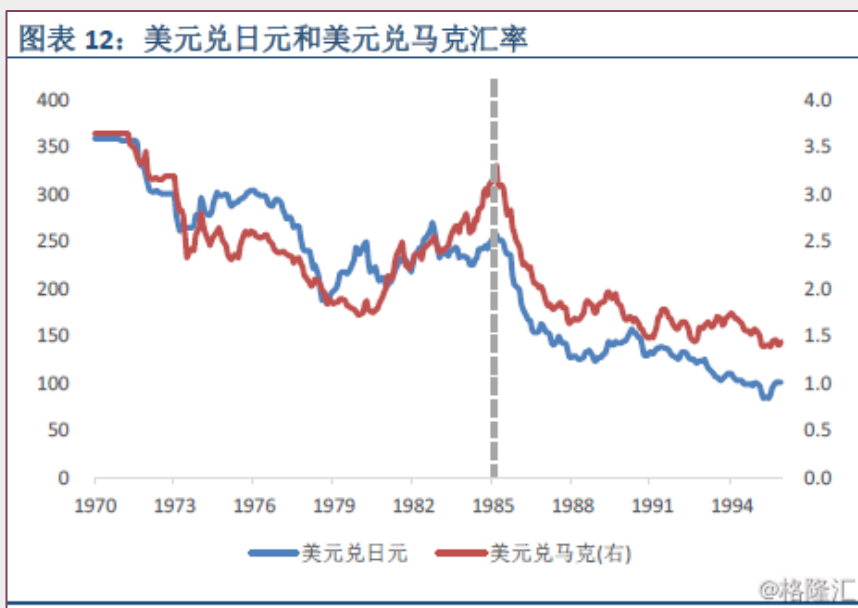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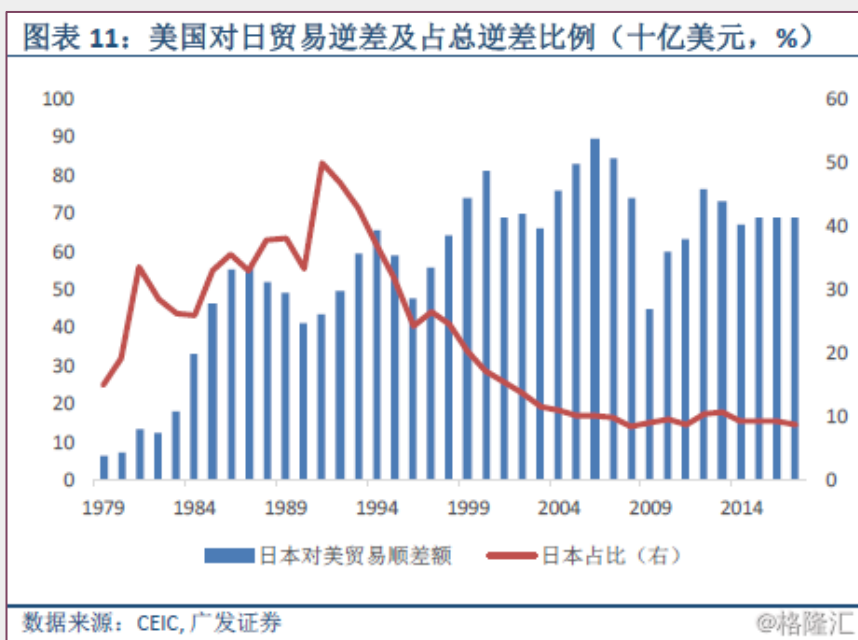
**7、结构性障碍** (1989-1994): 八十年代末, 美日贸易摩擦的焦点转向结构性因素。

1989 年美国根据国家贸易评估报告, 启用超级 301 条款来迫使日本启动谈判。紧接着, 美国以国务院、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处三个部门为主导, 与日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 最终两国签订《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 日本承诺 10 年内投入 430 万亿日元公共投资, 并修改不利于外企投资的相关法律, 调查商品价格并控制公共用品价格。在美国发动轮番贸易战之后, 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并没减少, 但逆差上升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从美日贸易逆差总额看, 从 1979 年到八十年代峰值 (1987 年)

时，总额增加了 8.5 倍；这之后到 1994 年逆差额最高值只增长了 17%（图表 11）。从相对值来看，美日逆差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于 1991 年达到创历史记录的 50% 之后，即持续滑落到目前的 10% 左右。从这个角度看，美日贸易摩擦最终分出了输赢，日本原有的增长模式终结。

客观而言，**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不能完全归结为美日摩擦，也有政策操作失误的原因。**作为对照，德国马克在同期对美元大幅升值，但是德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更为积极主动，对德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较小（图表 12）。日本央行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日本本土的资产尤其是不动产迅速升值，直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央行才意识到泡沫的严重性，开始主动挤泡沫，但已为时太晚。

当然，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的相对衰落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假如美日贸易摩擦没有发生，则有两种可能：或者，日本利用先发优势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是美国希望避免的；或者，日本仍不可避免地被中国从总量上超越，美日贸易战并没有改变日本经济原有的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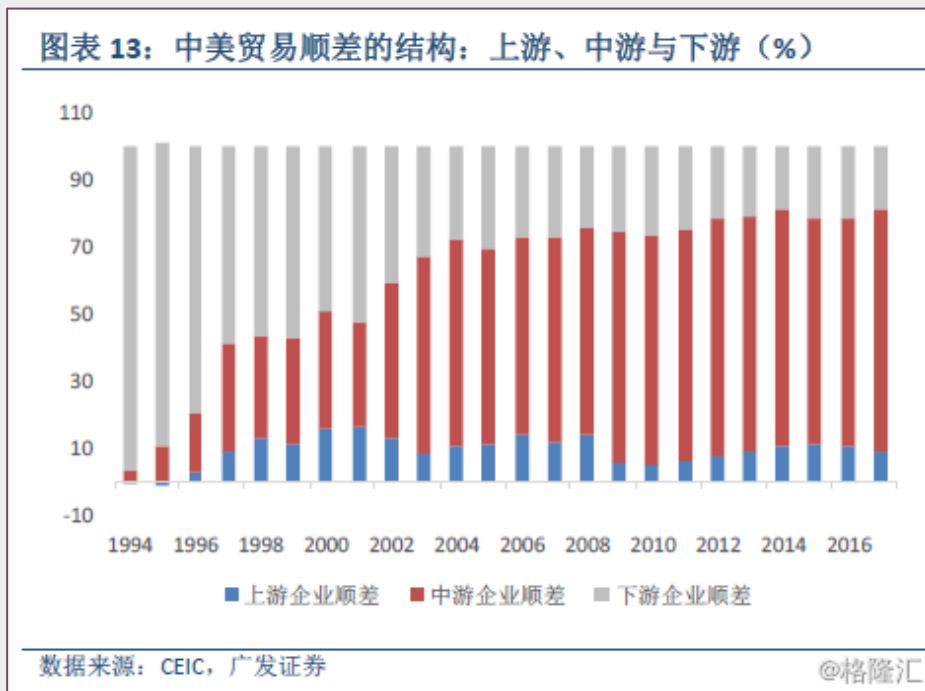


### 三、中国可能的选择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中国有充分的条件避免重蹈日本覆辙。其一，已有前车之鉴，避免重走日本老路的两个关键点已为各方熟知，一是防止本币过度升值，二是防止过度依靠房地产业维稳经济增长。其二，如果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则应采取措施大力挖掘 14 亿人口消费潜力，即使不依靠出口增长，中国经济仍有能力保持 4-6%的增速。其三，以鼓励国内消费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可以事半功倍，既让中国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也有利于化解地缘政治冲突，毕竟在未来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最有潜质成为世界新的消费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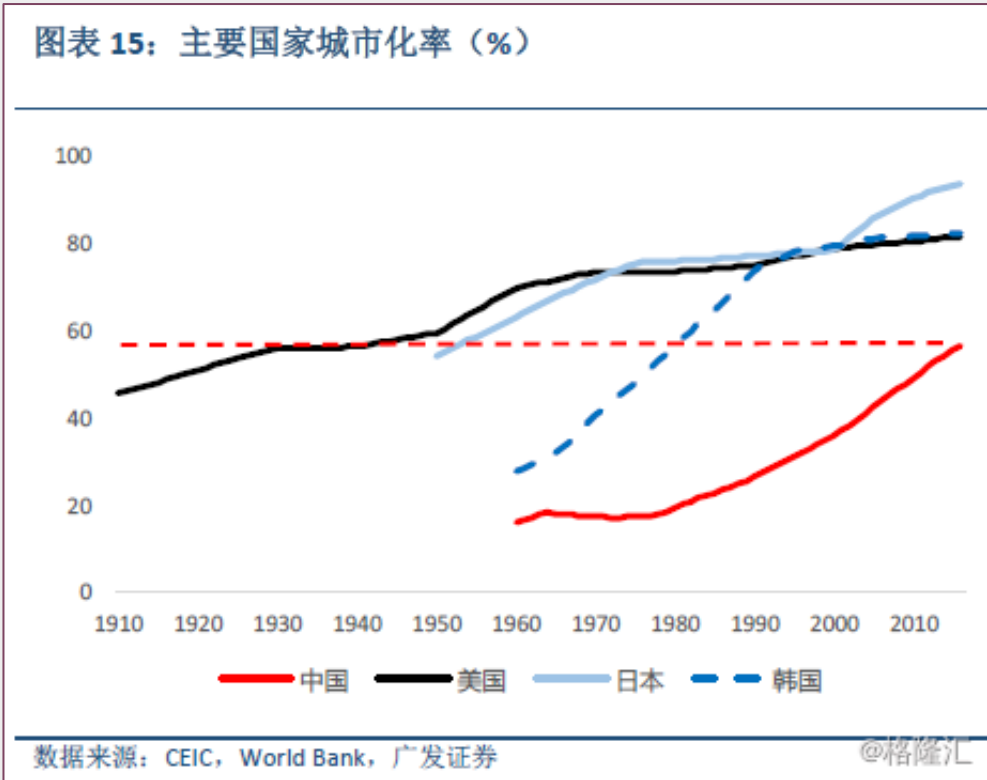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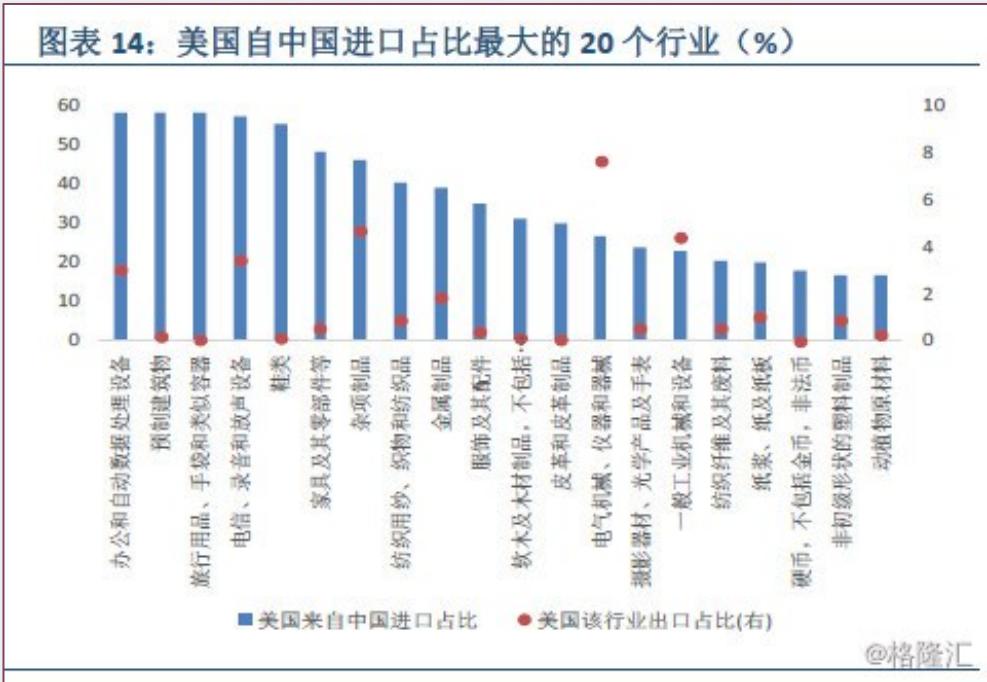
#### 3.1 短期注重化解贸易战风险

短期来看，贸易摩擦确实没有赢家，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这是短期化解贸易战风险的切入点。相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现在全球化更加深入，如果中美开启贸易战，最先受伤的将是跨国公司。根据 2016 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对美出口最大的 25 家企业中有 21 家并非中国大陆企业，其中 14 家来自台湾地区，4 家来自美国，2 家来自韩国，1 家来自香港。这些对美出口最大的企业，其实不少都只是代加工企业，比如在这 25 家公司中，就有来自台湾地区的鸿海精密的三家分公司，其主要业务就是从其他地区进口组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组装成电子成品，然后出口到海外，其中又以对 Apple 产品的组装最为出名。但是鸿海精密（中国）的生产附加值其实并不高，之所以能位列对美出口最大企业之一，在于目前并不合理的国际贸易计算方法。所以，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不仅会伤害到中国，也会伤害到日本韩国等盟友，也包括美国的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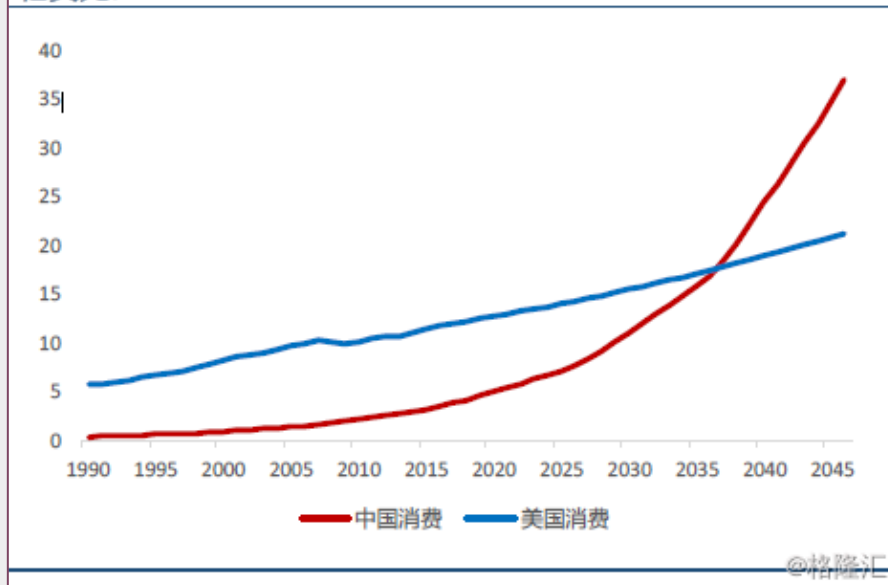


此外，中美外贸顺差或已经开始见顶回落，而且两国经济结构决定了产业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从中美贸易顺差的结构来看，来自下游制造业的占比已经大幅下降，随着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这一部分的顺差继续减少只是时间问题。即使中游资本品行业带来的顺差上升，主要是同一产业链上的

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图表 13）。目前中国中游企业产品出口到美国，不少是作为美国下游企业的投入品，如果对这些产品征收高关税，势必会抬升美国下游企业的原料成本，削弱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样，美国从中国进口占比最多的行业中，不少是以旅行用品，鞋类，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多是占美国出口份额比较少的行业，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需从其他国家进口，即对这些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只是美国外贸逆差的转移而不是减少（图表 14）。



图表 16: 按过去 10 年增速推算未来中美居民消费支出规模 (万亿美元)



### 3.2 长期立足鼓励国内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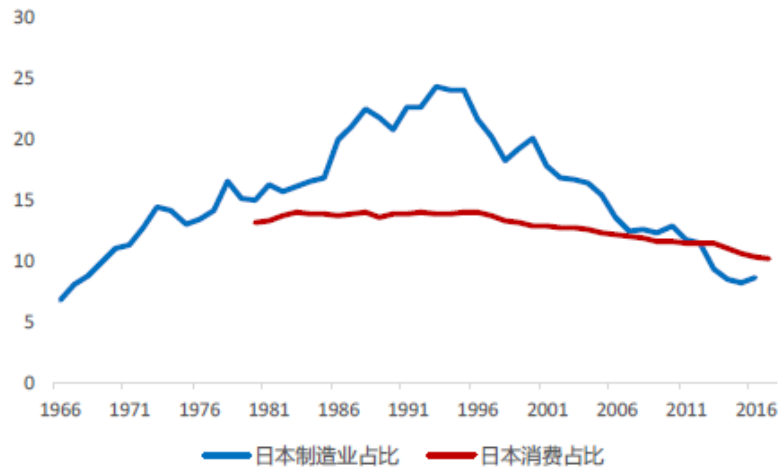
加快推进城市化，是鼓励消费的根本途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城市化已经处在后期，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80%；而目前，中国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仅为 56.8%，仅相当于日本五十年代的水平（图表 15）。因此，不同于当年的日本，未来 30 年左右，中国会有超过 20-30%的人口在城市定居，国内旺盛的消费需求，可以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以保持合理的但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速。

改革开放 40 年来，工业化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中国的消费相对滞后。中国出口、投资和消费占 G20 的比重分别从 1980 年的 1.6%、2.2%和 1.4%，快速提升至 2016 年的 22.0%、27.9%和 10.1%，消费没有同比例增长。中国人均消费占人均 GDP 的比例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明显偏低。按照我们的估算 1，未来 30 年，按不变价计算，中国消费支出大约可以增长 4-7 倍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增幅将大幅度提高，中国名义消费增幅或可能会高达 18-32 倍左右。目前，中国消费总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但仍只是美国的 30%。如果我们按照中国过去 10 年增速外推，同时维持美国的路径不变，那么，中国居民消费支出总规模或于 2037 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中心（图表 16）。

### 3.3 善用大国优势，以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

大国优势是中美贸易摩擦中值得关注的中国优势之一。日本在失去出口增长支撑之后，制造业增加值占 G20 的比重即掉头向下，从 1993 年最高点的 24.3%，跌至 2016 年的 8.6%（图表 17）。从占比来看，日本回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发时的水平。与此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占 G20 的比重也缓慢下降。八十年代末日本制造业与消费占 G20 比重的剪刀差，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日本的制造业占比最终回到了由消费实力决定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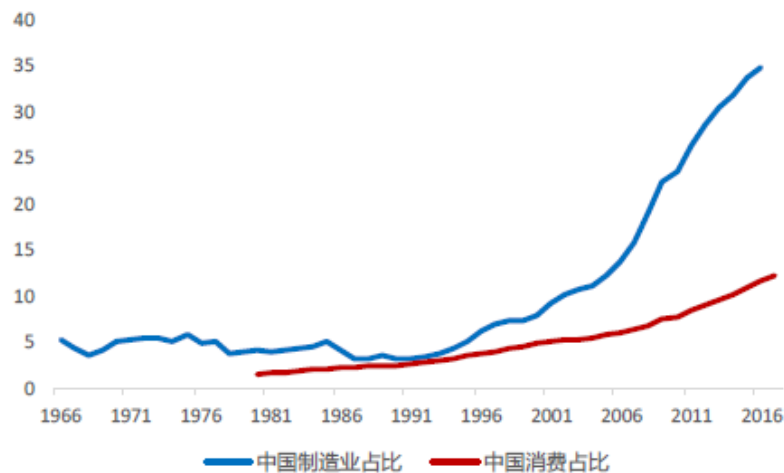
图表 17: 日本制造业和消费占 G20 的比重 (%)



数据来源: CEIC, World Bank, Conference Board, 广发证券

@格隆汇

图表 18: 中国制造业和消费占 G20 的比重 (%)



@格隆汇

与日本九十年代初相比, 中国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表面上看, 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和最终消费占 G20 比重的剪刀差为 23.2 个百分点, 远胜于日本八十年代剪刀差大时的 10.5 个百分点(图表 18)。如果中国走日本的老路, 制造业占比或逐步向消费占比回归。而现实是, 中国消费占比已经在缓慢上升, 如果能够通过必要的改革和创新, 如前面提到的城市化, 以及可能的减税和提高社保、医保福利等措施, 将中国从出口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 中国的消费占比有可能向制造业占比靠拢, 并最终推动后者的上升。中国最终能否成为消费大国, 不但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果, 也将最终决定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

[【返回目录】](#)

## 王明远：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华援助和投资

[王明远 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特约研究员。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40周年。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与稍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访美，共同构成中国改革与开放的标志性起点。40年来，中日关系走过了阴晴不定的历程，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日本的身影，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的官方援助和企业投资对中国改革的顺利起步，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本文主要考察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日本对华援助和投资情况，让我们对改革开放早期日本的作用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 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ODA）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亟需获得国外贷款。早在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未来8年工业增长率要达到10%以上。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中央领导人做出了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设想，仅1978年与西方国家签订的设备引进合同额就达63.6亿美元。然而，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只有20亿美元，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大规模的合作项目。因此，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要尝试利用外部资金，来弥补中国建设投入的不足。



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政府职务还只是副总理，但是在日本受到元首级别的礼遇

1978年下半年，日方政经代表团频繁造访中国，分别有铃木善幸、竹入义胜、稻山嘉宽、冈崎嘉

平太和土光敏夫等，为中国改革开放热心建言献策。邓小平每次都会见他们，并对他们谈到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贷款(以下简称“ODA”)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10月底，邓小平在访日时明确表示“愿意研究”向日本申请 ODA。

虽然不少发达国家都对中国释放善意，邓小平等意识到只有日本的政府贷款最可行。西方国家很难满足中国的数额要求，并且有很多附加政治条件，而日本政府不仅数字上相当慷慨，并且没有附加条件。日本如此积极，一方面则是想通过经济援助，获得在华市场竞争中的先机；另一方面 ODA 带有对侵略战争的“准赔偿”色彩，因为，其中超过五分之一以上属于赠予，并且早期日本 ODA 援助国，都是“二战”时期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比如韩国、印尼、缅甸。

| 概况      |                               | 主要建设项目  |
|---------|-------------------------------|---|
| 第一次日元贷款 | 3309亿日元，1979-1983年实施，偿还期限30年。 | 1.石臼所港建设项目<br>2.兖石铁路<br>3.京秦线扩建<br>4.衡阳广州铁路扩建<br>5.秦皇岛港扩建<br>6.五强溪水电站   |
| 第二次日元贷款 | 4700亿日元，1984-1990年，偿还期限30年。   | 1.郑州至宝鸡铁路电气化改造<br>2.大秦铁路建设<br>3.连云港、青岛港扩建<br>4.北京地铁<br>5.津沪广电话网改造<br>6.北京供水、污水处理项目<br>7.四城市煤气、供水项目<br>8.天生桥、五强溪水电站  |
| 第三次日元贷款 | 8100亿日元，1990年—1995年，          | 1.武汉、重庆、铜陵等5座长江大桥建设，齐齐哈尔嫩江大桥建设<br>2.内蒙古、陕西、云南、江西化肥厂<br>3.朔黄铁路、漳泉铁路、南昆铁路、西安至安康铁路、宝鸡至中卫铁路、衡水至商丘铁路<br>4.北京地铁二期<br>5.首都机场、武汉天河机场扩建，民航管理系统现代化项目<br>6.天津、厦门等7城市供水项目<br>7.鄂州、九江、河津、三河等火力发电项目<br>8.宝山、青岛、盐田港、海南岛等基础设施建设 |
| 3位      | 9698亿日元，1995年—2000年，          | 1.北京首都机场、乌鲁木齐机场、兰州中川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改造或建设<br>2.兰州、沈阳、本溪、淮河、湘江、松花江等环境综合治理，柳州酸雨治理<br>3.黄土高原植树造林<br>4.海南岛东线、新郑、杭衢等高速公路建设<br>5.长江中游城市防洪<br>6.三江平原商品粮基地建设<br>7.新疆、甘肃防治荒漠化  |

表一：四次日元贷款概览

数据来源：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所著《JICA 在中国的合作事业概況》，2015年

1979年9月1日，中国政府派出以谷牧副总理为首的代表团访日，正式洽谈申请 ODA 的问题。内容为 8 个大型建设项目，即京广铁路衡阳广州段扩建、五强溪水电站、龙滩水电站、兖石铁路及石

日所港口建设等，共需 55 亿美元左右。日本政府原则同意了中方申请，并且在当年 12 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期间，正式宣布为中国提供发展援助贷款，即第一次日元贷款。

1983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日后，中日关系再度掀起高潮。第二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回访时宣布第二次日元贷款计划，此次贷款规模为 4700 亿日元。第二次日元贷款期满后，1988 年日本首相竹下登访华时，又宣布为中国提供第三次日元贷款，此次规模远远超过前两次，为 8100 亿日元，年利率则降至 2.5%，用于 52 个项目建设。1996 年至 2000 年实施第四次日元贷款，贷款额为 9698 亿日元，最低利率降至 0.75%，共 93 个项目，鉴于中国发展中出现很多严重的环境问题，此次日元贷款资助的 93 个项目中，有 21 个是环保项目。

日本政府 ODA 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的国外资金援助的主要来源。根据中国接受外国援助的承接单位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的统计，1979 年至 2005 年，日元 ODA 占中国所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援助的 67.2%，数额是德国贷款的 9.8 倍，法国贷款的 16.4 倍。即便把国际组织援助列入，日本也高于世界银行（391 亿美元）和亚洲开发银行（162 亿美元）对中国的支持力度。考虑到亚洲开发银行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其历任行长均由日本人担任，日本又是其无可争议的最重要资金来源国，可以说，中国不仅获取日本政府的直接援助贷款，亦通过国际组织获得来自日本的资金的支持。

| 国家/国家组织  | 贷款援助数额  | 利率及还款要求  |
|----------|---------|--|
| 日本       | 439亿美元  | 年利率0.75—3.5%不等，1998年以后所有贷款利率将至2%以下，还款期限30—40年，其中前10年不需付利息。 |
| 世界银行     | 391亿美元  | 0.75%年利率，1%手续费，20年还款期限。                                    |
| 亚洲开发银行   | 162亿美元  | 基本与世界银行相同  |
| 德国       | 44.9亿美元 | 2%年利率，还款期限通常为30年。  |
| 法国       | 27亿美元以上 | 同上   |
| 西班牙      | 27亿美元   | 年利率1.5—2%，还款期限20—20年。                                      |
|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 20亿美元   |  |
| 英国       | 12.9亿美元 | 若贷款期限12年，利率为1.5%；贷款期限30年，利率为5%。                            |

表二：中国贷款援助主要来源（1979 年-2005 年）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外资司主编《1979-2005 中国借用国外贷款》，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 年

20 世纪 90 年代，日元 ODA 在中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始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ODA 在中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最高年份的 1994 年曾高达 27%。“六五”至“八五”期间，中国建设的 13000 公里电气化铁路，有 4600 公里是利用日元贷款改造建成的，占总长度的 35.4%；大约 470 个大型港口泊位中，有 60 个泊位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占大型泊位总数的 12.8%；1100 万吨每日

污水处理能力中,有 400 万吨每日处理能力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占总处理能力的 36.4% (冯昭奎、林昶, 2011, 第 224 页)。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于加快经济运行效率立下汗马功劳,日元 ODA 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援助不仅着眼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还有效利用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的诱导作用,推动中国转变发展理念,重视环保节能。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ODA 和技术资助的环保项目,涵盖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所有省、市、自治区,治理范围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和荒漠化等。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政界虽然有提早让中国“ODA 毕业”的言论,但是依然加大 ODA 在环保领域的投放力度,2001 年后提供的 7000 余亿日元 ODA 中,多数是资助环保项目的。

### JICA 主导的技术合作

日本官方援助除了 ODA 外,亦支援技术合作项目,促进中国科技和管理进步。技术合作自 1979 年开始实施,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负责实施,至 2014 年已经实施 125 个大型合作项目,日方提供资金超过 1800 亿日元。JICA 推动的第一个技术援助项目即为人熟知的中日友好医院,该医院由日本提供全部设备,价值达 164 亿日元,建成 30 多年来已经是中国综合科研水平最高的医院之一。另一个早期重要项目是日方出资 105 亿日元援助建成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该机构亦被称为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是中国环境经济学、公共政策研究和环保评估的权威机构之一。

| 项目名称  | 实施期限      |
|---|-----------|
| 中日友好医院  | 1981-2000 |
| 天津企业管理培训中心                                      | 1983-1991 |
| 中国专利情报检索系统开发                                    | 1986-1990 |
| 中国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                                    | 1986-1991 |
|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 1992-2002 |
|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自动化系统                                 | 1993-2000 |
| 海南岛综合开发计划调查                                     | 1985-1986 |
| 上海大气污染对策调查                                      | 1986-1987 |
| 齐齐哈尔重机、大连化工、莱芜钢铁厂、常州拖拉机、北京三纺、太原重机等119家工厂技术现代化项目 | 1981-2000 |
|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 1986-1990 |
|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展览中心                                    | 1991-1994 |
| 贫困地区结核病防治计划                                     | 2001-2002 |

表三：部分日本援助技术合作项目

数据来源：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所著《JICA 在中国的合作事业概况》，2015 年

名专家工作。由于中日技术合作项目至少半数支援落后贫困地区发展，来华专家任劳任怨、不畏艰苦，获得很高的社会评价。从 1991 年起，中国政府向在华有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授“友谊奖”，到 2009 年，这个奖项共授予 1099 名外国人士，其中，日本专家以 210 多位的获奖人数位居各国第一。

技术合作还赞助中国向日本派遣研修生，其中包括长期进修、青年研修和青年干部访问交流等，日本已经接收中国超过 36000 名研修生。其中的青年研修项目包含“中日青年友谊计划”，这个项目系 1986 年由当时中日两国领导人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共同倡议，由全国青联负责实施。研修生培养项目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大大促进了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



1983 年胡耀邦访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设家宴款待他，1984 年中曾根访华时，胡耀邦也设置了家宴招待中曾根，这是 1949 年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的“家宴外交”

## 日本企业投资

以上讨论的是日本官方的援助行为，日本企业界对华投资和技术转移的影响可谓更加深远。改革初期，日本的产业模式和企业管理模式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对日本经济产生浓厚的兴趣。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9 年、1980 年，邓小平接见日本外宾多达 26 次，其中单独会见松下幸之助两次。后来因其政治观点备受争议的邓力群在 1978 年底访日回来后，也曾与马洪这样的改革志士撰写了《访日归来的思索》，全面介绍日本企业经验，并到处在各大机关做报告，他曾说“到日本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

然而，中国吸引日本投资初始并不顺利，主要是中国当时法制不健全，经常会出现不遵守契约的现象。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宝钢事件”。宝山钢铁设立之初，中方与新日铁公司签订了巨额的设备

引进协议，后来，中方意识到资金数额庞大的合资项目，短期内无力承担，提出解约的要求，并主动支付了 4000 万美元的违约金。对此，日本也表示理解和支持，日本派出了前外相大来佐五郎领衔的代表团沟通此事。大来佐五郎认为：“中国缺乏经验，没有恶意。” 1983 年胡耀邦访日的时候，对日本工商界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并专门组织了与企业家的早餐会，加上胡耀邦本人鲜明的改革立场，对日本工商界触动比较大，此后，日本对华投资有了明显增长，进入第一个高潮。1979-1983 五年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为 57 个，实际投资额仅为 2.67 亿美元，到 1984 年项目数激增到 138 个，实际利用外资额 2.25 亿美元。1984-1988 五年间，累计投资项目数 623 个，实际投资额 18.25 亿美元 (李光辉，2002)。整个 80 年代，中国共吸收外资 215 亿美元，其中，日资 32 亿美元，以国别计算名列第一。

这一时期，在华投资影响比较大的是家电行业，1980 年 12 月成立的福州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是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也是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1984 年后，松下电器开始成为在中国投资最积极的外企之一，松下电器在中国转让了 7 个彩电生产线和 6 个洗衣机生产线，牡丹、长虹、小天鹅这些知名家电品牌都是采用松下生产线建立起来的。1987 年，松下电器又在北京设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BMCC)，投资 6 亿余人民币，是 80 年代仅次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规模第二大合资企业。



坐落在北京朝阳区酒仙桥附近的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尤其是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日本企业掀起第二波在华投资高潮。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投资无论是产业布局和投资数额上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格局。到 1997 年底，日本对华投资协议额达到 276 亿美元，实际利用额 158 亿美元，远远高于过去 12 年的投资综合。而

在产业布局上，也从家电拓展到机械制造、汽车、服装、日化等行业。

日企在华投资所起的作用，远超过其统计数字上为中国 GDP 增长做出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中国制造业孵化器的作用。与美国和欧盟企业相比，日企在技术转移和产业准入方面都比较慷慨，并适应中国低资本和富劳动力的国情。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中比较占有优势的产业，比如家电、电子、机械设备、高铁装备、汽车，都跟改革初期与日本合作打下一定基础有关。以汽车为例，中国第一批家用汽车天津夏利和铃木奥拓均是完全采用日本技术，与日企合作生产的，此后，长安汽车、东风汽车、广汽集团等分别与铃木、本田等合作，生产出的合资品牌不仅提高了中国汽车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促使中国民族自主品牌技术产生质的飞跃。

| 日方母公司 | 在华设立企业名称        | 成立时间 |
|-------|-----------------|------|
| 日立    | 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     | 1980 |
| 三洋    | 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    | 1983 |
| 三井    | 长富宫饭店           | 1984 |
| 三洋    | 华强三洋电子有限公司      | 1984 |
| 三洋    | 广东三洋空调有限公司      | 1984 |
| 三井    | 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 1987 |
| 松下    | 北京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     | 1987 |
| 富士通   | 福建富士通通信软件公司     | 1987 |
| 三菱    |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 1987 |
| 日立    | 深圳赛格日立彩色显示器件厂   | 1989 |
| 佳能    | 佳能珠海有限公司        | 1990 |
| 马自达   | 海南马自达旅行车有限公司    | 1990 |
| 东芝    |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 1991 |
| NEC   | 首钢日电电子有限公司      | 1991 |
| 本田    | 五羊本田（广州）摩托有限公司  | 1992 |
| 本田    | 嘉陵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 1992 |
| 日产    |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 1993 |
| 松下    | 松下万宝（广州）空调器有限公司 | 1993 |
| 松下    | 厦门松下音响有限公司      | 1993 |
| 五十铃   | 江铃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 1993 |
| 东芝    | 上海新芝电子有限公司      | 1994 |
| 日立    | 日立电梯（广州）        | 1995 |

**表四：改革开放早期日企在华设立的大型投资项目**

（数据来源：王志乐著，《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张季风主编《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经济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 结语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温家宝等都在不同场合对改革开放早期日本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中国人干出来的，却也不可否认，这份成就也受惠于以正确的外交姿态获得国外投资和援助。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外部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否则可能陷入“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40年来，中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虽然有国家利益、贸易摩擦、意识形态冲突，但是，合作和共赢终究是主流。梳理和了解日本等国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对于形成正确的世界经济观和开放观，消除民间盲目自大和盲目排外意识，推动中国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有着重要意义。 🍷

[【返回目录】](#)

## 张林：增信民企债意在防范流动性陷阱

[张林 中国奥地利经济学 50 人论坛研究助理。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11 月 3 日经济观察网]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支持民营企业通过债券渠道获得更多融资。除了直接缓解民营经济融资困难、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之外，该工具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化解当前经济中不断积累的流动性陷阱风险。

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就是专门为民企发债融资提供增信支持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担保增信、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两类。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就是银行、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预先收取债券投资人或发行人的保费，承诺当出现违约情况时为部分违约损失负责。其实质就是把债券违约的风险转移给银行或保险机构，缓解债券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得债券融资变得更容易。

为了方便中小民企发债融资，中国在 2012 年专门推出了中小企业私募债，但 6 年来该品种在债券融资总额中的比重仅有 1%，被很多中小微企业称之为“鸡肋”。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投资者往往要求发行方有充足的担保或者抵押，而民营企业如果有这些就没用融资困难了。另外，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利率较高，反而使得投资人产生了风险厌恶的情绪，民企只得再次提高债券利率，由此民营企业陷入了融资困境。

最有投资活力的民营企业受制于融资困境，最终导致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化解过剩产能的需要，国有企业的投资动力也受到种种限制。虽然今年以来央行采取了定向降准等“宽货币”的举措，但“宽货币”尚未有效转化为实际的信用扩张。截至 9 月份，原口径的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速已经降到 8.97% 的历史低点，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也处于低位。不仅制造业的生产和投资走弱，房地产投资在严格调控下也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经济基本面的走低表明企业部门投资动力不足，因此其融资动力也不足。这样，即便金融机构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但却失去了投放流动性的渠道，流动性陷阱的风险就出现了。

中小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暖是“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中小微企业是生产链条的最下游，下游的经济复苏不仅有助于经济基本面的复苏，还有助于保障就业和平均收入水平的稳定，这是维持投资增速的必备条件。央行在设立民企债券融资工具的同时还提供了 1500 亿元的再贴现和再贷款额度，部分额度将成为该工具的初始基金。上半年民营企业通过债券融资的累计规模达 8 万亿元，其中债券违约涉及的金额为 250 亿元，占比为 3.2% 左右。按照融资主体来看，民企债券融资主体累计为 1611 家，其中出现过违约情况的有 70 家，占比为 4.3%。

考虑到政策鼓励下有更多中小微民营企业将通过债券融资，民企发债违约率大约在 5% 以内，那么 1500 亿元的金融缓释工具费用可以至多为 3 万亿元的民企融资需求提供担保，即便以 10% 的违约率

计算，也有 1.5 万亿的民企融资需求可以得到信用风险缓释。

当前民营企业的融资动机远高于国有部门和居民部门，民企债券融资工具恰好可以帮助多达 3 万亿的货币供给找到最合适的需求方。当然，民企债券融资工具还只是一个新生事物，理论上计算的效果到实际落地还需要配套措施。

从根源上讲，中国经济的流动性陷阱风险来自于上游企业部门融资的刚性兑付。由于有刚性兑付，地方城投平台及相关国有企业投资就面临着预算软约束，从而易于产生产能过剩的问题，上一周期的产能过剩就会形成下一周期的流动性陷阱。

截至当前，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内的国有企业债券融资数额已经达到 160 万亿元左右，而国企违约所涉的金额只有 360 亿元左右，违约金额占比不到 0.02%。按照违约主体来看，国有企业债券发行主体累计 4845 家，出现过延迟兑付等现象的主体只有 16 家，违约概率只有 0.3% 左右。这意味着，在地方政府信用背书的情况下，国企的债券融资基本上是刚性兑付。

在这种背景下，金融监管部门正在逐步剥离地方政府对城投平台的信用背书，地方国有部门的债券融资动力和投资动力正在不断被压缩，而推出民企债券融资工具意在推动民企投资进行替代，这对于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可谓重要一步。 ■

[【返回目录】](#)

## 张沅生：对中日关系的回顾、展望与期待 |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40 周年

[ 张沅生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部主任、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文首发于 2018-9-25 微信公众号：大国策智库 ]



本文作者张沅生

### 一. 历史的回顾

中日恢复邦交后，在七八十年代，一直到 1992 年（当年实现了天皇的首次访华），在 20 年期间，两国关系曾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期，中日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政治上，通过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总结历史，面向未来，构筑起了发展和平友好合作关系的重大原则的法律框架。在此基础上，双方频繁进行高层互访并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磋商对话，大大增进了中日两国间的相互理解与信赖。

在经济上，通过相继缔结多项协定及进行积极互动，中国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日本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两国经贸合作关系迅速发展，互补性极强的两国经济合作成为强化中日关系的主要纽带。

在安全与国际事务上，中日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双方都反对霸权主义，都不谋求地区霸权；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为维护世界特别是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此期间，虽然两国间在历史、领土争议、台湾、经济及国际问题上也发生过一些摩擦，但多能较快地得到控制与缓解。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珍惜并全力维护、发展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是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突出特点。此外，当时，在总体上平衡稳定、合作为主、相互促进的中美日关系对于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冷战结束后, 自 1993 年以来的 20 年间, 中日关系却走过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先是因台湾、美日制订同盟新指针、历史等问题, 双方摩擦上升, 两国政治安全关系起伏不定, 只是当时两国经济合作还在较快发展, 从而出现“政冷经热”的状况。2006 底中日双方打破因日本领导人长期参拜靖国神社形成的政治僵局后, 两国关系曾取得一定改善与恢复(从破冰到春暖), 但进展并不顺利。2010、2012 年随着接连爆发两次钓鱼岛危机, 加之 2013 年历史摩擦再次突显, 中日关系滑到了军事冲突的边缘, 落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在此期间, 中日双方也为改善和维护两国关系做出过不少努力, 并适应形势变化制订了第三、第四两个政治文件。但遗憾的是, 这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日关系下降的趋势, 两国的经济合作最终也爱到了严重影响。

2014 年底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共识后, 两国关系逐步改善恢复, 但步履缓慢。然而, 2017 年以来,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两国关系加快了恢复改善的进程。2018 年通过李总理正式访日, 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目前双方正在准备安倍首相 10 月的对华正式访问。

两国关系为什么会走过这样一段漫长的曲折道路?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国间几大摩擦突显的直接原因外, 两国实力对比的重大变化——先是世纪之交两国强强关系的出现, 后是 2010 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并在综合国力上继续上升, 应是中日步入摩擦高发展期的深层次的原因。此外, 两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背景。

与前 20 年两国关系的黄金期相比, 在此期间, 除了经济仍是双方重要的合作基础外(2012 年后也受到很大影响), 两国的政治安全摩擦明显上升, 两国的民间感情严重恶化。在新形势下, 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上升本应成为双方开展安全合作的新的动因, 但却由于传统安全摩擦的不断上升而遭受严重阻碍。结果, 两国的战略互信严重削弱, 战略互疑不断增长, 其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政治安全摩擦。

在此期间, 两国关系的发展有三条十分深刻的教训: 一是双方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与原则未能得到遵守、甚至遭到了破坏; 二是在海上争端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中日两国未能及时建立必要的危机管理机制; 三是在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两国对话接触受到严重阻碍, 甚至全面停滞, 以至增加了双方的误解、误判, 加大了解决分歧的难度。

## 二. 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的定位

要对中日关系有一个准确客观的定位, 须全面认真分析两国在各个领域、各种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与分歧, 这不仅包括双方的政治、经济、安全、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关系, 而且还应包括双方对国际形势、国际秩序的基本判断和在多边领域的关系。

由于时间关系, 在此我仅列出两国间几项最重要的共同利益:

第一, 促进双边经济合作、促进地区及全球的经济繁荣与发展。中日两国长期互为对方主要贸易

伙伴。双方都支持全球化、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 WTO 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

第二，开展全球与地区治理，应对日益上升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如维护生态环境与治理污染、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防止 WMD 扩散、加强核安全与核安保、防止金融与能源危机、开展国际灾难救援、海上搜救等。

第三，在全球构建总体均衡、稳定、协调合作的大国关系，在东亚发展平衡稳定的中日美关系。多年来，这既是中国的主张，也是日本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专家学者的愿望。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表明，当中日美关系平衡稳定时，中日关系也发展得好，反之则受到损害。

第四，保持全球海上通道的自由、通畅与安全。中日都是外贸大国，都高度依赖中东与非洲的能源与资源。日本将海上通道视为生命线，对于改革开放后全面融入世界的中国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综合上述几点，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两个邻国和搬不走的邻居，作为对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像德法一样走出历史、超越历史，彻底实现和解，发展长期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关系，不仅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而且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

下面，谈谈中日间存在的主要分歧与摩擦：

第一，历史、台湾、领土与海洋权益是中日间长期存在的三大摩擦点。冷战结束之后，其交替出现，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困扰。近年来，对两国关系影响最大的是海上争端（包括钓鱼岛领土争议、海上 EEZ 划界争议、双方防空识别区的交叉、中国海空军从日本列岛中的国际通道进入西太平洋及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活动引起的两国关切）。可以预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三大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与海上争端仍将不时给中日关系带来较大的困扰，管控、处理好这三大摩擦点将是两国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第二，近年来，由于海上争端的加剧，中日两国在战后首次形成了东海军事对峙。相比较而言，日本在这方面显然走得更远，在其近年制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大纲等文件中，日本均已明确把中国作为主要军事安全防范对象。与此同时，日本大力加强日美军事同盟，解禁集体自卫权，已将军事防卫重心由东北转向西南，并不断加快其在西南诸岛的作战指挥体系建设和力量部署。历史经验表明，两国军事对峙一经形成将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第三，双方在东亚与亚太安全秩序上存在较大分歧。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地区外交、安全的基轴，而中国则积极主张建立与发展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主张美双边军事同盟应适应形势变化进行转型，在地区总体多边安全架构下发挥建设性作用。当前，日美积极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和“日美澳印”战略安全合作，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关切。此外，虽然双方在建立与发展地区自贸区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但因发展阶段不同，加之两国间的竞争因素，双方在路径与标准上存在不少分歧。

第四，中日战略互疑居高不下。2012 年钓鱼岛危机爆发后，中日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战

略互疑，即日本流行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对日本“走老路”、“恢复军国主义”的担心，上升到了一个历史高点。虽然这种相互威胁认知并不准确、客观，但却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上、历史上和心理上的原因，并且因两国间接连发生危机事件而被迅速放大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减少战略互疑、增加战略互信，将是两国间的一项艰苦任务。

此外，日本安倍政府目前仍在全力推动修宪以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我虽不认为这必然导致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但却很有可能使日本朝着做军事大国的方向发展。这是广大日本国民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中国人民所不愿看到的。

最后，还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在 2014 年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中，双方明确提出“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并于今年终于启动了海空联络机制。然而，三年多来，与东海争端的发展变化与风险积累相比，双方危机管控机制建设的进展明显缓慢、不足，与中美、日俄之间相比，中日之间的危机管控机制建设仍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这种状态充分显示了双方互信的严重缺失。

通过上述分析，两相比较，我认为，可以得出三条结论：一是中日之间既有重大共同利益又有严重分歧，但从总体看，双方共同利益仍是第一位的。第二，共同利益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严重分歧则是双方必须努力管控、妥善处理的问题；在这二者上，两国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必须认真汲取。三是中日竞争在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并不断上升，在某些领域或地区甚至表现得相当激烈。但是，从总体看，两国并未出现全面、长期的战略竞争，恐怕未来也难以发展成全面战略竞争。中日关系毕竟与中美关系不同。中美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则可能朝着全面战略竞争的危险方向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对于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不应是战略竞争者，而应是战略互惠的合作伙伴，两国应全力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奋斗。只要中日双方有信心，愿共同努力，中日合作伙伴关系是可以实现的。

### **三. 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与共同努力方向**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仍可能有两种发展前景：一是继续向前发展，逐步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二是再次出现反复，摩擦分歧重新严重上升。

未来，为使中日关系朝着第一种前景发展而避免第二种前景，中日双方必须共同做出一系列重要努力。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危机管理和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当前，双方应在迅速落实、严格遵守已经启动的海空联络机制的前提下，及早把制订中日海空行为准则及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提上日程。中国海警与日本海上保安厅之间也应建立海空联络机制。两国高层还应考虑重启政府与首脑热线。只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中日双方才能在海上争端仍将长期存在的形势下，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守住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从而进一步稳定东海形势，为双方恢复海上划界与共同开

发磋商谈判创造必要的条件。此外，两国还须重点管控、处理好历史、台湾两大敏感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谨言慎行，不搞小动作，更不要生大事端），共同维护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相关原则，防止这两个问题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严重困扰。

其次，应尽快重启中日防务安全对话，恢复、加强两国防务交流。这方面的努力取得进展，不仅对于解放军与自卫队加强安全分歧与风险管控，推进信任措施建设及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将对减缓以至改变双方东海军事对峙、减少两国战略互疑发挥重要作用。中日还应适时探讨开展中日美三边安全对话的可能性。历史上美中日三方都曾主动提出过举行这一对话，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这一对话如能举行，对于稳定失衡的东北亚大国关系、对于改变日美同盟与中国的严重对立将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应就海洋秩序、自由航行权、国际海洋法等开展对话，努力缩小分歧，增加共识。中日海上争端最终还是要在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对话加以解决。两国应抓住当前东海、南海形势相对缓和之机，重申双方“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共识，并就有关国际法规开展对话，为未来逐步解决双方东海争端创造条件。中日还应争取就南海问题达成共识：日方支持中方提出并得到东盟支持的解决南海领土主权争议和维护南海稳定的“双轨思路”；中方支持包括日本在内的有关各国共同维护南海海上通道的自由、通畅与安全。双方还应把近两年来双方已达成或有意开展的诸多海洋领域的合作落到实处或推向前进。

第四，大力加强两国在重大共同利益上的合作。一是维护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 WTO 规则，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与经济改革，二是积极参与全球与地区治理、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为此，双方要努力保持与发展近两年来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恢复、增长的势头；加强双方新经济、新产业、新技术合作；通过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的成功合作，将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合作意愿化为中日经济合作的新动力；双方还应共同推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当前，中日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维护中东和平稳定、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共同利益都进一步突显。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将有力拓宽双方合作的基础，积累与增加双方的互信。

第五，努力恢复、扩大与加强两国民间交流、公共外交。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两国关系发展黄金期的历程，当时两国民间友好交流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内容之深，曾是两国其他对外关系所难以比拟的。遗憾的是，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后来遭遇了严重的风雨波折。近两年来，双方利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40 周年的时间节点，努力重启与发展民间友好交流，两国间的公共外交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今后，双方要将这一努力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这对于加强两国民众、特别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及对对方国家的了解，逐步减少双方在相互认知上普遍存在的各种误解，增加友好感情，努力培育有利于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民意基础与舆论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六，坚持四个公报确定的政治基础，明确新形势下两国关系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当时中日两国一致同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反对霸权主义，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合作关系。这是双方对中日关系的最初定位。1998年在《中日联合宣言》中，根据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双方明确提出，中日关系对两国均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宣布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又进一步提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然而，不久之后中日关系却经历了一段最困难的时期。在此期间，四个政治文件对两国关系的定位一度受到了严重的置疑与挑战。现在，随着两国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应是再次明确两国关系定位与发展方向的时候了。今明两年，如果两国领导人互访得以成功实现，两国签订中日第五个政治文件的准备工作将可能提上日程。第五个政治文件须以两国现有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根据国际形势、两国国内形势及双方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同时还应制订新的具体措施，努力推动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总之，在经历了较长期的严重困扰之后，中日关系终于在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再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一个来之不易、充满希望的新起点。中日两国应抓住机会，共同努力，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争取早日走出因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而形成的两国摩擦高发期和不适应期，走上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 ■

[【返回目录】](#)

## 塞缪尔·莫恩：抵制“法律人治国”

[塞缪尔·莫恩 Samuel Moyn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与历史学教授，欧美著名人权史专家，2018-11-07  
翻译：汤心仪]



本文作者塞缪尔·莫恩

民主党人为阻止布雷特·卡瓦诺 (Brett Kavanaugh) 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奋力一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一名女性指控曾受到卡瓦诺的性侵犯之后。经过昨天的事件（译注：10月4日，联邦调查局报告证明，受到性侵指控的卡瓦诺实际上是清白的），卡瓦诺通过提名几乎已成定局，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决定如何对美国司法机构受右翼控制的硬性事实做出回应。答案显而易见：美国理应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帝国。

卡瓦纳大法官参与的投票中，平权法案将会是首要事项；堕胎权利也很有可能将被废除，问题不过是它会被一次性推翻，还是逐步被取缔；第一修正案将继续为经济权力服务；其余的宪法法律将捍卫商业利益和公司。这种境况在一个世纪里都未曾出现过。

这让我们回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错误和我们的机会。上一次法院变为富人和强者反对政治多数的工具时，罗斯福与最高法院进行了对抗。1937年3月，民主党一争取到足够的政治意愿，罗斯福就告诉美国人民，是时候“将宪法和法院自身从法院中解救出来”了。



1993 年竖立的**纽伦堡人权宣言纪念碑** The way of human Rights  
共有 30 根石柱，每一个石柱上分别为各国语言，  
《人权宣言》规定：人生来自由，权利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是宪法以及对它的长期解释将我们引领至如今的境况，将大众的统治变为精英统治，将民主变为法治。正因为宪法，民主党必须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进行战斗，在这个体系中，少数族裔担任了总统职务——这在我们一生中就发生了两次。由于对高级司法系统的崇拜，民主党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有着无限权力的机构，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对事情有着不同处理方式的美国人。

众所周知，我们的制度赋予宪法法官极大的权力来做出巨大的政策决定，因此美国人最近才不得不经历这一全国性的闹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闹剧中，对于法律本身的关注消失了，因为先后受到关注的焦点是性侵是否曾发生、恰当的调查方式是什么、司法“气质”是否重要等。但是，之前关于提名的争战就已经将候选人们的实际法律观点推到了焦点之外。

罗伯托·昂格尔 (Roberto Unger) 曾写道，美国的特点是“一心一意地关注高级法官及他们的选择，将其视为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部分。”这种症状在左派和右派中都有反映，并且他们在几十年内选择“以改进解释之名义，从法官那里获得公民政治未能提供的好处”。然而，在民主国家，应该由人民制定自己的法律。早在左翼未能阻挡卡瓦诺之前，这种长期司法战略的局限就很明显，这也意味着现在进步主义唯一能采取的的行动就是重申民主。

考虑替代方案。面对最高法院未来几年坚实的保守派多数，毫无疑问，许多人都希望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John Roberts) 成为新的关键一票，他们将像对待安东尼·肯尼迪 (Anthony Kennedy) 那样，引诱他成为“中间派”。但罗伯茨将远不会像肯尼迪那样时常变卦。对于更激进的人来说，像罗斯福所做的那样控诉“宪法的背叛”似乎很有吸引力。然而，上一次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宪法革命，

发生于罗斯福新政的鼎盛时期，最终为其后五十年的非法司法授权做出了铺垫，部分原因是它只是推动了法官承诺保持克制。



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1947.3.24— ] )

巴西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政治家

摄于 2010 年 哈佛

面对敌人掌控下的最高法院，进步主义者唯一的选择就是着手长期计划，为了多数决原则，重铸基本法律在社会中的角色，使法庭失去影响力，以及在适当时机改变不民主的宪法。这就要求学习上一代保守派的做法。正是保守派盗用了最初由进步人士提出的“我们正在经历‘司法政府’”的说辞。保守派说服美国民众，无论法律文本如何表述，是左派而不是右派时常利用宪法法律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事实恰恰相反。进步主义者需要收回他们失去的掌管权。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放弃常规的与高级司法机构勾结的做法。如果进步人士想要避免依旧困扰他们的司法激进主义的耻辱，他们必须接受民主及其风险。

即使右派更为频繁地借助司法命令达成目的，自由主义者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放弃用法官权力来将他们的偏好制定为法律。这在关于隐私权和所谓的“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决策中最为显著。从赋予妇女堕胎权利的罗伊诉韦德案，到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奥贝尔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作出此类选择时，自由派与卡瓦诺的前任肯尼迪大法官结成了联盟，他们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促进同性恋和女性的权利，从而捍卫独立于国家控制的个人自由选择（虽然这个理论在大多数法律领域主要是服务于商业利益）。左派在乎的先例（如罗伊案）受到威胁甚至可能被推翻，这正将成为沉痛的打击，没有人会庆祝这一结果。但如果它无论如何都会发生，那么现在是时候转向民主战略，来保护我们所在乎的事情了。

比起威胁法庭通过各种经包装过的计划，左派更好更大胆的选择是支持改革。通过议会立法剥夺

司法管辖权、利用手段阻止司法机构审议关于堕胎或平权行动相关的案件，这些方式即使在现行法律原则下也不会明显违宪。实际上，右派多年来一直使用这些立法阻止移民和囚犯进入法院。习俗和先例的其他变化也可能削弱司法霸权。例如，通过压力下的选择或通过法律的强制，可以推动最高法院成为一个咨询机构，尤其是当法官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这些步骤将使得进步主义者能将他们的案子带到群众中去，从而为他们的政治诉求赢得多数人支持，哪怕是在他们已经因失败而放弃了的地方。

即使基础研究已证明法官有党派属性，美国仍然期待高级司法机构代表国家的原则和价值观行事。实际上当法官有权决定最重要的问题时，这种党派关系的影响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宪法的神话很难实现。“给法官授权将有助于实现进步主义者追求的结果”，这种观念不过是已然落空的美好愿望。在各级立法机构中，利用民主权力而非司法机构的法律文化，是现在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一直以来就是如此。■

[【返回目录】](#)

## 许章润：“哪有先生不说话？！”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 FT 中文网]



本文作者许章润教授 图片来源：中评网

身役教书匠，如八十多年前胡适之先生所言，哪能不说话！而说话就得让人听见，才能构成对话与交谈，让我们获得公共存在，保持人性。 —— 许章润

在经管学院为 EMBA 学员上课。他们搜索百度，希望多了解授课教师，阅读与课程相关的教师著述。跟十来年前相比，今天学员年龄多在四十上下，男女搭配，精力充沛，尚存求知问道的热情。据好友郭丹青教授 (Donald Clarke) 相告，时惟 2018 年 7 月 29 日，我在百度上的词条从数十万被删到仅剩十条，算是悉数除祛。迄而至今，三月已过，犹有二三十条，羞羞答答，多为新闻报道，而牵连在下名字而已。如此，自然搜索不到任何信息。

揣摩原因，当是缘于今年七月下旬，我撰写《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为当下计，作千岁忧。情非得已，情见乎辞，而终究仿佛情见势屈。我对此心知肚明，对于可能的横逆也早有心理准备，故而对于删除词条、屏蔽姓名一类的“和风细雨”，根本不曾留意，更不会往心里去。秦制妙法，新贵旧招，虽两千年往矣，前后有别，却了无进步，总不外钳口二字，何足为奇。

经学员提醒，遂查百度，发现凡近年落马的高官伶优，如周永康、薄熙来、鲁炜与“王林大师”等三教九流，均有数万词条。所谓的“四人帮”，万恶的四人帮，更是词连山海，条接云天，多到数不

过来。它们林林总总，虚虚实实，多少给予读者拼联历史真相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关他们的词条内容，从不同视角，讨伐抑或崇仰，展示了酷烈时代的灵魂扭曲和体制罪恶，等于在向亿万读者时时提示历史的吊诡与无情，从而也就是在为避免悲剧重演，于涓滴汇流中积攒抵抗的精神资源。不只是抵抗某一种专断，而是对于一切专断的提防与抵抗。今昔流连之际，孤单的个体理性方始可能串联并合成公共理性，于烛照人性中遵守常识，特别是明了人性的脆弱与幽暗，而护持我们生息其间、须臾不可离易的人世家园。而且，此非仅只惠及汉语读者，而实具普世意义，但首先沾溉汉语世界，自是不言自明，则网开一面，流水不腐，吾族吾民，生机活现也。

其中关于“四人帮”的一个词条，重述当年中共的表述，指斥其犯行“祸国殃民”，而罪恶“罄竹难书”，令我不禁回想起少年时代的黻黼岁月，以及后来审判大戏登场时的万众屏息，悲喜交加，更加珍惜此刻这个不搞“一浪高过一浪”阶级斗争运动的喘息时光。

他们“祸国殃民”，进至于“罄竹难书”，尚有数万词条展示其生平，罗列其行止，甚至刊布其作品。在下一个教书匠，三十多年里，但求温饱，“奋战在教学第一线”，何至于将我从网上抹掉，或者，似乎认为如此这般就能将我从人间蒸发。

唯一的解释是，我这个底层教书匠，不嗜打架，也不会任何一件兵器，竟然比“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还坏。

秘书写稿子，官员念稿子。有一个笑话说的是，讲话稿的页末一句是个疑问句，因排版原因，语助词连同疑问号“么？”印在了下一页。这位官员念完这句，环视台下，少顷，庄重翻页，再补充上语助词，音调铿锵，致使现场效果成了“周永康/吴永康/郑永康/王永康/司马永康不是一个坏人 @ # \$ % &.....么？”转借此例，在下接续而来的造句作业是：“我比‘四人帮’还坏 @ # \$ % &.....么？”

只是值此八面来风时节，欲令天下无声，惟剩诺诺，何其愚妄，何其滑稽。毕竟，身役教书匠，如八十多年前适之先生所言：“哪有先生不说话？！”而说话就得让人听见，才能构成对话与交谈，让我们摆脱孤立的私性状态，获得公共存在，保持人性。进而，我们的公共存在状态，也唯有这种公共存在状态，才赋予我们以自由。职是之故，对于网络上的封杀，对于造成我们无奈只能用百度而无所选择的那个巨灵，岂能不留意？！又岂能不往心里去？！

因而，对于助纣为虐而下手删除、屏蔽信息的，特别是做出类此决策下达指令的，我并无仇恨，只有满腔的同情！再说了，年纪轻轻，身怀长技，为何不另找一个干净营生？

我们同处幽冥之中，不见熹微，唯以同情援手，手牵手，才能穿过这重重关隘而获救。

暮云朝雨，琴剑匆匆，秋意烂漫，千江一瓢，朋友，人间是多么的美好。❧

[【返回目录】](#)

## 盛洪：我与科斯

[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原载《读书》杂志 1996 年第 3 期和第 5 期，原题为“又读科斯”和“我读科斯” ]



本文作者盛洪与科斯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门前

我应科斯教授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邀请，从 1993 年 10 月开始在那里就法和经济学研究项目作了半年的访问学者。芝加哥大学是法和经济学运动的发源地，科斯教授等著名经济学家在这里发动过一场经济学理论革命。如今科斯教授已 84 岁高龄，但鹤发童颜，思维敏捷。他出生于英格兰，尽管移居美国已有数十年，但仍操一口伦敦音，似乎透露出一份做大不列颠文明传人的自豪。然而他又那样简朴和天真。他笑起来像孩子一样。每次讨论问题，他总是到我的办公室来，理由是他的办公室太乱了。确实，他的办公室又小又乱，到处堆满了书，就是没有坐的地方。

我们的讨论是一周一次。这对我是极为难得。起初科斯想以威廉森编的《企业的性质》为主题进行讨论，后来可能是他看我已经熟读了其中的几篇文章，就转而讨论起正统经济学。由此，我们就经济学理论和经济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给我许多启发，现在把它们贡献给读者。

## 一. 新古典经济学是工具

在我作访问学者的第一个学期，恰好贝克尔正在作微观经济学的讲座“价格理论”，科斯建议我去听。他说，“贝克尔讲的是工具，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工具去分析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经济问题。这是我对经济理论的基本态度。”由于我在访问初期时英语还不行，妨碍我们的讨论，科斯就建议我将听课的内容记下来，然后由他评点。我先后写了有大约五、六篇有关的短文，虽说是对贝克尔讲演内容的记录，实际上掺杂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回国前我将这些文章拷贝在几张磁盘上，可惜的是，拿回来以后，磁盘又读不出。记得其中一篇题为“我从贝克尔教授那里学到的经济学”。严格来说，是我自己对微观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本理解。例如，我提到了四个假定前提，四个概念，一个基本方法和两种分析工具等等。四个假定前提是指(1)稀缺性；(2)追求最大化；(3)人的偏好不同；(4)市场制度。四个概念是指(1)最优；(2)均衡；(3)替代；(4)边际。经济学则是一个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方法，微观经济学经常采用的几何工具是无差异曲线分析法和供求曲线分析法。科斯认为稀缺性是一个主观的概念。而对于最大化，他似乎很有异议。他问道，什么是最大化？是效用的最大化吗？效用可度量吗？他说，“我不赞成、或不喜欢用效用这一概念。如何衡量它？”我回答说用“满意”来衡量。他继续问道，“如何区分不同的满意？在我看来人们有时在追求‘效用最小化’。他们毁掉自己，毁掉自己的家人，甚至毁掉自己的国家。如法西斯德国。”对于后两个假定前提，他没有什么异议，只是对“市场体系”加以评说：“市场不必是具体的地点，市场是一套规则、法律。”对于最优概念，他的反应似乎很有制度经济学的味道：“是否有最优？恐怕只有好些。”关于均衡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理论风格：“不存在一般均衡，只有局部均衡。均衡就没有变化了。”我们知道，他的理论风格之一是侧重微观的、个案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假定其它局部不变、或不相关。对于我把经济学归结为成本—收益分析，他好像持很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是指公共工程的某种会计计算。经济学对成本或收益的概念理解并不那样狭隘。对于成本，他与斯蒂格勒的看法一样，即“成本就是机会成本”。“我们只说为了得到(get)什么，我们必须放弃(give up)什么。为了得到一种收益，我们必须放弃另一种。放弃的就是成本。”一些经济学家很爱用无差异曲线来说明问题，另一些则偏爱供求曲线。科斯告诉我，这两种几何方法其实是一种。例如用来描述两种产品组合在效用上的无差异的几何图形，可以假定其中一种产品为货币，就可以导出供求曲线图。也许我孤陋寡闻，总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不过科斯说，尽管这两种几何方法是一致的，他还是偏爱用供求曲线来分析问题。

## 二. 什么是制度？

这一问题有两层含义：(1)制度(institutions)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的定义是什么？(2)制度的现实对应物是什么？先说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言传”的，我从来没有提过，科斯也没有讨论过。但是科斯对制度的理解却可以和他交往中把握的。首先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

具体情况，所以制度也不会相同。”他举例说，交通规则在美国和在阿拉伯就应不同，因为一个用汽车，一个用骆驼。可以这样理解，制度是从一群人、一个社会中生成的。它是利益互相冲突的人及其组织之间妥协的产物。它是内在于人群和社会的。一个在社会中生成的制度，包含了这一社会的环境特征、人的自然禀赋和人与人冲突及其解决的全部信息。进而他强调，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应照搬另一国家或民族的制度。“中国和东欧国家不应复制和再生产美国的制度。”“中国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制度，而不应照搬西方的制度。”这种对制度的看法，我们可以称之为经验主义的制度观。一谈起制度，就应该想到，有一群人，他们之间在互动。另一种制度观则把制度看作是外在的，制度变革就像更换衣服一样。它不考虑制度与遵循制度的人之间的在生成中的内在联系，认为关键问题是选择一个抽象的“好”制度。在它看来，各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可以装在一个叫作“制度集合”的大筐里，改革者可以不断地从里面拿出不同的制度来，一个不行，再换一个。这种制度观导致一种“形似”的制度经济学。这种制度经济学只是在运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诸如“制度”、“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字眼。这不是制度经济学，起码不是科斯认为的制度经济学。

### 三. 产权是结果

我们大多数人从科斯的理论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产权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交易的前提和市场的基础。但是科斯告诉我，产权其实是结果(conclusion)。他说，“在很多人看来，权利是假设前提，在我看来权利是结果。如此安排权利就会获得如此的结果，所以要如此安排权利。”我最初对此极为惊讶。在又一次讨论中我问道，权利或产权是结果吗？科斯回答说，“是的。权利是在经济活动中，在人的互相交往中产生的。由于在经济活动中更有效率，所以一些权利才被肯定。一组权利是社会过程的结果。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权利组合。美国有一部成文宪法，权利都在上面规定好了。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美国政府就拿美国的观念去套中国的民权。”你不赞成美国政府吗？“我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不知道。因为我对中国知道的太少。”难道人的基本自由和缔约权利不是市场制度不争的、天赋的前提吗？他回答说，“第一，由于不同的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适合它们的权利组合也不同；第二，结果状态的权利组合不同于初始状态的权利组合。英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并没有经过投票，也没有规定什么权利。在工业化结束时的人权状况与工业化开始时大不一样。”这种说法使我明白了许多。科斯是在实证的层次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在现实中，如同许多其它制度安排，产权的具体安排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同的国家民族有着不同的条件，因而必然会生成与其它国家民族不同的产权制度。这种解释有助于我们摆脱对产权理论过于简单甚至接近教条的理解。我们说，产权是前提，是在极为抽象的规范的意义上讲的；我们决不能由此忘掉产权制度的形成在现实中是一个过程，并且依赖于具体条件。我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交易先于产权”的命题，是指界定产权的谈判本身就是交易。现在看来，这一说法也许有更多的含义：交易就是界定产权的过程，是交易本身创立了产权。两个利

益互相抗衡的人之间的产权界限，体现在他们的合约上。这种体现有着更完整的、制度化的含义。物理意义上的产权界定是不完整的，有时事实上是被扭曲的。例如，如果粮食只是物理意义上归农民，实际上只能按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卖”给政府，农民的产权实际上是被侵犯了。产权往往是由市场(由许许多多的交易组成)界定的，由市场价格(由许许多多交易之间的竞争而形成的)决定的资产价值，是资产的制度边界。通过交易，产权安排还会发生变化。科斯在另一次讨论中说过，“通过交易的变化，也是产权的变化。”从这一意义上看，产权确是结果。

#### 四. 中国是个谜

有一次，科斯给我拿来一本《科学美国人》，其中一篇文章叫作“伟大的中国井”，讲的是十八世纪或更早的时候中国四川的盐井在钻井技术上的惊人成就。由于四川地处内陆，海盐运到四川非常昂贵，而四川的地下又蕴藏着大量的浆盐，因此钻井取浆盐的事业有利可图。钻井技术随之发展了起来。据此文作者介绍，早在一千多年前，四川人就能够钻一百多米深的井了。他们最为辉煌的成就，是一八三五年钻的“新海”井，深度达一千零一米。而在当时，欧洲人的记录是五百三十五米，是由一个德国工程师在一八四二年创造的。科斯对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他问道，中国过去有那么好的钻井技术，为什么没有用来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不仅是中国的技术，他对整个中国文明抱有崇敬之心。我猜想，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张五常。他对张五常极为称道，称他善于思考。使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些中国人要丢掉过去。如果说，在七、八年前，在他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五十周年的演讲中，中国这一字眼还是一个比喻，现在于他则是一个现实的经济学问题。他说，“我近年来对中国的问题感兴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即中国有着很高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中国曾达到过很高的成就，但为什么近代经济革命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现在英文中的很多科学术语是从阿拉伯中借用过来的。阿拉伯人在科学、艺术等方面都曾有过非常高的成就。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的是西班牙，但工业革命主要是在英国开始的。人们觉得好像工业革命更应该在法国开始。因为法国有更好的知识阶层。区别是法国一直是一个集中管理的国家，到现在也是如此。什么都由巴黎来决定。法国的总统一定是一个巴黎大学的教授。相对来说，英国更分散化一些。”这是一个民族或文明兴衰之谜，尽管有人探索，有解释力的理论并不多。对于中国之谜，科斯教授又有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在文化上的高度成就和中国人的贫穷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主要指的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第二，为什么不少中国人在国内很穷，但出了国，就富裕起来了？不仅是到发达国家，就是到了不太发达的国家，如马来西亚，中国人也是很成功的。“在海外的中国人都很成功，不仅是个人，而且是作为小社会。”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但与事实差距不大。我当时的回答是，制度经济学答案也许是最好的答案，即制度是重要的。但后来看来，答案决不这样简单。中国在前现代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领先，恰恰证明了中国在制度结构上的领先。怎样才能解释中国的贫穷呢？除非我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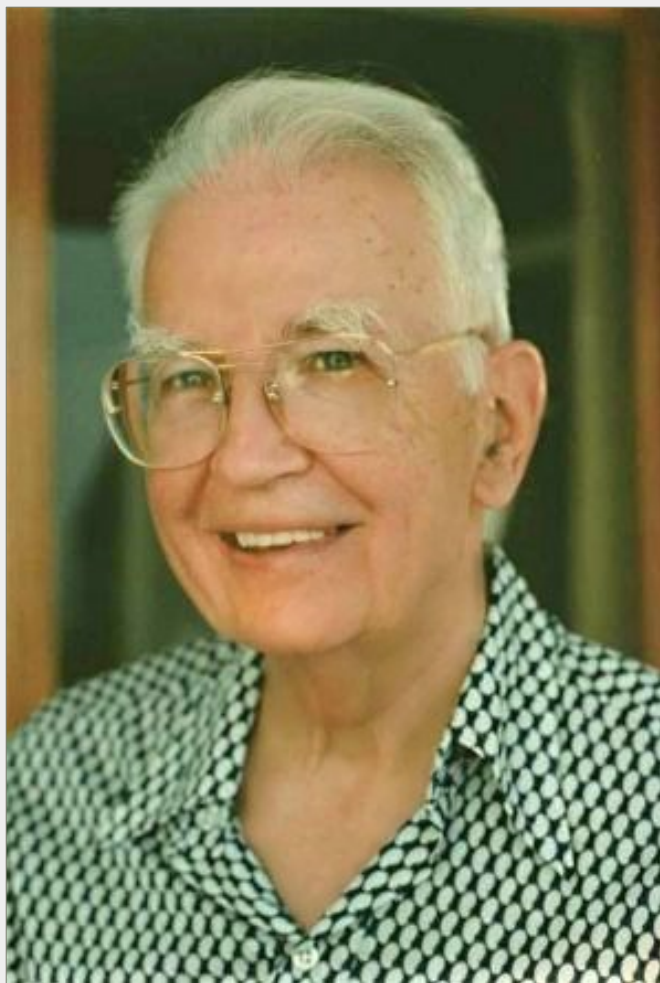
先进的制度会带来负面效果。这不又和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相反了吗？当科斯说“谜”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点。因为六十多年前当科斯在酝酿“企业的性质”时，也是在探究一个“谜”的底：既然市场是最有效的，为什么还要有企业？

## 五. 法与经济学

科斯是法学院的教授，他所开创的理论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在这里被称作“法与经济学”。关于法与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科斯于一九九二年在一篇题为“芝加哥的法与经济学”的演讲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讲述。其中穿插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从这些故事来看，法和经济学的诞生是非常偶然的。最早加盟芝加哥法学院的经济学家教授叫作亨利·西蒙斯。他来到法学院不是因为创立新的理论流派的抱负，而是因为芝大经济系在当时由于某种原因解聘了他。走投无路，由朋友介绍来到了法学院。不想产生了如此奇特的效果，由此为后来遍及美国法学院的法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这使我想到，一个经济学家要真正了解法和经济学，就应到法学院来。科斯说，“一个经济学家在法学院的好处，就是能感受到法律的变化。”这也是我的体会。不仅如此，法学院还能告诉经济学家，这里有完全不同于经济学逻辑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手段；法学教授们对社会问题的非常贴近的关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经济学家的思路。这种风格与美国大学中的经济学的传统大不相同，对理论创新也许有着很大帮助。科斯说，“近年来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大多不是出自经济系，而是出在法学院或商学院。这很说明问题。经济学过于技术化了，过于抽象地讨论问题。而在法学院和商学院，经济学家能够更多地接触实际的、更为生动的问题。”

关于法和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科斯没有和我谈多少。因为实际上在科斯看来，现在的法和经济学是懂得经济学的法学教授(如波斯纳)的事情，已经离开他很远了。他在一九九二年的演讲中说，“我从来没想追随波斯纳。第一是因为他比我走得快；第二是因为他走的方向与我有些不同。”对于法和经济学，他只作过一些零星的评论，并且通常是在我的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法学院选择和公共选择”的论文，其目的是讨论科斯理论和布坎南理论的不同背景、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冲突。在我看来，科斯的理论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后者坚持用一致同意原则作为检验效率的唯一标准，而前者并不认为这一标准是唯一的。法和经济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可以通过理论分析来判断法或制度的效率。后者是市场和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前者则有精英论的味道。但科斯似乎不赞成这样的“批评”。他问道，“什么是精英论？设计一辆汽车是精英论吗？我主张改进法律和法律制度并不是要别人必须接受。”这句话反映了他对制度变迁的看法。尽管他可以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他并不完全赞成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的演进”。他认为“我们现在大多数制度确实是自发演进而来的，但有些不是。有些自发演进的社会并不成功。”我想，关键在于“自发的演进”的定义。广义地看，“自发的演进”并不排除人为的设计，只要设计是竞争性的，或如科斯所说，是“并

不必须让别人接受”。当然，有意识地设计究竟区别于不知不觉地变化，因而科斯的理论多少还带有一些强调精英作用的倾向。



科斯教授

关于他与布坎南的区别，我也曾问过他。他的回答是，“布坎南对政治制度更感兴趣，而我只对经济制度感兴趣。法和经济学有两种含义。一是用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一是考虑法律制度如何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我属于后一种。”另一个区别是，“布坎南的理论实践性很强，而我只是在理论上探讨法律对经济体系的作用。其结果也许对法律有影响，也许没有。懂得这些理论的人也许没有权力，也许权力在握；掌握权力的人也许作些事情，也许什么也不作。”总而言之，他不承认他的理论与布坎南的理论有什么交叉的地方，更没有什么冲突，尽管布坎南曾著文批评过他。

我并不同意他说的和经济学没有实践意义，因为在美国，法院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又是由法官和律师运转的，他们又都是从法学院毕业的。法学院和教授及其理论不能不对法律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但科斯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满意。他认为“法和经济学在某些方面比较深入，在某些方面比较欠缺。至今我们对美国法律体系并不完全清楚，我们尤其在如何降低交易费用上没有作很多事情。”“我的‘社会成本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没有政策结论”，当我问道，不少文章据此得出了政策结论，我记得有一篇论文用科斯定理来为布什总统没有经过国会而向伊拉克开战的作

法辩护，他的回答是，“这些都是 Nonsense”。不过科斯还是承认，法学院在美国的重要性。“在美国，律师和法官和在英国不一样，他们更学术化、经常写文章。英国更侧重辩论技巧。在美国法学院当教授是为了对法律改进更有影响。在美国，法学院比在英国更重要。”

## 六. 没有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也没有完善的人

我们知道，科斯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明确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由于有了这一概念，人们才比较清楚地发现，已往的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着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因此，科斯的理论是建立在改变新古典前提条件的基础上。但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也不是一切顺利。我在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一文中发现，科斯认为，即使交易费用为零，也未必能够达成合约。我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换条件不能互相吻合。”那么，是否有一种情况，买者愿出的最高价低于卖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对，有这种情况。不过他们可以找其他人去谈判。”不仅如此，不能成交还有其它原因。他接着说，“我的理论，或法和经济学主要讨论成组的人的行为。我并不说所有的人会如何如何，而说大多数人会如何如何。说价格便宜人们会买得更多，是指大多数人。有些人就不这样。如我的妹夫就不这样。他总在价格下降时少买。所以我并不说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所有的谈判都能达成合约。”这使我想起他在早些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也没有完善的人。这是经济学家面对的。”关于没有完善的人的说法，使我暗暗吃惊。正统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假定人是完善的，但起码给人一种印象，即不能用人的不完善来解释问题。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定，使我们认为，人的所有要求都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从来不用人的不完善来解释经济效率的低下、或经济制度的失败。人的不完善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没有详细去问，我想不会是指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更有可能是指人性恶的一面。这一面本来已被经济人假定所包含，并且在理想的市场制度条件下，人的自利动机可以被引导到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增益的轨道上。但市场制度并不能应用到人类事物的所有方面，在一个人利益不能用另一个人的利益加以约束的情况下，人的自利动机可能是一股祸水。在一些场合中，人们选择在社会和长期看来是错误的决策，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一决策的后果，而是人们为了眼前的生存和局部的利益而宁愿作这样的选择。“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的心态，不是现有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所能轻易克服的。在人的自利动机不能由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从外部加以约束的情况下，人们必须求助于自律。自律的前提是承认人自己的不完善。这正是基督教文化对人的假定，即所谓人的原罪说。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也恰是一种帮助人们自律的制度安排。在现实中，正是基督教这种自律的制度安排，才使得市场这种他律的制度安排在近代的西方成功。科斯教授是否有着这种基督教背景呢？答案却是否定的。他曾告诉过我，“我不是基督徒，不太懂得宗教。在英国，人们结婚、洗礼进教堂，这大概就是教堂的功能。”然而科斯教授在对人的看法上，也许与基督教暗暗相通。人的不完善，这可能是任何一个对人有着长期观察和思考的人都能得出的结论。

关于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他其实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我不想再讨论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形。我不想在想象的世界中讨论问题。我过去讨论是因为别人要讨论。”这一次，则是由我的话题引起的。我的问题是关于他的诺贝尔演讲。他当时提到，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人们可以通过谈判改变法律条款。他对此解释说，“交易双方可以交换由法律规定的权利，从而可以视为改变法律条款。”这解释了我的疑问，因为在现代，法律多是由公共选择过程制订的，不可能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谈判加以改变。有意思的是，早就有人提出过，在三人或三人以上的世界中，科斯定理不适用(Varouj A.Aivazian and Jeffrey L.Callen, *The Coase Theorem and the Empty Cor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科斯对这一批评作了答辩。使我感兴趣的是，科斯这一答辩文章的结尾，已经表达了他对零交易费用世界的基本态度：“我不想未观察而下结论，尽管对在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中会发生什么的思考会给我们带来有价值的洞见，这些洞见，在我看来，只有作为走向对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的分析时才有价值。我们不想将我们自己投身于对零交易费用世界的细密研究中，那样作就像巫师瞥一眼鹅的内脏就能预测未来一样。”

## 七. 改革：中国与俄国

在中国和俄国发生的改革，是在现代史中的重要制度变迁。科斯作为强调制度因素的经济学家，自然会极为关注。对于中国的改革，他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俄国，他的批评则较多。科斯说，“当我领取诺贝尔奖、并发表演讲后，有人问我有关俄国的问题，我回答说我对俄国的前途很悲观”，是否有一条路比现在的路要好呢？“我看哪条路差不多。俄国人太好斗(animal spirit)了。结果可能是悲剧。”这似乎已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语言了，更多地是个人的直觉。当然，实际上，他对俄国改革的条件和道路是有所批评的。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时间太长，企业家精神和能力在计划经济中是犯罪，所以现在缺乏。”并且也缺少象中国这样的家庭组织。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为俄国设计的改革道路也颇有问题。

“休克疗法打破了旧制度，却没有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制度。”“我不明白为什么先引进定价制度，没有相应的市场组织和法律，怎么能有好的定价制度呢？”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和法规，怎么能简单地照搬呢？”

相反，中国的情况则好得多。首先中国有牢固的家庭。他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结构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发展”。后来在《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采访时，他又进一步阐述说，中国农村的家庭在人民公社解体后，作为替代的制度安排发挥了作用。而在俄国，由于没有类似于中国的家庭，集体农庄解体后，就留下了许多失业的工人。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科斯对中国家庭的称颂，与长期流行的中国的家庭本位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的说法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种说法看来，家庭本位不如个人本位；而科斯似乎是说，个人本位不如家庭本位。

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家庭是人类社会中独特的、基本的、并且是异常成功的制度安排。在美国，

由于近年来街头暴力不断升级，人们开始怀疑极端的和绝对的个人本位主义，美国总统从布什到克林顿，都在号召回到家庭。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科斯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这些人对国外的市场制度非常了解，又同国内人民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所以非常容易将国外成熟的市场制度引入到中国。在接受《经济学消息报》采访时，他又提到第三个因素，即中国政府高层真心改革，第四个因素，即改革使大多数人获益。

对于中国的改革，科斯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在我到芝大之初，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商学院的米勒教授刚从中国归来，科斯最爱引用米勒教授的话就是，“中国不缺经济学，缺的是法律。”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权利和义务还没有由法律明确规定。许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这将导致交易费用的高昂和经济效率的低下。第二层是，中国人善于用非法律的传统方式解决纠纷，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能多少有点不适用。因为纠纷的技术复杂性在增长。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或政府制度)是互补的，“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效地交换。市场不能没有法律。”最后，科斯对中国的建议是：“共产党加产权”。由于太简单了，这句话并不太好理解。共产党，我想是指稳定的政治局面；产权就不用解释了。我想，不言而喻的是，产权是可交易的。

## 八. 制度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自己

在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大师身边，我自然要请教一些重要概念的定义问题。他的回答是“科斯风格”的：关于制度的定义，“这件事留给别人去做。如诺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是没给过什么定义。我所说的制度无非是指法律、市场和企业等等。”但诺斯区分了制度与组织，我插了一句，“这没关系。人和人的定义总是不一样的。只要我说的概念别人能理解就行。”关于交易的概念，我又讨教了一下。因为我注意到，科斯在多数场合是指较狭义的市场交换，而我很喜欢康芒斯的广义的交易定义，即泛指人与人的交往。他的看法仍然是，“人们有不同的理解，这没关系。有一次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座谈会，一些人说交易费用不能测量等等。如果没有困难就不需要我们了。有困难才有挑战意味。有一本书名叫《合约经济学》(Contract Economics)对一些概念下了定义。有些我并不同意。但没有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分歧会消除。”科斯这段话虽然没有给出定义，却给出了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对自己在理论发展中的位置。在制度经济学看来，不同观点或理论的并存，它们之间的分歧与争论，恰恰构成了理论发展的制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在对自己的理论充分自信的前提下，对不同于自己的观点或理论抱有相当宽容的态度，对理论争论本身保持着很高的敬意。因为他知道，观点或理论之间的竞争作为一种制度，会产生任何一个理论家所想象不到后果。对于理论发展，它会起到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比拟的重大推进作用。

我曾把我的博士论文《分工与交易》送给科斯教授看，他对这本书还是相当肯定。他对我说，“你

应该继续你对中国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变化的研究。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太多的事。只有对少数题目持之以恒，才会有所成就。许多事要靠别人去做。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做完。”当他看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的计划后，很感兴趣，但提出批评说，这个计划太野心勃勃了。“现在只能是一个开端。四个月想完成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四年，也许四十年。”看来，对于理论的抱负和能力，科斯都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现代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重要的，信奉这一理论的人必定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一个个人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位置。制度是人与人互动的结果，它具有超出个人理性的力量。

## 九. 学习真实的市场

在我快要离开芝加哥法学院的时候，科斯带我访问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这是一个历史悠久、非常著名的交易所。它曾以农产品期货为主，七十年代以后，又成为美国新的金融中心。到现在，对利率期货和国库券期货的交易额已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农产品期货。由于它的名气，参观者络绎不绝，所以它设有比较完善的访问者中心。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相仿佛，参观者可以从一个装有大玻璃的走廊看到全部交易的情景。开盘的时间一到，交易大厅立刻沸腾起来。人们作着手势、高声喊叫，寻找着交易伙伴并讨价还价。使人感到他们是外星来的人，通行着另外一种规则。当然，我知道，这其实就是教科书中所说的“交易”。如果不到这里来，“交易”只意味着一条供给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的交叉。我明白了科斯的用意。他带我到这里来是颇有点象征意义。当我们参观完，到一家餐馆吃午餐时，科斯对我说，“我让你参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目的是想告诉你，一个经济学家应该知道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这样。他们研究的我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他们只是在黑板上画道道，并不知道这些曲线实际代表什么。我所考虑的，是这些曲线背后是什么，人们实际上是怎样买、怎样卖的，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供给和需求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和组织才能保证进行这样的交易，制度的变化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如果我们想知道，在科斯的理论成功的背后，有一种什么样的治学风格和哲学精神，上面的话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他经常说，“我的特长是思考具体细节。很多经济学家只是在那里划曲线，我则在想这些曲线在现实中是否存在，是否行得通。”“我要考虑曲线后面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怎样互相影响，有什么样的规范，等等。”我们曾一起谈到哈耶克。他评论说，“我的风格与哈耶克相反。他是先有些原则，然后再分析具体事实；我是从具体事实分析开始，然后再总结出一些原则。”如果我们注意到，哈耶克来自奥地利，而他来自英格兰，这种风格上的区别就很顺理成章。尽管哈耶克强调个人的、特质的知识和信息，德国古典哲学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而在科斯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前者更关注终极的问题，更注重理论的体系性，其风格是演绎的和抽象的；后者更关注现实的问题，侧重于对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其风格是归纳的和注重观察的。不同

的风格本无优劣之分。但自从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经济理论界以来，经济学为了追求理论的完美性而牺牲了过多的现实感；尽管大师们在创建理论架构的时候已经明确指出了理论假设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的学生们总不免将理论假设当作现实，对经济问题持一种“新古典主义”的傲慢态度。对于经济理论界，在某种意义上说，科斯的风格同他的理论创新一样重要。从现实问题出发，注重实证，注重观察和注重个案研究，对于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经济学界来说，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风。后来科斯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从来没有上过经济系”。



坚守着这样的风格，科斯一直强调，在研究问题时，首先要弄明白实际发生了什么。在芝加哥的那家餐馆中，科斯继续对我说，“我希望你回到中国后，投身于对中国具体的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我对中国的制度变迁很感兴趣。但我自己不能做这件事。我希望你能做。”当我们在芝加哥街头分手的时候，他提高了声音对我说，“要懂得真实的市场。” ■■

[【返回目录】](#)

## 梁河东：继朱铁志后还会有高知识分子自杀

[ 本文转载自 2016-06-29 末世木鱼的新浪博客。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前天早上，一个朋友发了一条信息：惊闻老友铁志不幸去世，甚感震惊...

我点开了链接，浏览了一下，一种莫名的感觉升起：没有悲悯，没有感想，有的只是孤绝的微笑。



**朱铁志** [1960—2016.6.25]

著名杂文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生前任《求是》杂志副总编、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2016年6月25日凌晨1时许在供职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

年初，上海华东师大学者江绪林自杀，我写了一点感想以纪念，其中说到：江绪林先生走了，林嘉文走了，他们不是领队，也不是收尾，他们只是一个长长队伍中普通的两个队员。以后还有学界文化界的精英，如此悲伤地画上休止符。所以，在此我深深地认为，还会有许多的中华知识分子选择这样的不归路。

朱铁志死了，因为他的屁股（职务《求是》副总编辑）与角色，所以让人感到惊诧；因为他的才华与名气，所以让人感到惋惜，但对于众多的文化人自杀，他仅是众多人中的一员。

现在，我们要问问朱铁志为什么会死？解读的说法很多，忧郁症似乎是最好的解释，但还有另外的理由。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基因里似乎总有一种悲绝，这种悲绝一直浸润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与心灵，让他们难以自拔。

最为出名的自杀者是战国末期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爱国上，他是一个领袖；在自杀上，他也是一个领袖。屈原已经预测到楚国终会被秦国所灭，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也不愿意一天天地看着楚国灭亡，于是就跳进汨罗江。他死了，他所在的朝代也死了，他心中的那个终极理想一样灭亡了。

其后，田横为了他的齐国，也率众自杀。到了南宋，也有一些文化人在崖山跳进大海。当大清朝土崩瓦解之时，也有一些文化人自杀，其中一个就是梁漱冥的父亲。用梁漱冥的话讲，他的父亲“殉清”了。



青年学者江绪林遗照 [1976—2016.2.19]

北京大学政治哲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青年教师，

2016年2月19日晚留下遗书自缢身亡，年仅40岁；

之前他因不迎合当前的意识形态，在日渐严苛的环境下长期受到压制；

学者于建嵘在微信圈写到：“政治关系到我们的每一个人，但我们不能由于对政治的失望而放弃努力，更不能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从这一点分析，自杀或许是一种传统。当一个王朝结束或时代大变革时，文化人自杀就显得较多一些。他们死的意义有几种，或是表达一种抗争，或是表达一种不满，或是表示一种纪念，或是表明一种心志，或是表明一种气节。

通观世界，文化人自杀的现象是普遍在的。著就《人间词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27年的6月，写了下“五十年，只欠一死”后，到圆明园的昆明湖自沉；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海明威，扣动他心爱的猎枪，枪响人终；日本文学巨匠川端康成73岁时，在工作室自杀；大陆作家老舍与徐迟、台湾作家三毛与人大学者余虹都选择了自杀……这些或有成就或名气的文化人，在某些时候都选择了不归路。

“人生本是死路一条”，可是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走向那个不可知的世界。

理性分析，自杀的文化人毕竟是少的。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内心的痛苦与焦灼，非得用自杀来解决不可。在此，我们无意指责什么，只能向他们献上敬意与尊重，愿他们解脱。

我的心理学导师曾告诉我一个研究结果：中国人的自杀与外国人的自杀最主要有两个区别：1、高知相对多，女性相对多；2、自杀率成上升趋势。

“好死不如赖活着”也是我们的传统，但总有一些人会选择“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中那个更容易的——自杀。

现在，杂文家朱铁志自杀了，他的死或许没有江绪林震撼人心，但也在文化界引起了一阵子骚动。一阵子骚动之后，文化界与知识界又趋于死水般的平静。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许多文化人自杀，重复与演绎着这样的故事与现实。 ■■

[【返回目录】](#)

## 佩戴徽章之人：西西弗斯的神话 | 对江绪林自杀事件的一些感触

[ 本文首发于 2017-04-26 佩戴徽章之人的微博，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意图是非常隐蔽的东西，除了大概估计，别人是无法猜到的，甚至连其本人也觉察不出来。我们有多少次误解了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真相理由啊！我们经常用丰富的激情和崇高的理由来解释我们受庸俗感情或盲目守旧的影响。 —— 涂尔干《自杀论》

2016年2月19日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江绪林在其办公室自缢身亡。我对此事有些感触，适逢友人邀请，遂作此文。



**埃米尔·迪尔凯姆** [Émile Durkheim 1858.4.15—1917.11.15] 又译涂尔干  
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年鉴》创刊人，  
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在古典社会学家中，他是法律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自杀论》中，  
认为自杀是一种社会常态，自杀是社会影响个人，不应以个人心理探讨

首先我想说一点令我惊讶的事，在网上搜集有关江绪林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许多对于江绪林去世的评论真是恶意满满，其间充斥着对已故教师江绪林的人身攻击和肆无忌惮的随意批评。而且这种评论

还不少。我觉得这些人欠缺对死者的基本尊重，更不要谈什么同情。这种对自杀者的攻击让我想到文革时期——

60年代中国人其实并没有自杀的权利，不管他是不是党员，一旦自杀必称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现在人们至少不会这样简单的下批判，还有更复杂的感受。——许子东《中国社会的三种自杀》

确实我不知道这些攻击江绪林的写手是否只是以攻击一个不能说话的死者为其精神快感，否则即使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我也想象不出他们用其文章攻击和其无怨无悔江绪林的行为会为他们带来什么现实的利益。还好时代是进步的，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表达了对江绪林的追思和缅怀以及他们的思考，跟文革时期比这显然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吧，虽然群鸦依旧在乱吠，装睡的人也依旧叫不醒。



**江绪林** [1976—2016.2.19]

生前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西方政治思想史，

江绪林自杀前留下的最后一段话：“形势还会坏下去，不知要坏到怎样的地步，

但是没有料到，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只是做一个人也如此艰难”；他的学生评价他：

“江老师有着不同寻常的诚实：不会对自己了解不深的领域置喙，……在这个扭曲的评价体系下，

他对于那些头衔始终保持着一份虔信，因为他那里教育是神圣的。”

另外我看到许多媒体都声称江绪林患有抑郁症，我仔细阅读《刘擎：追忆与启迪——江绪林博士告别仪式上的悼词》和一些江绪林身边人写的追念其文章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此引用一段该文

作为佐证：

那么，绪林的孤独和焦虑究竟是什么？以至于他最终走得如此决绝？是‘抑郁症’吗？绪林长达多年反复出现的情绪低落、失眠和轻生念头，似乎符合典型的临床症候。可是我一直在回避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太轻巧了，太方便地打发了一切，它抹去了绪林复杂而又深不可测的心灵孤独，也免除了我们所有的负担和愧疚。但今天，我愿意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在和绪林的交谈中，只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暗示他应该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但这个令人不安的话题断断续续地难以持续，随后就转变为哲学化的谈论。心理咨询行业是现代性的发明，是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的危机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心理问题，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对深刻的人性问题。我和他都熟知这种观点，这背后有大思想家的背书，我们甚至都不用提海德格尔或者福柯的名字。

通过该文我们应发现江绪林虽然有孤独焦虑的情绪，但他并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那显然他应该也没有看过能确诊和治疗抑郁症的医生，那怎么媒体就能确认他有抑郁症呢？还是媒体想通过抑郁症来掩盖和推脱以至于不让读者知晓死亡真相呢？把江绪林的自杀说成由于抑郁症导致是一种没有证据的误读。在我看来这与那些攻击江绪林的文章一样，也是一种对死者的不敬。但是这些无良媒体的错误推断有一点却比那些恶语相向的写手更为可恶，那就是他们假装中立的态度会让更多不知晓情况的中立读者相信他们未获证实的信息，更何况是死者死因这么严肃的事上。所以对于不能完全确定的事我们还是保持怀疑，谨慎求证为好，切忌把自己的主观臆断当作事实。

结合其微博上的最后遗言，我们似乎能得出一个结论：江绪林的自杀是其理性（智力操作上的理性）选择，虽然这个理性选择也是在他常有的低落情绪中做出的。

还是来说说我对江绪林的肤浅认知和看法吧，我认为江绪林是一个有良心的理性的孤独学者。

先说有良心这一点，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新中国。另一件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江绪林的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显然要属他在北大读研时纪念某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的英勇行为。在此引用郭玉闪的《自由是封锁不住的》一文片段以观其当年之壮行：

那是2000年5月底，已经逼近（那个日期）。估计当局也有所顾忌，害怕事态不可控。但紧接着，邱庆枫事件没过去多久，一个北大学生江绪林突然贴出海报，宣布他要纪念（那个日期），要在六月三日晚上8点在三角地点燃起“第十一根蜡烛”。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急急忙忙奔赴三角地守候江绪林点燃蜡烛的那一刻，三角地边广场显然有不少怀有相同心思的同学；结果候了三个小时，只见三角地人来人往，一切正常；后来方得知他与另外一个同学刚到三角地就被控制了。第二年，江绪林又在三角地贴出海报，以基督徒的身份要为（那个日期）做和解的努力，他宣布要在六\*三当晚到北大三教演讲。当晚，我们早早的到教室，守在三教门口。然后看见江绪林远远的走过来，突然一辆面包车在他身边急停车，下来几条大汉，一把拽住他，七手八脚塞进面包车后扬长而去，我们完全来不及反应，只能面面相觑的留在原地，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切发生。

江绪林在 2000 年 9 月份时还做了一个很猛的行动，他有一天宣布要在北大成立自治学生会，然后编了一份意见调查表，挨个宿舍让同学们表态。他的这次行动是我和他交往的开始，我在网吧里很激动的跟他写信，与他探讨行动的策略。来年当他在（那个日期）演讲前夕被带走后，我还在当晚深夜找到他宿舍，与刚刚被放出来的他一起安坐在宿舍阳台讨论基督教信仰。



**林嘉文** [1998.—2016.2.23]

被誉为史学天才的西安高中学生，却在 2016 年的 2 月 23 日夜跳楼自杀，  
与**江绪林**自杀相隔仅四天，  
林嘉文留下一篇长遗书，其中也提到了江绪林的自杀；  
“周围的环境决定了人很难有个体面的活法，连小小的中学里也处处是浓厚的政治气息”，  
林嘉文遗书中也留下这段话

看到他被几条大汉强行拽进面包车那段，我突然想起江绪林对自己的评价：

我关心政治，但并不热衷政治。或许是因为我孱弱的体质和沉静内省的人格类型的缘故。——江绪林：《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

一个身体孱弱而人格内省的人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公然纪念（那个日期），我想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多的则是良心和理性，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良心和对政治的理性思考。

（那个日期）之后中国人对此事件的认知大约分成两派，一派是“无知派”，这些人也许在当时年龄尚小，也许在当时尚未出生，再加上我国高强度的文\*化\*管\*制，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取到的（那个日期）信息少之又少，于是造成了许多人不知道或者只是听说过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那个日期）事件，再加上那些本来就不关注历史和政治自身文化程度也不高的盲流一起构成了“无知派”，这一派对（那个日期）的态度就是一句话“我不知道”。显然还有一派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我将这一派称之为“麻木派”，该派与无知派相对，是由一些年老的，经历过（那个日期）的，或者说至少在事件发生时对该事件较为了解的一些人，当然之后的年轻人如果通过各种渠道对此事有所了解却在精神上保持麻木当然

也属于这一派。麻木派的人也许最初不是“麻木派”，他们最初也许跟（那个日期）事件中的青年一样，怀有一腔热血，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对国家和民族有一份理想和担当。但是随着运\*动的被镇\*压和时间的流逝，他们变了，不仅行动在暴\*力\*强\*权\*之下被迫屈服（这当然也无可指责）而且精神上选择麻木，这才是最可悲的，他们开始在心里不屑那些死去的学生，鄙视他们的“不成熟”认为他们是自讨苦吃，庆幸自己当年没跟“愚蠢”的他们一样白白送死，“麻木派”虽然他们并没有完全忘记此事，但是随着他们选择精神上的麻木，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理想和担当可言了。

而江绪林与这两派人不同，他是一个有良心的理性学者。他的良心不仅体现在精神上而且通过他的纪念行为得到落实。这种良心想必有一部分是天生的，虽然我不认同传统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但是我想一个稍有人道主义的人也会因为无辜的年轻人被杀死而感到悲鸣吧，生命之花尚未绽放就残忍凋谢，这种惨剧也会让即使跟此事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感到悲伤吧。江绪林纪念（那个日期）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人道主义良知，一个作为人都该有的良知。而他纪念此事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后天得来的理性与知识，作为一名北大研究生，作为一名熟读霍布斯和罗尔斯等人著作的政治哲学学者，他显然对不同政体有其基本的价值判断，追求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显然没有错，因为民主和自由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到现在为止的普世价值，20世纪打着国家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号的希特勒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以及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血淋淋的事实都已经告诉我们毒\*菜与砖\*制以及其带来的包\*政会对人类带来多么大的灾害。（那个日期）运动作为一项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运动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当然期间学生的手段和方式可能值得商榷，但不论如何我想那些学生也不至于被军队杀死，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野蛮残忍的原始行为。江绪林作为学者对民主自由的理性认可想必与他的良心一样是他纪念（那个日期）的动力。

另外我想强调一点江绪林是极为冷静和客观之人，冷静中带有一丝绝望。在他的《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一文中他写道：

完全可以能够不乏快乐地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不义和迫害的国度，并不需要委身正义：保持理性和清醒的认知，偶尔也帮帮手做点正义的事就好了。

还有更积极的理由让我或我们在不义的国度里处之泰然。实现了自由民主又如何？能消除我们人生的苦难、愚昧和平庸，能满足我们的渴望和幸福么？我不是要否定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而是让自己淡定：不能把人生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政治上，尤其是当下的政治变迁上。苏东剧变后，自由和民主胜利之日到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些民主活动家所最珍视的理想变得毫不相干之日。东欧的 Michnik 在一九九一年说：“像我这样的人参与政治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今天的政治已经标准化了，对于那些不把政治看作游戏而当作捍卫基本价值的方式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

这是江绪林在 2011 年年末的文章，距离他在北大纪念（那个日期）大约已经过去了十年，这十年我想他过得并不轻松，虽然他博士毕业，但是他事业上不是什么正教授或者系主任，感情上没有红

袖添香依旧独身一人。自身的情况和国家的情况伴随年龄的增长我想他是更为绝望了。他并没有否定正义，只是对自己的行为和自身行为所能带来的改变产生了强烈怀疑。这也难免，面对理想和现实中的差距我们往往都向现实屈服。正如江绪林自己讲的“完全可以能够不乏快乐地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不义和迫害的国度”。但是他五年后的自杀否定了他自己的理论，而这也是由于其保持了理性和清醒的认知。他真是一个毫不妥协的人，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物质生活上也是如此。显然在充满政治不义和迫害的国家他不能真正的快乐：

林达说：不介入现实政治的人，在某种情况下都会无法置身事外。这只是人之常情。我努力地避开政治，只是有时候政治犹如癫痫一样偶尔或发作，让人无法置身事外。

显然他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一点，有谁又能从社会中彻底逃避呢？不服从的美国公民梭罗不也因为没有交税而进了监狱了么？只有妥协和不妥协罢了。只是我们都不清楚为什么他在写完这篇文章的四年多后彻底选择离开。只是在他留下的只言片语中猜猜他的心思罢了。

还应该关注一下江绪林政治哲学学者的身份，他在豆瓣上对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书评蛮有意思：

要看介绍才能明白很多环节——但也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充裕时间来阅读它了，只能快进所致。班吉的白痴视角是读得比较仔细一点的.....承载的南方衰落的意义之情节我都本来没读懂：继承了《尤利西斯》的意识流传统，常常无标点符号，场景切换。我想，我是没时间来重读这本书的。

看完这段我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江绪林会没有时间重读《喧哗与骚动》？虽然他认为此书可能有些复杂。直到我仔细观察他的豆瓣主页才明白，江绪林不是没有时间读书，只是没有时间读文学类的书罢了。在2016年2月16日他读了《当代政治哲学》，我想这可能是他读的最后一本书了，再往前在1月11日他读了《认真对待权利》。我想他确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哲学学者，政治哲学对于他来说也许相当于逻辑哲学对于维特根斯坦，都是一种天赋和责任。但是政治哲学如果只停留在理论而不能对现实有所改变的话这显然会对其内心产生一种虚无的脱节感，这种虚无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逐渐冲刷掉了他求知的热情和喜悦，反而带来了对自身和学术的怀疑。政治哲学也许是少数能暂时令他灵魂有所宽慰的东西了，可惜也最终没有留住他。我国名义上的学者人数众多，但真正能名副其实的又有多少呢？江绪林的离去，对中国学术界也是一件憾事。

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他的孤独，有位诗人说过没有人会因为纯精神原因自杀，他的孤独，他的独居。由这种孤独所带来的阴郁情绪也是他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吧。说起江绪林孤独的一生就不得不提一部小说《Jude the Obscure》（中译为《无名的裘德》）这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名著。江绪林的微博简介便是此书书名，显然江绪林是以该书的主人公裘德作为自比。对比他们两人不同但同为悲剧的人生我发现了一些端倪。先引用一段豆瓣上对该书的介绍——

“《裘德》是部成长小说，也是不折不扣的幻灭文学。农民的儿子自小在家乡的山顶上遥望牛津剑

桥的天际线，长大了梦想去那里做绅士学者，以为只要利用做石匠的业余学好拉丁文，啃破经书就能加封进爵，晋身高雅社会。他的梦想完全是精神性的，很少世俗功利的成分，因此也敲不开世俗的大门。他的悲剧在于他向来只用一只眼睛看世界，一根筋地做事，对通向目标的现实途径完全不得要领，却终身不改其信念”。

这与江绪林是何其的相似！怪不得江绪林会用该书书名作为自己的简介。但是有一点江绪林却更加幻灭，裘德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最终也没能进入他理想的大学，相比之下江绪林虽然双亲早逝但在他姐姐的抚养之下一路进读名校最终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得到了令人艳羡的学历，在学术的路上也走了很远。但是他却发现他和没能进入名校的裘德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敲不开世俗的大门。江绪林本来早都可以评为副教授但因种种原因他选择放弃。在江绪林离开那天 2016 年 2 月 19 日中午，江绪林发了一条微博——

“在宜家订了一个小衣柜，华师大教师招待所的管理人员却不允许我搬进宿舍。迄今为止，招待所每年都试图驱逐我一次，当然有充足的理由，那就是学校规定。”

这显然令人有些心酸，一个已经 40 岁进入不惑之年的独身男人，只能住在招待所还要面对招待所管理人员的驱逐，这样的生活，我想江绪林可能已经受够了。再回到《裘德》这本书上，主人公裘德的爱情悲剧也是本书的核心和高潮。

“他年轻时候因为情欲的冲动结了婚，老婆逃去澳大利亚，留给他一个老成阴郁的孩子，绰号叫‘时间老人’。表妹苏离开丈夫和他一起生活，他们颠沛流离，没有片刻闲暇地劳作，生了三个孩子，最后全被‘时间老人’勒死。因为他和苏的结合是被上帝诅咒的，所以他们在梦想折堕之后连普通人的幸福都无法得到。他死的时候瘦得变了形，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江绪林虽然没有裘德般的爱情悲剧，但是他的状态就像曹雪芹说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他时常会一个人去只有一个人的食堂吃饭，只点两个菜，肉菜是他最喜欢的油焖虾，素材一般就是一些青菜，偶尔会有野猫来骚扰在独自吃饭的他，他也会善良的把自己最喜欢吃的油焖虾喂给野猫，可是这样总是会引来更多野猫，这有些令他哭笑不得。他称他自己为“孤魂野鬼”由此观之几乎没有亲情也没有爱情始终独身的他确实好似人间的“孤魂野鬼”。我不清楚江绪林为什么没有结婚，但我想熟读《裘德》的他断然是不会因为情欲和性欲的冲动像裘德一样勉强结婚，虽然江绪林只是一名不富裕的大学教师，但我想他如果想勉强结婚的话，找一位各方面都不如她的女子想必也不是件难事。这种与爱情毫无关系的婚姻我们还见得少么？从老一辈的包办婚姻到古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爱情又在何处呢？面对的选择无非是年龄大了假装正常人而勉强结婚，或者像江绪林一样宁缺毋滥保持独身。

熟知哲学的他显然对独身并不陌生，与他一样选择独身的哲人并不少，像他所熟悉的泰勒斯、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普拉提诺、奥古斯丁、帕斯卡尔、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斯宾诺

莎、休谟、莱布尼兹、康德、爱默生、叔本华、斯宾塞、维特根斯坦。但是江绪林的独身似乎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谢青衣：熟悉的陌生人——追忆江绪林老师》一文中提到独身的江绪林其实对女孩还是有所渴望的，这也许印证了叔本华在《作为意识与表象的世界》中提到的“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所以也就是出于缺乏，所以也就是出于痛苦”。

江绪林与叔本华不同，叔本华从小因为他母亲的原因，非常厌恶女性，所以叔本华的独身也算情有可原，但江绪林显然不同于此，不可满足的愿望也许增加了他的痛苦。另外他对学术，也就是他热衷的政治哲学的怀疑和由此带来的虚无感也让他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完全将自己的灵魂沉浸在哲学世界的海洋从而获得安息。由此自然他会分心于已经让他很不好受的世俗事务和不可满足的愿望，这些事也反向影响到了他的精神生活，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他不可挽回的离去。

最后我想用鲁迅先生的话为本文作结：

“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之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藐视的那么轻而易举。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谨以此文悼念江绪林先生。 🍷

2016.3.25

[【返回目录】](#)

## 吴敬琏：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中实用主义色彩是一把双刃剑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本文转载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布克笔记]

11 月 1 日，吴敬琏新书《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召开新书发布会。吴敬琏发表了对市场经济的看法。



吴敬琏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新书发布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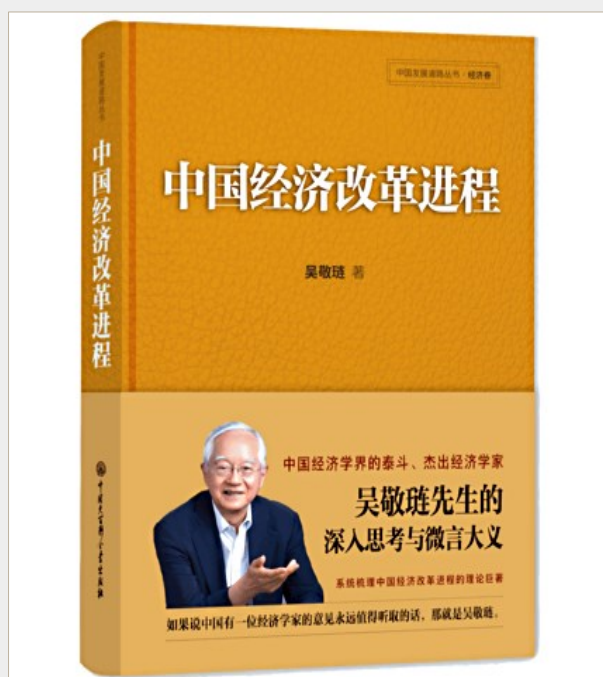
### 以下为吴敬琏为本书写的序言全文：

从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 40 年的路程。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能够在 2010 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书力图对改革开放以来波涛起伏的历史进程作一简要的述评。

在我看来，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虽然还有不少限制，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销售定价行为，还是个人对劳动的提供以及对商品服务的消费选择，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人们有了当初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权。这种建立市场基础之上的自由选择权的扩大，为劳动、资本与技术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效组合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以归结为市场在地域与范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然而，

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市场的出现及其扩展并非是一帆风顺地直线进行的过程。那种将中国改革开放看成是基于帕累托优化的经济理性而做出的政策选择的看法，充其量是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一个过度简略的描述。它没有解释，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沉重历史包袱下小心翼翼地重启市场；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反复，以及改革开放自身不时面临停滞甚至倒退风险。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吴敬琏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8 年 9 月出版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传统的工业化路线已经破产、社会濒于溃败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模式的一种替代选择，迫不得已地提出和实施的。其早期强烈的试探和摸索性质，使得市场首先在那些国家控制不那么严密的领域（如农业或城镇一般服务业）或者相对隔离的特定区域（如沿海经济特区）最先被引入。而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部门，其早期改革思路则深受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

人们寄望于在保持苏联式社会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不变的条件下通过部分引入市场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其结果则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失控和国家加强对企业管控之间摇摆。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早期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市场化目标，而是通过一些混杂着实用主义色彩的变通性的经济措施，试图摆脱僵化的命令经济以及“强势国家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困境。

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中实用主义色彩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和长期绩效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中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绕过障碍，走出了一条以“增量改革”为表征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加强了向市场化、法制化纵深发展

的要求。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命令经济弊病根源的彻底反思和广泛共识，一种脱胎于命令经济思维、强调国家对经济实现高强度控制的统制经济模式在理论层面获得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并往往利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遭遇的暂时性困难或出现的问题，如社会贫富分化和腐败现象，使国家权力对企业和市场的管控在实践层面不时过度扩张，给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带来了巨大阻力。尤其是在 21 世纪初期，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不仅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改革上停滞不前，而且在一些工业企业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情况。

然而正如古话所说，“福兮祸所倚”。改革停滞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推动大众形成了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的共识，促使 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接着，2013 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路线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但确定在经济领域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把改革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样，就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清楚地表明，每当市场经济取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主导思想、放手更多地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比较好，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创新和创业就会蓬勃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无论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财税、金融和外贸领域的整体改革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上的明显成效，以及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通过加速融入全球经济而获得的巨大市场和制度红利，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反，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到统制经济思维的干扰时，根植于市场基础之上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往往出现收缩，国有企业改革则陷入停顿，宏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出现恶化迹象。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于更多的国家干预。

沿着以上的基本脉络，本书从中国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从中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

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回归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

途而废的风险。

本书的结构如下。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从中国改革开放前夕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理论知识准备两方面，讨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性和早期路径选择上的历史局限性。第三章到第五章沿着时间和经济逻辑顺序，分别介绍了从早期“增量改革”模式，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对改革目标的探索，再到 90 年代经济改革整体推进方针的决策背景以及相关政策对非国有经济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聚焦于对外开放和对内消除所有制壁垒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推动力。这些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包括加入 WTO，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日益融合的国内外统一市场，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创造了条件。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相对低下仍然是一个困扰着决策者的重大问题，表现为国有企业的高杠杆和低效益，以及普遍存在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式增长模式。

第八章到第十章分别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思路中的统制经济倾向、因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的过度投资倾向，以及由此最终合力导致的宏观经济脆弱性等方面，揭示了中国经济中依然存在的体制缺陷和重大风险。

第十一章则进一步分析了上述经济制度的缺陷和扭曲造成中国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及其社会后果。腐败行为的蔓延如果成为社会癌症，其最大的危害在于耗散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所亟需的公众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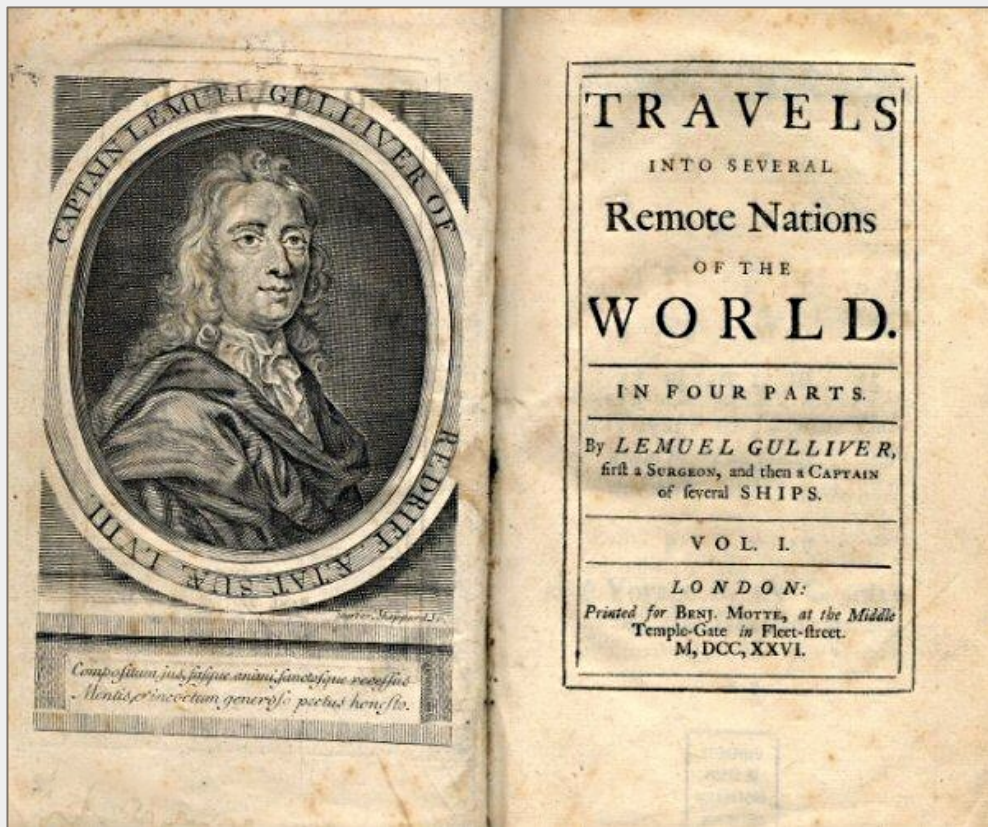
本书最后一章着重讨论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举措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各种阻力和障碍依然不可忽视，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已有改革规划，是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

[【返回目录】](#)

## 贺卫方：《格列佛游记》里的党争

[贺卫方 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转载自著作《四手联弹》，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格列佛游记》又名《在世界几个边远国家的旅行》，表面看来似乎是一部少儿读物。作者构思奇特，作品色彩斑斓。孩子们喜欢，成年人也喜欢。主人公格列佛向读者讲述了在四次航海中的经历，而每次都要碰到极其独特的情况。全书分四卷。第一卷，他到了小人国；第二卷，他遭遇大人国；第三卷，他在飞岛国游历；第四卷，他到了慧骃国。情节自然是虚构的，但在虚构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现实社会的明显印迹。



1726 年小说《格列佛游记》第一版扉页

让我颇感兴趣并产生联想的，是作者斯威夫特所描述的小人国里政党纷争，以及该国与另一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位卓越的讽刺作家展现了他的无与伦比的想像力和冷嘲热讽的功力。例如，书中说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起因，是吃煮熟的鸡蛋究竟应该从哪一头打破。在一个叫做利立普特的小人国里，两党激烈的争议居然来自对于鞋跟高度的选择。站在格列佛的手掌上，内务大臣描述了他的国家政党斗争的新动态：七十多个月来，国内两个政党一直相互争斗。一个党叫特雷姆克森，另一个党叫斯莱姆克森。区别就在于，一个党的鞋跟高，一个党的鞋跟低。事实上，据说高跟党更合古法，而国王却

决意一切政府管理部门只起用低跟党人。你不可能不觉察，国王的鞋跟就特别来得低，至少比朝廷中的其他官员低一都尔[约合十四分之一英寸]。这两个政党的积怨非常深，他们从来不在一起吃喝谈话。我们估算，特雷姆克森即高跟党在人数上胜过我们，可政权在我们一边。我们担心的是，国王陛下的继承人王子殿下有点儿倾向高跟党，至少我们发现他的鞋跟一个高一个低，所以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白马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页28]



小说《格列佛游记》原版插图



乔纳森·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英国作家、政论家、讽刺文学大师，代表作之一《格列佛游记》

以鞋跟高低区分两党，实在是奇妙之想。它让孩子们看得兴致勃勃，而大人们则明白所谓的高跟鞋是暗指辉格党，低跟鞋代表的是托利党。不过，我以为这种情节的设置也许还能反映折出斯威夫特的政党观念，或者是他对于英国当时政党纷争的挖苦。

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不同政党之间的冲突来自如此琐碎的习俗，也许会将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既有冲突却又不至于导致分裂的那些事项上，而降低那些本来让人不共戴天的事项的重要性，最终将不同阶级和族群整合为一个共同体。

在现代典型的两党政治国家里，政党打破了族群之间的界限，二者所争者，不外乎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税收以及社会福利政策、堕胎与安乐死以及是否容许同性婚姻之类。两党之间唇枪舌剑、面红耳赤，读者看得如醉如痴，大呼过瘾。不过，我仔细想来，这种以社会政策为划分界限的政党政治成功地淡化了血缘、阶级、宗教信仰等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增强了人们对于超越族群之上的国家的认同，也许可以说正是政治文明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标志。

因此，现代党争的基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走出那种部落血缘政治的初民社会轨道，用日常化甚至看似琐碎的事项去划分政党；另一个，与前者相关联，任何政党都要承认它不是神圣的，不是所有真理的垄断者，否则，其他政党就没有存在的任何空间，政治就不好玩也没法玩了。

斯威夫特是个神学博士，后做过教士、牧师和副主教。想不到他留给我们的是伟大的文学创作，是一种把幻想与现实勾连在一起、把叙事和讽刺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与智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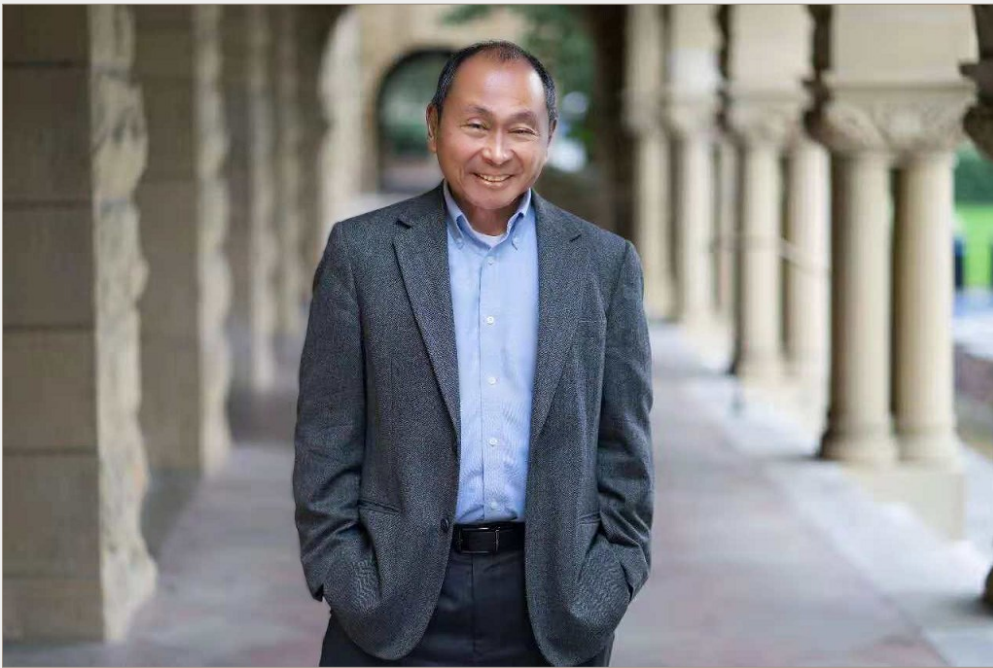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 王宏恩：历史仍未终结 | 阅读福山 2018 新书《身分政治 Identity》

[王宏恩 内华达大学拉斯韦加斯分校助理教授。本文首发于菜市场政治学网 [whogovernstw.org](http://whogovernstw.org)]

史丹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今年出版的重磅新书《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在前言就直接说他要面对两大问题。第一，他要响应他自己曾在苏联倒台后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为何仍未终结，以及这些年来批评者对他的误解；第二，他希望可以解释为何川普的当选与民粹主义浪潮，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才在全世界各地出现。

本书的整个理论架构，来自三大因素的汇流：(1)人类随着历史逐渐变化对于寻求尊严的天性；(2)欧美国家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3)快速的工业化与全球化。三个因素的汇流导致了民粹主义长期伏流，却在近年来忽然崛起。



福山教授

### 追求尊严的天性，从个体尊严到身分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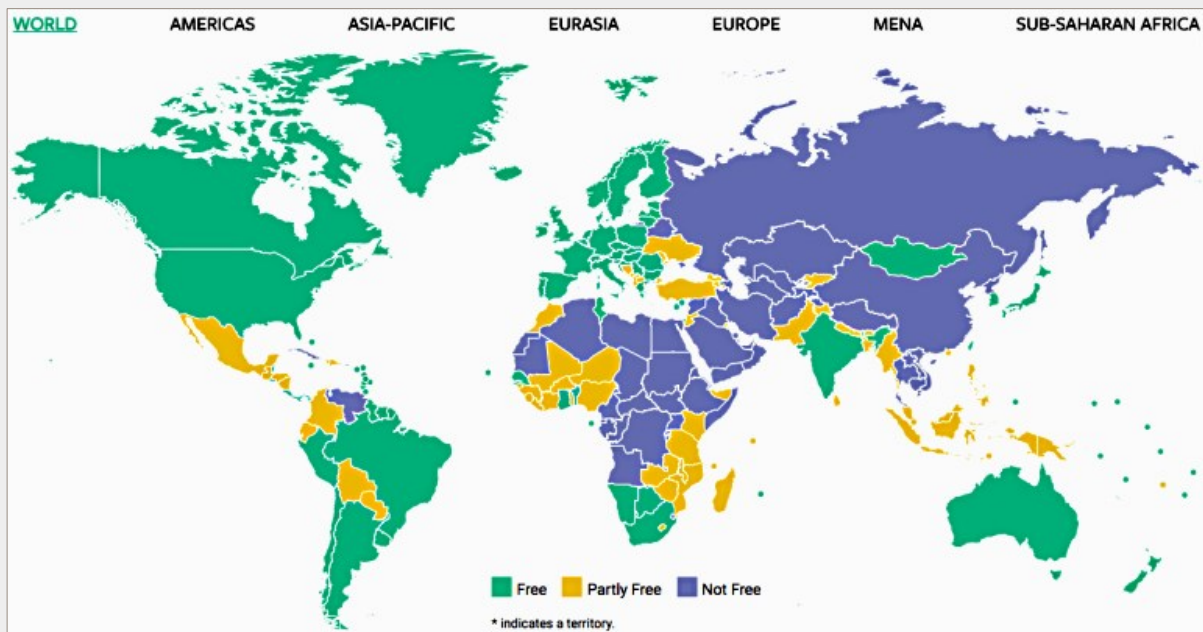
在人类天性方面，福山做了一个来自于苏格拉底的假设：人类的灵魂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原始的物质欲望，第二个是理性的计算，而第三个，也是本书最强调的部分，是自己的尊严(Dignity)得到他人的认可。

这个尊严随着人类的历史而不断演进。苏格拉底一开始提到的尊严，是专指那些贵族可以选择冒着自己的生命危去防卫与拯救家园。但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生老病死都在同一个村落，阶级世袭，人生一出生就决定了而毫无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尊严的问题。直到马丁路得开启宗教改革，每个人

可以选择内心是否要遵循神的恩典，而并非被外在的教会与仪式所决定，一般人也开始出现内心与外在之分，被视为是个人主义的开端。鲁索则更进一步指出，尊严与否不只是选择追随上帝，而在于个人的内心可以选择是否遵从社会的道德价值。虽然在之后尼采更进一步认为不只是选道德价值，而是选择是否遵从自己订下的价值即可，但福山仍指出，人本是社会性动物，人们会有天性去遵从一些社会规范的道德价值，甚至人的内心对自我的定义可能也是来自与社会他人互动出来的。所以光从字面上来看，福山并不完全认同尼采的说法。

对于福山来说，他在苏联解体后说人类历史已经终结，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满足了人们基本上想寻求尊严的渴望：民主政体给予每个成人参政权，对待每个成人都像一个成人，让每个人都有基本的被认可；对于那些寻求尊严与地位超越一般人们(megalothymia)，他们可以透过参政寻求满足、也可以透过经商成功获得满足，而这些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机制都能够提供。相较之下，福山是认为人类社会不可能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性假设，马克思预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阶段终究是达不到的。在达不到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情况下，人类历史可说是终结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现在民主衰退、民粹主义兴起的浪潮？难道历史不但没终结，还往回走了吗？又为什么是现在才发生？福山认为是欧美国内与国际情势使得一些人们的尊严不再被满足了。



自由之家的世界「公民自由」等地分布图，2017

首先，就欧美的国内情势来说，在二战过后一波福利国家的浪潮，虽然加强了左派与工会的崛起，但左派在推动政策时，事实上遇到了国家发不出那么多钱、多印钞票导致经济与金融危机的结果。同时因为共产主义的崛起，劳权、共产等概念变得负面而不受欢迎。在那之后，福山认为左派政党就离弃原本的工人们而去，也不再讨论更困难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发展等问题，而开始做智识上比较简易的身分平权运动—妇女、少数族裔、性少数等，追求这些身分要获得跟他人平等的尊严，而不只是经济

或机会上的平等。福山特别举了同志婚姻作为例子，这运动对于婚姻的要求远多于法制上给予的经济或法律保障，要求适用相同婚姻法律就是因为求的是受他人认可的尊严。每当社会出现问题时，左派就开始切割或创造出新的身分类别，然后根据这个新类别去要求平等尊严，而非选择将这群受害者加入既有的较大群体来争取平等。

而就在左派开始强调身分政治的同时，本来的工人与虔诚的教徒就觉得被遗弃了，被社会无视 (invisible)。他们不再获得他人的认同，而带给他们工作伦理的信仰甚至也常遭到左派的嘲笑与攻击。福山特别指出，虽然美国工人的收入下降、同时经济不平等加剧，但收入改变真正造成的影响是低收入的人（即使有社会福利支撑）没办法得到其他人的认同，而当尊严得不到认同时就会产生愤恨。这也是为何许多经济上受惠于欧巴马健保的民众居然投票希望废除这个健保，因为他们认为这健保不是给他们的尊严。

于是这些人们思索身上还有哪些身分是有办法得到尊严与认同，他们就想到了国家而成为爱国主义者，国家越有尊严他们就越有尊严。而这个尊严就来自于国家是否有选择的权力，他们认为国家有权力不让移民进来、不被欧盟或跨国组织控制才是真正的国家。于是右派也开始玩弄与动员身分政治，并如同左派一样将社会不同群体越切越细，由于这些切法很多都是跟人的出生背景有关而无法改变，最终造成左派与右派都极端化而不可能存在妥协的空间，最后导致民主政治的僵局。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与工业化带来快速的社会变迁，人们从古代严密的被镶嵌在没有选择的农村，忽然离乡背井甚至跨越国界来到大城市工厂里变成一个小螺丝钉。眼前忽然有了无数的选择，身边却不再有任何连结，于是人们开始问：「我到底是谁？」福山认为，这解释了为何非常多欧洲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他们许多人本来甚至没有信教，但看着父母跟自己再努力仍不被主流社会接受，因此他们同样寻找自己其他身分是否能被认同，此时发现极端穆斯林的伊斯兰国给予他们尊严，于是他们宁可放弃欧洲大学教育与工作机会，端起枪与炸弹走向战场跟人群。（程度上比较轻微的例子，则是许多中东移民女性因为非宗教因素而自愿戴上头巾面纱，这是为了追求身分认同而非被压迫）。随着 911 恐怖攻击之后，加上被发现非常多的恐怖份子其实是具有法定身分的欧美国民，因此更促成了欧美国家的爱国主义的兴起，认为国家尊严在于要有权力决定是否与怎么接受移民。而在社群网站兴起之后，人们更容易沉浸在自己的舒适圈、找到相同群体的人们，更能拒绝与其他身分的人交流，导致身分政治更大行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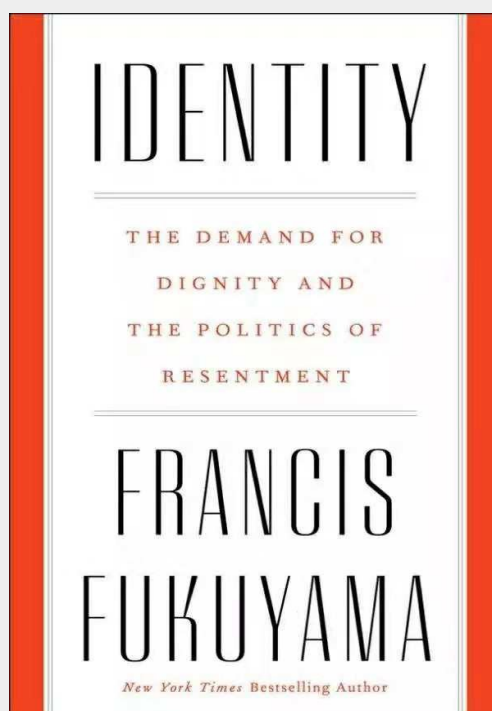
总结来说，上述三个要件，对人寻求被认同的尊严假设、欧美左派与右派的转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共同促成了这几年我们看到的民粹主义兴起、川普当选、与英国脱欧等让人震惊的结果。

### **确立国家权力与追求自由民主文化**

那么，要如何抵抗民粹主义的浪潮？有趣的是，福山认为确实应该强化国家选择的权力，更重要

的是要强调国家同化移民的力度。这个同化并非是文化上或种族上的，而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认同上的。

「追求多元」本身无法成为国家确立身分的方向，而必须是一些更实体的概念包括宪政主义、依法行政等。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本身有自己的一套文化，这套文化应该被放在最高位，也高于其他反民主的文化 (Liberal democracy has its own culture, which must be held in higher esteem than cultures rejecting democracy' s value. P.166)」。福山认为大多数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并非那些不可理喻的种族主义者，而单纯只是担心这些移民会破坏民主国家基本的民主价值。假如国家可以确保这些移民们都能遵守基本的民主价值，并透过参与国民义务的方式实际为国家付出过，那么民粹主义就可能会退潮了。而针对拒绝遵守自由民主的人，福山则认为国家有权力拒绝他们并把他们赶走。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2018 年出版的新书

之所以要国家追求自由民主，是因为福山仍然相信这个制度是能提供每个人尊严的，也才能满足当代社会作为人的基本需求。在有起码的自由民主之下，由于每个人在当代都可能同时有不同的身分交迭，这些不同交迭的身分可能可以互相影响牵引，来慢慢降低身分政治的动员跟影响。例如，大家都先起码承认对方也是同样认同自由民主的国民，同样已经为国家付出过，那在这样的共识下再来慢慢解决其他冲突之处。最后，继续朝向历史的终结前进。

## 评论

虽然福山多次强调尊严的重要性，但笔者认为这牵扯到两点，第一点跟笔者过去在言论自由的论战中概念类似，就是我们是否需要平等对待当下尊严等级不同的人？假如现况就是尊严已经分配不均而需要重分配，难道我们非得寻找一个让所有人尊严都同时增加的可能性吗？到底是结果朝平均迈

进比较重要，还是当下的增减一致比较重要？

第二，作者提到许多现代人的自我与尊严的定义不只是自己，而是把自己的尊严跟整个社会传统规范绑在一起，自我是因为社会规范互动下而存在的，因此一旦传统社会规范被破坏或修正，这些人就仿佛丧失了自己基本的尊严。这是个强而有力的解释，清楚说明了为什么许多保守派会在意同志婚姻合法化，即使同志结婚完全不影响自己的婚姻与家庭。但假如这些人用来跟自己绑定的传统规范，其内涵同时包含打压他人的话，那这种尊严是否仍神圣不可减损？有办法找到不是零和赛局的状况吗？

第三，福山在书中多次强调自由民主的重要与国家的权力，但福山没有讨论这样的国家权力是否会被滥用，以及到底自由民主的定义包含到多大的范围？为何福山要担心阿拉伯之春后埃及选出穆斯林兄弟会政府？以及这样的定义是否跟住民自决、独立运动的风潮相违，假如相违又该怎么办？我猜福山会支持这些自决与独立运动，他特别提到当代国家身分不明确，是因为当代国家的领土划分大多是战后与殖民后互动下的产物，而确认国家身分的方法就包括独立运动或重塑国家身分等等。

第四，我觉得福山对于个人主义式的尊严过度乐观了。当爱国主义或种族主义再度兴起后，许多人已经把自我认同与族群认同重迭在一起了。换言之，这些人觉得国家好就是自己好，国家坏就是自己坏，这样其实就是独裁的温床，尤其是当国家好坏的诠释权掌握在掌权者的嘴巴或命运之上时。如何重新把人们的自我认同从因民粹而兴起的族群认同重新淡化或分离出来，我想是福山的策略（透过多重身分来降低单一影响力）成功关键。

最后也要特别提一下，本文在这书的翻译上将 identity 翻作身分而非认同，是因为笔者认为福山在这里强调每个人的 identity，并不是政治心理学上人对特定团体的长期心理依附，而感觉更像是传统的身分类别，因此可藉由动员或重塑每个人对不同身分的比重来影响人们的言行。 ■

[【返回目录】](#)

## 茅于軾教授九十岁寿辰学术庆祝活动众筹

### 一、背景与意义

茅于軾教授生于 1929 年 1 月 14 日。原为铁路工程师，后自学经济学，1985 年发表《择优分配原理》。1993 年与几位经济学家和大象文化公司共同创立天则经济研究所。其后又创立了富平保姆学校和人文经济学会。他的道德文章，君子人格，为一代师表。

2019 年 1 月 14 日，将是茅于軾教授 90 岁寿辰。借此机会举办一次庆祝活动，一来表达我们的敬意，二来学习他的理论思想。具体形式就是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以他的学术著作及其它论著为主，研讨茅于軾教授的学术和思想贡献。

### 二、具体形式

1. 2019 年 1 月 14 日，举办“茅于軾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庆祝他九十岁寿辰活动”；时间一天，参加学者 20 名，参会人数 100 左右人；
2. 编辑印刷《茅于軾教授九十寿辰庆祝画册》。

### 三、拟邀请嘉宾

茅于軾教授在经济学界，法学界，其它学术界，企业界的朋友；天则所的同事，曾经在天则所工作过的人士；等等。

### 四、筹款目标

30 万元人民币

### 五、截止日期

2018 年 12 月 14 日

### 六、众筹形式

众筹回报包括：

#### 1. 600 元

参加“茅于軾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庆祝他九十岁寿辰活动”；  
获得《茅于軾教授九十寿辰庆祝画册》一本；

## 2. 18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 [茅于軾《择优分配原理》发表 30 周年] 学术研讨会纪念品;

## 3. 50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 《茅于軾思想集萃珍藏版》光盘 1 套;

## 4. 300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与茅于軾教授一起合影并喝茶的机会

## 5. 100000 元

在获得前面所有回报基础上

获得茅于軾教授的墨宝一幅。

## 五、捐款方式

(1) **银行账户：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账号：861581962310001**

(2) **支付宝账号：xueruijie@unirule.org.cn**

(3) 汇款请留下联系方式，并注明“茅老 90”。

(4) **联系人：**

**李 冰：**13601286718, libing@unirule.org

**胡明东：**15011147717, humingdong@unirule.org 

[【返回目录】](#)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 1. 众筹目标：3万元（2018-2019年度4-5场沙龙的总经费）

####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 3. 众筹回报:

####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 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 (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 (每期沙龙仅一位):** 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 (全年仅一位):** 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 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 861581962310001 (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 [wistom113@163.com](mailto: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 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 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微博: 云豹 ONE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lllI-5ehNtyrlr9dKw> 密码: t9ed